**偶像的黄昏**

卫茂平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7月第1版

**偶像的黄昏，或者：如何用锤子进行哲思**

KSA版编辑说明

Pütz版编辑说明

前言

格言与箭

苏格拉底问题

哲学中的“理性”

“真实的世界”如何最终成了寓言

作为反自然的道德

四种大谬误

人类的“改善者”

德国人缺少什么

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

我感谢古人什么

锤子说话

**偶像的黄昏**

**KSA版编辑说明**

1888年9月27日，尼采改变了一个心理学家的闲逛的标题。9月20日，收到来自莱比锡印刷厂的首批校样时，加斯特这样写道：“‘一个心理学家的闲逛’这个标题，听上去过于平淡乏味。容我具体想象，它会对别人如何起效：您把您的炮兵部队运到了最高的山顶，拥有前所未有的火炮，只需胡乱开炮，就能让周围人胆战心惊。这是一个巨人的步伐，已不再是一次闲逛，为此群山惊颤至极。另外，在我们的时代，闲逛通常仅在下班后进行，疲惫时也会这么做。哎，我求您，倘若允许一个无能的人这么做的话，用一个更惹人注意和更光彩夺目的标题！”尼采就此回答：“至于标题，您那非常人性的异议先于我自己的疑虑提出：我终于从自己的前言中，找到也许能满足您的要求的句子。我恰好准备结束“重估”第一篇。您写给我的关于‘庞大的炮兵’的话，我得就这么采纳。它的确试图引起可怕的爆炸……”（9月27日）。新的标题——尼采在同一封信中说——也是“针对瓦格纳的一个恶作剧”，他曾经为一部《偶像的黄昏》作曲。新标题的产生可以清楚地在Bd.13,22[6]中追溯。尼采曾按顺序写出以下标题：“偶像-锤子。/一个心理学家的闲逛。”然后是：“偶像-锤子。/或者：/一个心理学家如何提问。”最后是最终的标题。标题的草稿事实上在《敌基督》的47和48章的预备阶段写下。《偶像的黄昏》可以被视为《敌基督》的某种“孪生作品”，这在上面已经指出。印刷手稿和校样被收到。《偶像的黄昏》的印刷11月初完成，书的发行计划在1889年。11月25日左右，尼采收到四本样书：偶像的黄昏或者如何用锤子进行哲学思考。莱比锡1889，C.G.诺伊曼出版社（=GD）。

在日内瓦的博德梅里阿纳（Bodmeriana）图书馆，还保留了来自一份CG版誊清稿的几张稿纸。

**Pütz版编辑说明**

在锡尔斯—玛利亚最后一次逗留时，约1888年8月底和9月初之间，尼采放弃了一直计划的《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他决定发表出自手头已有材料的一个摘录，标题为《一个心理学家的闲逛》。根据加斯特的异议，他用更具挑战性的《偶像的黄昏》，代替了原先听上去平淡乏味的简单标题。那计划分成四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其他部分，发表在他的第一本书中，即在《敌基督》中。也就是说，这篇文字和《偶像的黄昏》产生于《权力意志》的笔记，而继这样的决定之后，后者在尼采的计划中已无位置，除了那两本经作者同意的书，它只能被当作遗著来读——一个主要由施勒希塔（Karl Schlechta）和蒙梯纳利（Mazzino Montinari）调查出的结果，而它彻底修正了关于所谓《权力意志》在接受史上颇具影响力的误解。《偶像的黄昏》1889年才发表；尼采在前一年的11月已收到最初的样书。

这本新书产生于有关瓦格纳的论著的范围内，这由其新标题证明。它是对瓦格纳的四部曲《尼伯龙族的指环》中第四亦即最后一部《神界的黄昏》的讽刺模仿性改变。尼采自己意识到这个冲击方向，所以在1888年9月27日对加斯特写道：“此外，格斯多夫（Gersdorff）郑重其事地警告我小心瓦格纳的女追随者。——偶像的黄昏这个新标题，也将在这个意义上被人听见，也就是说，依旧是针对瓦格纳的恶作剧……”

简短的前言解释了标题：总攻针对的是充斥着世界的许多偶像，而世人被不公正地和并非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牺牲给他们。考察的方式是用锤子进行敲打（《如何用锤子进行哲学思考》），以便听到，他们用脚站立的基础如何不稳，发出的声音多么沉闷，又是多么空洞。锤子在这里的功能，不是建筑或者摧毁的工具，而仿佛是心理学家的音叉。尼采把自己的书，理解为反对超时代地行之有效的伟人和权威、反对所有类型的理想及神祇的战争，而对他们的顶礼膜拜，他觉得是有违人类尊严的偶像崇拜。标题的第二部分可能语意双关：它涉及虚假价值的没落，就像瓦格纳歌剧里那些英雄如何没落、众神城堡的大厅如何燃起熊熊大火一样，可它也指向早晨新的开端，那时新的意识开始苏醒，明白众神只是偶像，对它们的揭露有利于人类的自我解放。这个暮色降临和晨曦初现（Abend- und Morgendämmerung）的双重含义以后更清楚地得到表达，如平图斯（Kurt Pinthus）就把他的表现主义作家文集称为《人类的朦胧》(Menschheitsdämmerung)（1920）一样。这个文集既宣告了同旧形式的决裂，也宣告了一种新人的诞生；面对那最恐怖的深渊，它没有视而不见，而是充满希望地把它提升到最陡峭的山顶。对于新生和没落、价值颠覆和价值确立之张力具有典范意义的，是霍迪斯（Jacob van Hoddis）的诗歌《世界末日》以及策希（Paul Zech）的《新的山上宝训》。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同样具有这种双重的识别力。

紧接着《偶像的黄昏》的前言，是带有标题的十篇文字。第一篇（“格言与箭”）由警句组成，它们同尼采以前论著中的警句相似，比如在《朝霞》和《快乐的科学》中。其他篇章由较长的段落连接而成，它们在思维和表现风格上接近短小的散文，除了基本上是比较简短和锐利的警句外，同样给人以上提两本书的印象。《偶像的黄昏》的结尾由出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中要求坚硬的锤子的演说组成。

警句

“格言与箭”针对的是认识论、道德和心理学之基本准则形式中的偶像，针对的是这些基本准则那长久的效用或者甚至宗教上得到认证的庄严，还有让那些偶像成为不可侵犯的原则，以及被人不假思索地接受的公理。这被视为千百年来对无条件地寻求真理的敦促，同样被看作是对博爱的要求，信仰和良心的合法证明，并以同样的方式被视为幸福追求的目标及目的。

打破固定僵化的观点，发现偏见和指出“真理”之反面的合适的逻辑及修辞手段，是反题，颠倒和佯谬。对此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男人创造了女人——究竟用什么？用他的上帝的一根肋骨——即他‘理想’的……”最初的颠倒在于，不是旧约中的上帝用男人的肋骨创造出女人，相反这个男人（“用什么做的？”），但不是用他自己的，也许用他的上帝的肋骨，创造了女人。可是那个上帝，那个男人从他身上取下一部分东西、似乎由此证实其肉体之事实性的上帝，其实并不存在，仅仅是男人为了安慰自己而创造出的虚构的理想。因为，根据尼采的观点，他的生命力已经衰退，所以他需要一种精神和宗教的补偿。于是，用他的材料被捏成的女人，根据其出身，如同理想，依旧被证明是虚构，也就是：上帝。同他一样，她也极佳地适合颓废。那个生命力衰退的男人，为了分散别人对他自己的衰弱的注意力，把女人抱上祭坛，然后对上帝和女人顶礼膜拜。那个据说是真实的女人继续保持隐蔽状态，也可能同他的捐赠肋骨的行为一样，是非现实的。因为两者的存在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男人就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妄念制作他们。

在少量句子里，在一个单句或如同这里在一个简洁的问答模式中的集中和强调，它们会追求警句的句式。在这样的句式中，多维度的思绪仿佛汇集一处，同时具有新的启发思维的功能。“警句”（Aphorismus）这个概念来源于希腊语动词“aphorízein”，表示“区分”（abgrenzen）。因此，通过标明与其最临近的更高一级的普遍性之特殊的差异，来突出一种现象，这样一个任务对他来说恰好相宜。可事实上，警句针对的不怎么是一种形式逻辑的确定，而更是一种同有效事物的“区分”。在《偶像的黄昏》里，他正是想对这样的事物，通过扣问和倾听的方式，进行审视，批判，必要的话还进行纠正。同警句不同，谚语在其使用的语境中含有论证的特点，被使用在一篇演讲的某些地方，常常组成一项修辞阐述的高峰。谚语在字面上结束一个思维进程，而警句首先想做的，是启动一项思维活动。 比如“遭火烧者，见火就怕”这样的短语，建立在常年的经验上，被视为正确，受到多数人的证实。但一个这样被认可的真理同时会变得多余，成为陈腐之理。相反，警句与众不同，打破常规，以其自身具有的违逆，道出新意。它那强调意外的倾向性，让它作为传奇小说（Novelle）的近亲或者传奇出现；它同戏剧性辩论的战斗性一样，具有好斗的姿态。由于它表现的恰恰不是一清二楚和容易把握的事，就让听众和读者感到不那么轻松，相反要求别人，为了理解的缘故，做出更加聚精会神的努力。警句并非易懂好记，它要求好思者对它深究。

警句在许多方面受主体性的影响。如果说谚语大多来源不清，那么警句反对业已稳定的一致，并且源自某个作家，而这个作家决不拒绝独自和执拗的思维及感觉方式。其内容并非建立在一种可以客观化的洞见上，相反依据的是一名个体人的经验和认识。所以，它表述的不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文化阶段的智慧，同样，它也放弃对通用的座右铭和格言之普遍有效性的要求。与其说通过其逻辑，不如说通过其修辞，它具有更强烈的效果。与其说它是明智的，不如说它是挑衅的。它还以接连不断的提问，制造出更多新的骚动，而不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它既不宣告可以证明的事实，也不羁留在任何一个稳固可靠和轮廓清晰的系统中。它的任务不是建立广泛的关联，而是对某个单独的观点进行推向极至的个别化，而这个观点能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提问开辟崭新的视野。

警句对认识之总体关联的放弃，经常被视为一种危机的征兆。人们或者仅仅相信作家具备有限的能力，至多在微末小事中具有创造性，或者一些偏爱警句的时代，被人视为深受激荡和急剧崩溃的时代。尽管任何时代都有解体和过渡，事实上在警句的繁荣和某些历史时期之间，还是可以看出某种姻亲关系。这样的历史时期，与其说是在对现存事物持续的推行和总结中，不如说在同过去的划清界限和在一个坚定不移的新开端中，乐于见到自己的任务。针对传统价值和现存准则的疑虑不管何时增长，对体制的攻击不是通过体制对峙表达自身，相反，警句（和散论）作为锐利的武器发挥作用，人们以此能在要害中心击中敌方的关键部位，并且进行突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观察到那些启蒙运动者（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诺瓦利斯）（Friedrich Schlegel, Novalis），还有尼采，持有同样的目标。此外，“黄昏”也是进攻之时。偶像此时还无法清晰地辨识逼近的敌人。

警句的个性化与警句作者的个人主义相称。警句如此自主独立，不必首先从一个比较全面的关联中获取自身意义，就能让人明白。谚语和格言只适合于某个特定的语境，并且依赖于它，因而它们仅仅在这样的语境中能被引用，而警句却自给自足。其对读者的效果同它的个性化类似：通俗易懂，但高雅孤傲，并非是大众化的，相反是知识型的。鉴于其文本关联和在接受上高要求的特殊性，其内容和形式的排他性，又与它的孤立相适。为了不屈服于它最大的敌手，即陈词滥调，它需要艺术的纯熟精湛和修辞的高超技巧。同所有肯定判断的类型一样，它必须避免简单和肤浅的断言。取而代之的是，为了敞开出人意料的层次多重和深奥莫测的意义之维，它使用反题和颠倒、矛盾和佯谬、使人惊诧和感应心灵的一切能想象的手段。

警句尽管自给自足，独立于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语境和广大读者的多数同意原则，它还是很少个别地出现，而通常可在较大的汇编中找到。它与其他文字一起被印出和阅读，但这并不妨碍它的独立性，因为它同样可以放弃与其他警句的邻居关系。另外，它的主体性和片段式的片面性，从一个变化了的立场出发，力求延续或矛盾，完备或者反方案。那些互相连接、彼此间又时常相左的警句，是不断以新的思维开端和透视的方式把握认识对象的尝试。并非是一个作家的无能或者一个时代的无创造性，而是那难于认识的问题，要求警句式的、也就是说接近真理的不断尝试的形式。倘若对启示的信仰以及古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不再能为一种“知识大全”（Summa）提供基础，那么认识尽管会零星化，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庆贺主体性的解放，但同时会倾向于克服其独居的实存，并且寻找联合的新形式。结果不是归纳和演绎的系统，而是对探照灯的一种安置。这些探照灯的光柱既非集中，也非扩散，搜查黑暗，寻找真理。

形体多样的偶像

同在其早年的论著中，尤其同在《论道德的谱系》中一样，尼采的方法是，把所有的现象严格地归结到其生理条件上。谱系的研究就此得到延续，即除了道德的起源，其他“偶像”的祖先，比如真理，理性，美感等，也将受到探究。篇章的顺序遵循从一般开始，转移和集中到特殊的表现方法。此书首先讨论具有超越时代效力的哲学及道德的观念和理想，然后探讨当代现象，比如新建立的帝国及其社会和文化关系，然后把目光转移到一些杰出人物身上。这些人物的名字代表着某些定理和思维立场。此书以对非偶像的、具有标准设立之意义的形象，比如歌德和古代罗马人的展望收束。

尼采那归结的思维手段，几乎在所有情况中是一样的，它击碎原因和结果、说明者和被说明者之间那人们以为无法扯断的链条，展现出，那表面上的第一，其实早已是第二，因为它是有条件的。那自以为自由的意志，于自身发现它的行为的原因；可事实上，它仅是一个更强势力完成任务的器官，本身已是行为的结果。那以为自己是坚定不移的理性，根据自身的灵性相信认识，在理想的意义中，甚至认为世界是自己的创造物，由此认为自己是造物主，但是，就其被创造性来看，它自身只不过是一个隐藏更深的意志那实施指令的工具，并就它的命令进行思考和认识。教徒只能把他的上帝想象为最最实在者（ens realissimum）和他自身的原因（causa sui），但此刻他没意识到，一切事物的根源，其原因在人自己身上，是人自己，按照其最深邃的本能的指令，把那个至高无上者创造为理想，以便在尘世的艰难辛劳中，替自身减轻负担。人类置于其开端的一切，事实上已经是个——大多迟一些的——占统治地位的、或已受损害之趋动力的衍生物。对尼采来讲不是太初有道，而是太初有“生命”。在生命中，他见到的不仅是原初，而且还有一切存在者的目标；它包容了起源和结果，原因和目的，开端和结束。一切存在的东西，都会履行“生命”的功能，并从生命那里获得自己唯一和真实的合法性。

尼采论著中的这个主要术语，不能在一种狭窄的、仅仅是生物的意义上，被同人的生命体，同人的身体联系起来，相反，作为一种概念比喻，它包含的东西要多得多。鉴于它的不确定性，尼采研究对它显得相当无可奈何，而每种对“生命”的更精确的定义，都会导致一种不能容许的界定，以至于有必要进行考虑，相应地使用诸如“废除边界”或者“普遍化”这样的范畴。“生命”在尼采那里涉及的是一种几乎无法精确描述的原因和关联。这种关联创立、包容和评判一切存在者。对这个整体继续作任何条分缕析的说明，会束缚其对整体的要求，使自己陷于矛盾和对立。一项概念的定义，会导致它的普遍性的损失，而在历史现实中，当它在为其弱点的服务中自我限制和伤害时，甚至不得不容忍这样的损失。不过，即使借助理论和理想的“生命”的自我阉割，也是按其意志发生的，不过是一种病态的意志。

属于“生命”之整体的有极端的敞开状态，对破坏性力量对抗的肯定，还有作为整体之一种补充要素的虚无。尼采眼中的虚无主义，不是对虚无的认知和承认，而是对虚无的否认，或者通过基督教和道德观念，赋予虚无以安慰和希望。不管“生命”这个术语的含义如何地不确定，作为克服错误的、尤其是有害的对抗哲学的工具，它还是重要的，因为恰恰“生命”应该把握和接受这种对抗性：阿波罗那清醒和维持秩序的知性活动与狄俄尼索斯那取消边界的迷醉，同样还有善与恶，同样还有谎言和真理。甚至那自相矛盾也包含在“生命”中，并且可以服务于对它的刺激。即使它以穷困潦倒甚至病病歪歪的样子出现，意欲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可恰恰这样的意志证明其不可遏制的力量，尽管它作用于颓废中。它催放出最最绚丽的花朵，培育出一种变得越来越美妙——如同在现在派中——越来越精致的敏感性和唯理论，在这个基础上，人最先获得这样的能力，认识到他的匮乏之物、即百折不挠的强大生命力的充分价值。只有病人才有能力，领会健康的意义，觉悟到，“生命”的状态决定依赖于它的所有现象的价值，并且确定，这些现象是一种凭借本能之意志的表达，容或是对意志的否定，这些现象孰好孰坏。

在“格言与箭”之后，《偶像的黄昏》转向一个业已在尼采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形象，即苏格拉底。在那里，他被视为第一个“理论家”，曾以自己那区别和证明的艺术，摧毁了太古时代希腊文化那包容世界、容忍光明和黑暗的神话，而眼下，他自身作为一种大体上走到尽头之生命力的纯粹的工具，作为一种趋向本能衰竭的最突出代表出现。这种本能衰竭还涉及到旁人，首先是随后的几代人，而这个善于辞令的辨证论者由此得到别人的仔细倾听，并且能够提升和促进由他的疾病所推行的事业。倘若苏格拉底同许多哲学家一样（比如叔本华）自以为能够评判或者甚至贬低“生命”，那么，尼采驳斥了这种大胆行为的可能性，因为对一个生存者来说，“生命”从来不是评判的客体，而始终是主体，生命借助它自身的特性规定评判者，肯定或者否定生命。对尼采来说，不存在独立自主的理性判断，而只有对本能的反应；因为人按照意志的指令进行思维。通过评判“生命”，人为其自身的此在价值作证。唯理论由此被归结到人的生理条件上。

在苏格拉底的例子中，尼采关心的是少量流传下的关于他性格的情况，尤其是他的长相。对心理学家尼采来说，它显得如此怪异，直至扭曲变形为漫画，所以被用作对一个彻底堕落的生灵的受欢迎的证据。他那低贱的出生，据说同样是罪恶和丑陋的本性，根据尼采的表达，同时是反对所有高贵的怨恨的原动力，而代替高贵的，是对概念自以为是的使用。辩证法成了身处劣势者的武器，他们用它尝试着对所有强权者进行报复，其方式为，他们强迫每个人，使用他们的手段进行抵抗，或者被当作白痴。同他经常对颓废所做的分析一样，尼采在目前这个例子中见到的也不仅仅是阴暗面，他甚至证明苏格拉底，说他用辩证法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斗争性论辩的理想化形式，由此丰富了希腊人的生活。

就尼采看，苏格拉底的精神在基督教中得到加强，并在现代（在叔本华和瓦格纳那里）庆贺自己那有害的胜利。关于这种精神的巨大作用的原因，尼采认为存在于从希腊人那里开始的对本能的刺激，而本能在其杂乱无章的亢奋状态中，不再能被约束，以至于作为最严重之病例的苏格拉底，能够把理性，德行和幸福的三迭系，当作臆想的、受到众人贪婪地抓取的药物提供。但是，尼采以为，带有如此不纯之出生的理性观和道德观，在病理学上是有条件的；因为对于患病之本能的不断增长的抵抗，其自身仅是一种疾病的症状。一种健康的此在不同本能斗争，而是任其自然——当然仅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它们是健康的。疾病存在于单体的分离和部分那散乱的并存和对立中；相反，健康是个平静的整体，它允许内在的矛盾，但不是在黑格尔的扬弃意义中，但或许在容忍对立的意义上。一种走向没落之生命的确实无疑的征兆，它们同时也是驱动力，在同时压制甚至消除对立面的时候，它们是对单个理念和理想的片面催生和绝对化，比如为了明亮对付黑暗，为了道德对付本能，为了逻各斯对付神话。

对于尼采，最受崇拜、同时最危险的偶像之一，是把绚丽多彩和变化多端之现象的世界，制成一种僵化和假定为能比一切更经久之存在的木乃伊。形而上学家们把这种存在的可能的产生和灭亡，归诸于一种误入歧途的想象力。他们由此在认知者身上寻找谬误根源，并且在其感官中找到，而这太适合那业已不断被宣扬的肉体仇视了。通过反驳的颠倒，尼采再次审核那通行的等级秩序：说谎的不是感官，相反，那真正的说谎者藏在那个被他们借助诸如“统一”、“主体”等概念进行施暴的主管机构之后，也就是躲在理性之后。他同意希腊人赫拉克利特（Heraklit）的观点，这个存在是个纯粹的发明，他反对埃利亚学派的（Eleaten）的意见，比如巴门尼德（Parmenides），以为存在是永恒的，而且他还反对其对手，比如德谟克里特（Demokrit）在传统的存在概念重压下，把最后的、不可分的和不会变化的统一设定在原子中。与此相反，尼采捍卫感觉器官的认知力量，认为尤其鼻子是最有效的，因为那是神经最为灵敏的认识工具之一。

不管存在作为所谓真实和不可改变的世界，事实上如何地处于不断变化中，在不同的哲学前提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尼采还是指出了西方思维史的六个阶段。在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中，真实的世界仅对智者开放。他通过摆脱一切感官的约束，尝试获得对那永久有效之真理的直观。对基督徒来说，这个真实的世界处在一种不可企及的、但孕育着彼岸的此在中，而虔诚者和此岸的忏悔者能替自己获得这种此在。对康德来讲，世界自体在理论上不可证明，但在实践领域中，是个道义的使命，而作为道义的使命它并非纯粹的幻象。真实的世界对实证主义者来说是陌生的。他们不知有何手段，能消除这个不良状况，但还是勉强接受这个绝望的状况。现代的无神论者，那些广博的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一方面从中接受着教训，一方面主张取消作为一种陈旧和无用的理念的真实世界。在第六和最后的、暂且是最高的阶段，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就站在此上，意识觉醒，发现随同真实的世界，虚假的世界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反思以其最先进的形式，要克服的不仅是真实的世界，而且还有对一种对真实和虚假世界之区分的原则上错误的假设。适应“善与恶的彼岸”的是这个假设：“存在与假象的彼岸！”

在“四大谬误”这一篇里，尼采把他那完全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手段的基本概念作为题目。当他把理念归结到其生理学的条件上时——系统地表达——，始终分析着第一和第二，原因和结果的联系；通过对两者进行颠倒，他对这种关系做了一种彻底的检查。对尼采来说，第一个谬误存在于对原因和结果的通常的混淆中，正如他曾就不同的分类对它们进行分析那样，现在他再次用对特种饮食的错误信仰解释它们。这类特种饮食据说是长命百岁的动因，可事实上却是“无法再能正确进食”的结果。追求健康的动因也就不是应当之规定，而是疾病。道德和政治领域中的情况与此相应，倘若有人想出手段和途径，以改正错误，而其实它们的来源已经受到毒害，是没落的生命的结局。对尼采来说，一切强大者不是依靠应当，而是依靠存在活着，其本能的自信，以泰然自若的轻松和欢快表现出来，而这种欢快，它认识和忍受可怕的事物。在此意义中，即使德行也不是缘由，而是幸福的结果。

基本的谬误存在于对一种缘由关系的错误相信，这种缘由关系驱使人们，不断地去寻找新的原因，而事实上它们只是由受本能控制的想象所组成。尼采的批判首先针对唯心主义的全部的形式，这种唯心主义以对所谓自由的主体之启动力的着重高估，在原子或者自在之物中见到的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自身精神的自我美化的投影。人要么没有准备，要么没有能力，承认事情确实这样。相反，他们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原因研究，只是在这种研究——反正是错误的——结束后才接受现实，因为他们现在能把这新的东西回溯到某种以前熟悉的东西上去，由此赢得一种安全感，也就是一种权利意识。对于陌生者的恐惧，剥夺了其新意，拒绝了其自身成为一种新开端之缘由的可能。在宗教和道德中，所谓的缘由，比如良心和服从天命，服务于解释那折磨人的集体经验，并使之变得轻松。不过此外，这类心灵状态是生理条件的结果。对于上帝之善的信任，是内心坚强的表达，而负罪感则相反，透露的是软弱。

就尼采看来，对一个自由意志的假设，乃是一个基本谬误。这样的意志被作为所谓起决定性作用的缘由而发明，其目的是，能够让物和人依赖自身，并对它们进行惩罚。为了可以宣布某人有罪，必须事先迫使他接受自由。与此相反，尼采认为，就人的存在或者行为的所有一切而言，人全然不负任何责任。“生命”的厄运让目的成为多余，而目的在自然中同样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每个单体是整体的一部分，它就不能在不涉及整体的情况下遭到谴责。对于一名个人的有罪判决，它同时也谴责宇宙。只有当世界不再被回溯到第一个缘由时，它的解放才开始；只有当上帝被取消时，它才得到拯救。

同宗教一样，就尼采来看，道德也建立在对于现象的想象和误解上，但它还是在某些方面具有一种认识价值，即它在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对与其有关的根基、即“生命”的长处和短处提供信息。倘若道德关注的是人的改善，它原则上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驯服或者培育。前者导致一种无情的屈辱，就像中世纪早期日尔曼人被改变信仰和强迫臣服于十字架时所经历的那样。培育则相反，印度文化为其等级制地划分的人种和阶层想到的就是这点。它导致一种对下层社会有目的的软化，而且使用闻所未闻的残酷手段，比如为最底层的贱民而设的禁令和规定所证明的那样。针对这种带有培育和优待原则的印度式种族理论，犹太——基督教的学说面向所有的穷人和被侮辱者。两者都把自身理解为道德，但是，它们奴役世人，以服务于一种它们无意识的和业已患病的生命意志；因为健康的生命意志让一切生存者自得其所，不会强迫它们戴上一种应当的桎梏。

继哲学，宗教和权利的偶像之后，尼采针对政治的偶像发难：针对德意志帝国。为了标明自己的不敬无礼，他始终用引号指称这个帝国。他的主要保留，涉及的是强权对于精神、国家对于文化、俾斯麦对于书籍的替代。“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这个口号，把以前那个思想者的国度，贬低到了法国教养的水平，而这个国家再也无处法展示诸如歌德和叔本华那种独一无二的享有名望的人。除了缺乏合适的教育家和伟大的典范，尼采目睹的还有多种麻醉剂，比如酒精，基督教和新的德国音乐，这里他指的是瓦格纳，以及一种缺乏精神的科学工作。它带着消除差别的匆忙，不再为高尚的事业留有回旋余地。没有受到真正的召唤——尼采就是这样——这个青年男子就得（无论如何指的不是青年女子）以23岁的年龄选择一个职业，尽管在30岁的人身上，每种有教养的文化还肯定会发现那是个初学者。不过有关的前提似乎处在观查、思考、说话和写作方式的一种彻底改变中。平静的泰然自若和一种针对任何魅力的傲然抵抗，还有舞蹈者那高雅的距离感和轻盈的步履，它们都不可或缺，而且深深地耦合一处。但德国人平庸粗笨，与此相距甚远，无法企及。

在论著最长的篇章里，在“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中，尼采以被各方承认的、代表某些思维立场和价值设定的权威人物的形象，论述了一大批偶像。他常常只是在行进途中用他的锤子触碰他们一下，由此从中引出一个持续短暂的声响，而这个声音对倾听者来说已经足够，来宣布自己的判决。那间或不经意和倨傲而作的标签，为惹恼人提供了诱因，比如他试图把席勒当作“塞京根的道德小号手”取笑，或者用一种对英语和法语词“cant”戏谑的影射，让康德作为假正经出丑。尼采的废黜方法在这里同样是把定理归结到原动力上，而此时它们与定理处于矛盾状态中：无神论者勒南（Renan）在内心中下跪祈祷，圣伯夫（Sainte-Beuve）被证明是没有自由的革命家，而且带着复仇欲反对一切更强大者，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起先供奉他们的上帝，然后根据英国的习俗供奉道德，乔治·桑（George Sand）忸怩作态，扮作有男子气的女人，龚古尔兄弟(Concourt)推行一种所谓深邃的心理学，方法是同自然主义者们一样，屈服于表面事实，而卡莱尔(Carlyle)对于信仰的要求同他的无能形成强烈对照，以至于这个出了名的能言善辩者面对自身变得笨口拙舌。

与所有的现象和观念一样，对尼采来说，美也不是自给自足和无动于衷的实体，而是“生命”对于事物的一个投影。在美之中映现的是健康，而在丑之中，表现出的是颓败者对其可能性之恶化的憎恨。因为美学也受心理的制约，所以尼采反对叔本华关于美是性关系的女拯救者的理论，相反，他赞同柏拉图，而对后者来讲，一切美的东西刺激创造性和生育。即使和恰恰那个自以为业已摆脱艺术外部条件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纲领，在尼采眼中，依旧错误地与被否定的关系密切相连；因为艺术从来不是无目标和无目的的，而一直是“生命”的反射，同时也是对它的激励。它恰恰在表现丑陋的和违忤生命的现象时忠实于这个使命，因为它不恐惧地展现恐惧，不回答地承受成问题。经历苦难考验的英雄，最可能在悲剧中为自己的此在那无法度量的价值欢呼。

既政治（“帝国”）和艺术的偶像之后，轮到当代的倾向和机构，就是它们以自己那所谓的进步性，在尼采看来，也证明自己是生理退化的结果。这既针对同基督徒一样抱怨一种贫乏的“生命”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针对抹杀高贵和卑贱之分的自由主义。因为只有必须做到坚强的必要性，才使人变得坚强，高雅的社会形态比民主的社会形态更适合促成自由和伟大；因为自由和伟大以人们必须克服的阻力和危险的程度作为自己的标尺。同样前后一致和对异议具有挑战性的，是尼采关于习俗之削弱、关于工人问题和所谓爱情婚姻的判断。与此相对，不过他在保守主义中看不到其他可能性；因为没有后退之路，而被郑重宣告的进步，注定要逐步地走进更深的颓废中。尼采也把现代法律视为偶像。这种法律对罪犯，也就是说在不利的情况下被弄成病态的坚强的人，出于复仇和怨恨而进行迫害和惩罚。

在《偶像的黄昏》的结尾处，尼采把许多受审判的偶像同有典范意义的形象进行比照，而在这些形象中，歌德对他来说卓绝超群。他以为，歌德代表了自然的整体和宿命。他出于坚强推崇宽容，以其对最具紧张度的对抗的肯定，是最后一批狄俄尼索斯式人物中的一个，而以他作为基点衡量，那整个19世纪仅仅意味着没落。尼采视歌德为最伟大的德国人并对他表示自己的尊重。尼采还完全以自己晚期著作中过度兴奋的自我标榜风格，褒扬他自己的使命，并且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人类拥有的最深刻的书。

在回溯他感谢古人什么时，较之希腊人，他更强调罗马人的重要意义。同温克尔曼关于“美的心灵”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希腊人曾在巨大的张力下受到伤害，而这种张力在不断重复的敌对行为和令人如痴如醉的节庆日中得到释放。他一方面称赞罗马人、特别是萨卢斯特(Salust)和贺拉斯(Horaz)身上之风格的高贵，而这种风格的整体力量通过最简约的手段形成。另一方面他强调早期希腊文化的狄俄尼索斯的强力。他在自己的处女作，在《悲剧的诞生》中已经认识和阐释过这点。他在那里选取的是一条相反的路，方法是从希腊人出发，追溯自苏格拉底以降的衰败，并视瓦格纳为一个可能的拯救者。可眼下他从现代那凄凉荒芜的状况开始，把瓦格纳看作其最最病态的体现，并且对值得接触和继续的东西进行回顾。此刻他自称为狄俄尼索斯最后的门徒，以及永恒轮回的老师。早期的希腊文化，罗马的修辞学家，歌德和尼采——这是针对苏格拉底，基督教和里查德·瓦格纳的其他选择。

**偶像的黄昏**[[1]](#footnote-1)

**或者**

**如何用锤子[[2]](#footnote-2)进行哲思**

**前言**

身处一件晦暝不清和责任异常重大的事情中，要保持自己的开朗心情，这绝非雕虫小技：而且，又有什么比心情开朗更为必要呢？缺乏高昂情绪，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力量的过剩才是力量的证明。——一次重估一切价值，这个问号如此黝黑，如此可怕，把暗影抛到打下这个符号的人身上——这样一项使命的命运，每时每刻迫使他，跑进阳光，抖落身上那沉重的，变得太沉重的严肃性。为此，任何手段都属合理，每个“事件”都是幸运。尤其是战争。[[3]](#footnote-3)战争始终是所有那些变得过于内向和过于深沉的英才的大智慧；即使在它的伤害中，也存有功效。有一句格言，我想对博学的好奇心隐去其出处，长久以来就是我的座右铭：

胆量凭伤口生长，勇敢借伤口加强。[[4]](#footnote-4)

在某些情况下，另一种痊愈方式也许更合我意，那是探听偶像的底细……。在世界上，偶像多于其现实：这是对这个世界的我的“毒眼”，这也是我的“毒耳”……。在这里用锤子提问，也许听见的回答，就是那从气鼓鼓的内脏发出的著名的低沉之声，——这对一个耳朵后长有耳朵的人来说，是多么地令人欢喜，——即对我这样一个老心理学家和捕鼠者来说。在这样的人面前，那恰恰打算保持沉默的东西，必得发出声响……

就是这本书——题目透露出——首先也是一次整休，一个日斑，一个心理学家一次无所事事的荒唐举动。也许是一次新的战争？新的偶像将被摸清底细？……这本小书是个伟大的战争宣言；至于对偶像的探听底细，这次涉及的不是时代的偶像，而是永恒的偶像，将由锤子如同由一个音叉触动，——绝不会有更古老的、更令人信服的、更受到夸耀的偶像……也没有更低沉的……这并不妨碍它们最受人信赖；也有人说，尤其在最高贵的场合，它们完全不是偶像……[[5]](#footnote-5)

都林，1888年9月30日

《重估一切价值》第一卷完稿之日[[6]](#footnote-6)

弗里德里希·尼采

**格言与箭**

1

懒惰是全部心理学之始。[[7]](#footnote-7)怎么？心理学是一种——恶习？

2

即使我们之中最勇敢者，对于他实际知道的事，也仅难得有勇气……

3

想要独自生存，必须是动物或者上帝[[8]](#footnote-8)——亚里斯多德说。缺少第三种可能的情况：得是两者——哲学家……

4

“所有的真理都是单一的。”[[9]](#footnote-9)——难道双重是个谎言？——

5

许多事，我永远不想知道。[[10]](#footnote-10)——智慧也给认识划出界限。

6

人可以在他的野性中，最有效地从他的矫揉造作和从他的精神性中复元……

7

怎么？人仅仅是上帝的一个失误？容或上帝是人的一个失误？[[11]](#footnote-11)

8

来自生命的战争学校。——那无法杀死我的，让我更加坚强。[[12]](#footnote-12)

9

你自助：然后人人助你。[[13]](#footnote-13)博爱的原则。

10

面对自己的行为不要怯懦！别事后厌弃自己的行为！——良心折磨是不体面的。[[14]](#footnote-14)

11

一头驴子[[15]](#footnote-15)可能是悲剧性的吗？——在一种既无法担当，又无法摆脱的重负下，人会走向毁灭吗？……哲学家的事件。

12

倘若一个人拥有了他生命的为何，就几乎能容忍所有的如何？——人并不追求幸福；只有英国人[[16]](#footnote-16)这么做。

13

男人创造了女人——究竟用什么？用他的上帝的一根肋骨，——即他“理想”[[17]](#footnote-17)的……

14

什么，你在寻求？你想把自己增为十倍、百倍？你在寻求信徒？——去寻求零吧！

15

遗腹子[[18]](#footnote-18)——比如我——与合时宜者相较，被较糟糕地理解，但受到较好地倾听。严格地说：我们将永远不被理解——我们的权威由此而来……

16

在女人中间。——“真理？啊，您不了解真理！它难道不是对我们所有羞耻心（pudeurs）的一种谋杀吗？”

17

这是个艺术家，一如我喜爱的艺术家，需求不高：实际上他只要两样东西，他的面包和他的艺术，—— panem et Circren[[19]](#footnote-19)……

18

谁要是不懂得把他的意志置入事物，他至少要把一个意义置入其中：这就是说，他相信，已经有个意志置身其内（“信仰”的原则）。

19

怎么？你们选择了德行和高尚的胸怀，同时又斜眼窥视毫无顾虑者的好处？——不过，有德行者放弃“好处”……（写在一个反犹太主义者的屋门旁。）

20

十足的女人弄文学，犹如犯着一项小罪孽：尝试时，不经意地，环顾四周，看是否有人注意她，让人注意她……

21

置身于喧闹的环境，那里不需要假仁假义，相反，就像走钢丝演员[[20]](#footnote-20)在他的钢丝绳上，要么坠落，要么站住——或者逃跑……

22

“恶人无歌。”[[21]](#footnote-21)——怎么回事，俄国人有歌？

23

“德国的精神”；十八年来[[22]](#footnote-22)是个形容词的矛盾（contradictio in adjecto）。

24

为了追寻起源，人们成了螃蟹。历史学家朝后看；最终他也相信朝后。

25

心满意足防止感冒。何曾有个懂得穿戴漂亮的女人感冒？——我敢假定，她几乎一丝不挂。

26

我对所有建立体系者充满疑虑，并且对他们退避三舍。对于体系的意志，在正直方面是一种匮乏。

27

人们以为女人深沉——为什么？因为人们从未对女人寻根究底。女人甚至未曾肤浅过。[[23]](#footnote-23)

28

倘若女人有男人的德行，她就让人无法忍受；倘若她没有男人的德行，她就无法忍受自己。

29

“从前良心得咬多少东西？它有多出色的牙齿？——今天呢？缺了什么？”——一名牙医问。

30

人很少仅只一次轻率行动。在第一次轻率中他总是做得过分。正因为如此，他通常还会第二次轻率行动——可现在他做得太少……

31

被踩的虫子会蜷缩起来。这就是明智。它以此减少了再次被踩的概率。用道德的语言：谦恭。——

32

有一种针对谎言和伪装的憎恨，它出于一种易受刺激的荣誉观；有一种同样的憎恨，出于胆怯，因为谎言被一种神圣的律令禁止。太胆怯，而不敢说谎……

33

幸福所需要的东西多么微小！[[24]](#footnote-24) 一支风笛的声音。——缺少音乐的生命也许是个谬误。[[25]](#footnote-25)德国人自己以为，甚至上帝也在歌唱。[[26]](#footnote-26)

34

“除了坐着，人们既无法思考也无法写作。”[[27]](#footnote-27)（福楼拜）。——由此我逮住了你，虚无主义者！久坐恰恰是违背圣灵的罪孽。只有走路得来的思想才有价值。

35

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心理学家，像马儿那样，陷入焦躁不安：我们瞧见自己的影子在身前上下晃动。为了真能看到什么，心理学家必须扭头不看自己。

36

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28]](#footnote-28)是否会对德行造成损害？——恰恰同无政府主义者[[29]](#footnote-29)给君主们造成的损害一样少。只是当他们遭枪击后，他们才重新稳坐王位。道德：人们必须枪击道德。

37

你跑在前头？——你这样做是作为牧人？或者作为例外？第三种情况也许是逃亡者……第一个良心问题。

38

你是真实的？或者只是个演员？一个代表？或者被代表者自身？——最后你甚至仅是一个受人模仿的演员……第二个良心问题。

39

失望者说话。——我寻找伟人，我找到的始终仅是伟人之理想的猴子。

40

你是旁观者中的一个？或者那个参与者？——或者那个掉转目光，退避一旁者？第三个良心问题。

41

你愿意同行吗？或者先行？或者别人替你行走？……人们得知道，自己要什么，以及自己想要。第四个良心问题。

42

这曾是我的阶梯，我拾级而上，——为此我必须越过它们。可它们以为，我要在它们身上坐下休息……

43

我保留权利，这有什么关系！我有太多的权利。——今天谁笑得最好，也就笑到最后。

44

我的幸福公式：一个是，一个不，一条直线，一个目标……

**苏格拉底[[30]](#footnote-30)的问题**

1

在一切时代，最智慧的人对生命都作了同样的判断：它毫无用处……从他们的嘴里，人们何时何地听到的是同一种音调，——一种充满怀疑、充满忧伤、充满对于生命的厌烦、充满对于生命的抵抗的音调。甚至苏格拉底临死时也说：“生命，这意味着长年生病：我欠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一只公鸡。”[[31]](#footnote-31)甚至苏格拉底也对生命感到厌倦。——这证明什么？这指向什么？从前有人会说（——啊人们是这样说了，而且底气十足，我们的悲观主义者领头！）：“这里无论如何有那么些是真的！智者的一致（consensus sapientium）证明了真理。”——我们今天还要这么说吗？我们可以这样吗？“这里无论如何有什么是病了”——让我们回答：一切时代最最智慧的人，得从近处观察他们！难道他们全都无法再站稳脚跟？落伍了？摇摇欲坠了？颓废了？[[32]](#footnote-32)也许智慧在地球上就像一只乌鸦出现，一阵些微的腐肉气息，就让它兴奋不已？……

2

那些伟大的智者是衰败的典型。这个不敬的想法袭上我的心头，首先是在这样一个情境里，那时他们遭遇了饱学的和粗鄙的偏见：我认识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没落的征兆，是希腊的解体的工具，是伪希腊的，是反希腊的（《悲剧的诞生》1872）。[[33]](#footnote-33)所谓智者的一致——我对此领会得越来越好——完全无法证明，他们在意见完全一致的方面，是正确的：相反这证明，他们自己，这些最智慧的人，在心理的某个方面意见一致，以便以同样的方式，对生命持否定态度，——不得不如此。关于生命的判断或者价值判断，赞成容或反对，归根到底永远不可能是真的：它们仅具有作为征兆的价值，它们仅作为征兆受到考察，——这类判断就其自身来说，是愚蠢行为。人们一定得费心尽力，尝试去领悟这种奇特的精妙（finesse），即生命的价值不能被估计。不能被一个活人，因为一个这样的人，是当事人，甚至是诉讼对象，而不是法官；不能被一个死人，出于另一个原因。——从一个哲学家的方面讲，在生命的价值中看到一个问题，这种情况甚至是对他自身的异议，对其智慧的一个问号，这是一种不明智的现象。——怎么？所有这些伟大的智者——难道他们不仅是颓废者，甚至还不曾智慧过？——不过，我还是回到苏格拉底的问题上。

3

就其出生而言，苏格拉底属于最底层人：苏格拉底是小民。[[34]](#footnote-34)大家知道，自己也看到，他有多么丑陋。[[35]](#footnote-35)可是，丑陋本身是个异议，在希腊人那里几乎是个反驳。苏格拉底究竟是个希腊人吗？丑陋常常足以是一种杂交、由于杂交而受阻碍的发展的标记。在另一种情况下，它表现为正在衰败的发展。犯罪侦察学家中的人类学者[[36]](#footnote-36)告诉我们，典型的罪犯是丑陋的：一个容貌的怪物，是一个精神的怪物（monstrum in fronte, monstrum in animo）。不过，这个罪犯是一个颓废者。苏格拉底是个典型的罪犯吗？——至少那个著名的相面人的判断与此没有相悖，尽管这让苏格拉底的朋友们听上去如此地有失体统。一个善于看相的外国人来到雅典，当面对苏格拉底说，他是一个怪物，——他心中隐藏着所有的恶习和情欲。而苏格拉底仅仅回答：“您了解我，先生！”[[37]](#footnote-37)——

4

不仅在被承认的本能中的粗野放荡和混乱无序，表明苏格拉底的颓废：逻辑的无节制扩张和那种佝偻病人的恶毒，[[38]](#footnote-38)也表明了他的特点。我们也千万别忘了那种听觉的幻觉，它作为“苏格拉底的精灵”[[39]](#footnote-39)，得到宗教的解释。在他身上，一切都是夸张的，滑稽演员，[[40]](#footnote-40)漫画，一切同时又是深藏的，隐晦的，秘密的。——我试图去领会，那个苏格拉底的关于理性=德行=幸福的等式，[[41]](#footnote-41)源自哪种特异体质：这种现有的最最古怪的等式以其特殊性，同古希腊人全部本能相悖。

5

随着苏格拉底，希腊人的鉴赏力骤然转向偏爱辩证法：[[42]](#footnote-42)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首先，一种高贵的鉴赏力被战胜了；随着辩证法，小民崛起。[[43]](#footnote-43)在苏格拉底之前，在上流社会，辩证的风格是被人拒绝的：它们被视为低劣的风格，是出乖露丑。人们告诫年轻人提防它们。人们也不信任所有这类表演的任何理由。就像实在人，实在的事物也不炫示自己的理由。炫示自己那全部的五个手指，这不体面。凡是得先证明自己的东西，没有多少价值。无论何处，只要权威属于良好风俗，只要人们不“说明理由”，而是发号施令，辩证论者就是一种丑角:[[44]](#footnote-44) 人们嘲笑他，人们不把他当回事。——苏格拉底是一个让人把他当回事的丑角：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

6

一个人只是在别无他法时，才选择辩证法。他知道，使用它会引起猜疑，而且它少有说服力。没有什么比一个辨证论者的效应更容易清除了：对每次有人滔滔不绝的集会的体验，都证明这点。辩证法仅仅是那些不具备任何其他武器之人手中的自卫手段。一个人肯定得强行获得自己本身的权力：在此之前他不会使用这个手段。所以犹太人是辨证论者；列那狐[[45]](#footnote-45)也是：怎么？难道苏格拉底也是？——

7

——苏格拉底的讥讽难道是造反的表达？是小民的记恨[[46]](#footnote-46)的表达？难道他在三段论的刀尖中，品味着自己作为被压迫者的好斗性？难道他在向受他诱惑的高贵者复仇？——作为辨证论者，一个人手持一件无情的工具；他可以用它成为一个暴君；通过取得胜利，让别人出丑。辨证论者听凭他的对手，让他自己去证明自己不是白痴：他激怒对手，同时让对手无可奈何。辨证论者使其对手的理智失效。——怎么？在苏格拉底那里，辩证法只是复仇的一个形式？

8

我业已说明，苏格拉底何以令人厌恶：所以更需要解释，他是如何吸引人的。——他发明了一种新的竞赛[[47]](#footnote-47)方式，对于雅典贵族圈子来说，他是竞赛的第一个剑术教师，这是一方面。他吸引别人，途径为触动希腊人的竞赛本能，——他给青年男子与少年人之间的角斗带来一种变体。苏格拉底也是一个大色鬼。[[48]](#footnote-48)

9

不过，苏格拉底预测到了更多的事情。他看穿了高贵的雅典人。他领会到，他的病例，他的病例的特异反应性，已经不是例外。同类的蜕化到处在悄悄地酝酿着：古老的雅典天数已尽。——苏格拉底明白，大家需要他，——他的手段，他的疗法，他那自我保存的个人诀窍……本能到处陷于混乱；人们距离纵欲仅有咫尺之遥：精神的怪物（monstrum in animo）是普遍的危险。“欲望要成为暴君；人们得发明一个更强大的反暴君”[[49]](#footnote-49)……那位相面人揭开苏格拉底的真相，说他是谁，说他是所有邪恶欲念的一个渊薮，这时，这位伟大的讽刺家还说了一句话，为别人理解他提供了钥匙。“这是真的，他说，可我要成为这一切的主人。”苏格拉底如何成了自己的主人？——归根到底，他的病例仅是一个极端的病例，仅在当时业已开始成为普遍困境的情状中，是最为触目的病例：当时，无人再能掌握自己，本能自身互相反对。作为这样的极端病例，他让人着迷——他那令人恐惧的丑陋，把他袒露在众目之前：作为回答，作为解决方案，作为对这个病例治疗的假象，他更让人着迷，这不言而喻。——

10

倘若人们有必要，把理性变成一个暴君，就像苏格拉底做的那样，那么，其他什么东西制造暴君的危险，就肯定不小。理性当时被作为女救星推荐，无论苏格拉底，还是他的“病人们”，都不能自由地是理性的，——但这是绝对必要的（de rigueur），是他们最后的手段。整个希腊思维诉诸于理性的狂热，透露出一种困境：人们陷于危险，人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毁灭，要么——荒谬地理性……从柏拉图开始，希腊哲学家们的道德主义局限于病态；而他们对辩证法的重视同样如此。理性=德行=幸福，这仅仅意味着：人们必须效仿苏格拉底，制造一种持续的日光，——理性的日光，[[50]](#footnote-50)以对抗蒙昧的欲望。人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聪明，清醒，明白：对于本能和无意识的任何让步，都会导致没落……

11

我已经说明，苏格拉底靠什么吸引人：他似乎是个医生，是位救世主。有无必要，揭示他那“绝对理性”的信仰中含有的谬误？——以为对颓废宣战，就能摆脱它，这是哲学家和道德学家那一方的自我欺骗。摆脱，这是他们力不能及之事：他们作为手段，作为救药所选择的东西，其自身仅仅又是颓废的一种表达——他们改变颓废的表达方式，他们没有祛除颓废自身。苏格拉底是个误解；那整个劝善的道德，基督教的也一样，是个误解……最刺目的日光，绝对的理性，明亮、清醒、小心、自觉、拒绝本能、抵抗本能的生活，其自身只是一种疾病，另一种疾病——完全不是通向“德行”，“健康”和幸福的回归之路……必须战胜本能——这是颓废的公式：只要生命在上升，幸福等于本能。——

12

——这个所有自欺者中最聪明的人，他自己领会到这点吗？难道最后，在自己勇敢赴难之际的智慧里，他对自己道出了这点？……苏格拉底想死：——不是雅典人，是他自己端起毒杯，他向雅典人索要毒杯……“苏格拉底不是医生，他悄声自语：这里只有死神是医生……苏格拉底自己仅是染病已久……”[[51]](#footnote-51)

**哲学中的“理性”**

1

您问我，哲学家都有哪些特异体质？……比如他们缺乏历史的意识，他们对于生成之表象自身的憎恨，他们的埃及主义。[[52]](#footnote-52)当他们从永恒的视角出发（sub specie aeterni），对一件事进行非历史化时，——当他们把它做成木乃伊时，自以为在向一件事表示尊敬。几千年来哲学家们处理过的一切，是概念的木乃伊；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生动活泼地出自他们之手。这些概念偶像的侍从，当他们朝拜时，他们在杀戮，他们在制作标本，——当他们朝拜时，对一切的一切造成生命危险。死亡，变化，年岁，如同生育和生长，这些对他们来说是异议，——甚至是反驳。存在的不生成；生成的不……可他们全体，甚至带着绝望，相信存在者。因为他们无法弄到它，他们就寻找理由，别人为何对他们隐瞒它。“这里肯定有一种假象，一种欺骗，以至于我们无法感知存在者：骗子身藏何处？”——“我们抓到他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大叫，这就是感性！这些感官，它们一向就是这么不道德，关于这个真实的世界，它们没有告诉我们真相。教诲就是：摆脱感官的欺骗，摆脱生成，摆脱历史，摆脱谎言，——历史无非就是对感官的迷信，对谎言的迷信。教诲就是：对迷信感官的全体说不，对人类全部的剩余说不：这个全部就是‘民众’。当哲学家，当木乃伊，带着一种掘墓人的表情，去表现单调的一神论[[53]](#footnote-53)！——尤其要摆脱肉身，这个感官的可怜巴巴的愚蠢的成见（idée fixe）!它负载着世上存有的全部逻辑错误，甚至还不象话地反驳，尽管摆出真实的架势，这已足够狂妄！”……

2

我怀着崇高的敬意，把赫拉克利特的名字拿到一边。要是别的哲学家指责感官的明证，是因为它们显示丰富和多变，那么他指责感官的明证，是因为它们显示事物，似乎它们具有持久和一致的特点。赫拉克利特对感官也不公平。其实它们既不以如埃利亚学派[[54]](#footnote-54)相信的方式说谎，也不以如他相信的方式说谎，——它们根本就不说谎。我们用它们的明证制造出的东西，这才加入了谎言，比如统一的谎言，物性、实体、持续的谎言……“理性”是我们篡改感官明证的根源。只要感官展示生成，灭亡，变换，它们就没说谎……不过，赫拉克利特在这点上将永远是对的，即存在是个空洞的虚构。“虚假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真实的世界”仅仅是胡编的……

3

——借助我们的感官，我们拥有多么精细的观察工具啊！比如这个鼻子，还没有一个哲学家怀着崇敬和谢意说起过它，它暂时甚至是我们可以支配的最精巧的仪器：能够分辨即使分光镜也无法辨别的运动的最小差异。我们今天拥有科学的程度，恰好让我们下了决心，接受感官的明证，——我们学会了使它们更加敏锐，去武装它们，透彻地思考它们。余下的是怪胎和“尚且不是的”科学：这指的是形而上学，神学，心理学，认识论。或者形式科学，符号理论：就像逻辑学和那种应用逻辑，数学。在它们中间，真实性根本未曾现身，甚至没有作为问题出现；同样没有作为提问出现，即这样一种符号协定，正如逻辑，[[55]](#footnote-55)究竟具有何种价值。——

4

哲学家的另一种特异体质危险性同样不小：这就是混淆始末。他们把那最后到来的东西——可惜！因为那根本就不该到来！——把那些“最高的概念”，这就是那些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现实那蒸发着的最后的雾气，作为开端设置在开端。这又是他们进行崇拜的表达方式：高级的东西不允许从低级的东西里长出，根本不允许长成……教诲就是：所有第一等级的东西，必须是其自身的原因（causa sui）。来源于其他被视为异议，视为价值的不可靠。所有最高的价值均隶属第一等级，所有最高的概念，存在者，绝对者，善，真实，完美——这一切不可能是生成的，也就一定是其自身的原因。不过，这一切也不可能彼此不同，不可能自相矛盾……由此他们有了自己那令人吃惊的概念“上帝”……那最后的，最单薄的，最空洞的东西被设置为起始，自因，最最真实的存在者……[[56]](#footnote-56)人类当初该认真对待病蜘蛛的脑疾！——人类曾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5

——最后让我们回答，我们以何种不同的方式（——我出于礼貌说我们……）观察谬误和假象的问题。从前，人们把变化，转换和生成，统统看成假象的证明，看成某种会把我们引入歧途的事物存在的标记。今天，我们相反地看到，恰恰是理性和偏见迫使我们，设定统一，同一，持续，实体，起因，物性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自己卷入谬误，强制我们陷于谬误；根据我们这里的一种严格的复核，我们对此十分肯定，即此处有谬误。这同伟大天体的运动别无两样：就天体的运动来说，谬误把我们的眼睛，而在此处，谬误把我们的语言当作可靠的辩护者。根据其起源，语言属于心理学发育最不完善之形式的时代：当我们意识到语言形而上学的基本前提时，用德语说：是理性的基本前提，我们就变成了一种粗俗的拜物生灵。[[57]](#footnote-57)这个生灵到处看见案犯和行为：它相信意志根本就是起因；它相信“我”，相信我是存在，相信我是实体，并且把对于我是实体的信仰，投射到万物之上——它借此才创造了“事物”这个概念……存在到处被设想，被强解为起因；从“我”这个构想中，才导出，作为派生，“存在”这个概念……一开始就存在着谬误的巨大厄运，以为意志是某种起效的东西，——意志是一种能力……今天我们知道，它只不过是个单词……很久以后，在一个一千倍地得到启蒙的世界里，哲学家们惊讶地意识到理性范畴[[58]](#footnote-58)运用中的可靠性，以及主观的确定性：他们推断，这些同样的理性范畴不可能源自经验，——全部的经验与此相悖。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在印度如同在希腊，人们曾有同样的失策：“我们肯定曾经处在一个更高级的世界里（——而不是在一个非常低级的世界里：这也许曾是事实！），我们肯定曾是神圣的，因为我们拥有理性！” [[59]](#footnote-59)……其实，至今为止，没有什么比关于存在的谬误更有一种素朴的说服力了，比如像埃利亚学派表述的那样：我们说出的每个词，每个句子，都在为这种谬误讲话！——即使是埃利亚学派的对手，也受到了他们那存在概念的制约：德谟克利特[[60]](#footnote-60)就是其中一个，他发明了原子……语言中的“理性”：一个多么具有欺骗性的老妪！我担心，我们无法摆脱上帝，因为我们还相信语法……

6

人们将感谢我，倘若我把一个如此根本，如此新颖的洞见归纳成四个命题：我以此让理解变得容易，我以此向异议挑战。

第一个定律。把“这个”世界解释为假象的理由，相反证明了它的实在性，——另一种实在性完全是无法证明的。

第二个定律。人们归诸于事物“真正的存在”的特征，是非存在的、虚无的特征，——人们从与真实世界的矛盾中，建造出“真正的世界”：事实上这是一个虚假的世界，就此而言是一种道德和视阈上的幻觉。

第三个定律。把一个“另外的”世界编造成这个世界，这毫无意义。前提是，对于生命的诽谤，蔑视和怀疑的一种本能，在我们身上不怎么强大：否则的话，我们会以对一种“另外的”，一种“更好的”生活的幻觉，来报复生命。

第四个定律。把世界分成一个“真正的”和一个“虚假的”世界，无论以基督教的方式，还是以康德[[61]](#footnote-61)（毕竟是个狡猾的基督徒）的方式，只是颓废的一种意志移植，——没落的生命的一种征兆……艺术家对假象的评价高于对现实的评价，这不是针对这个定律的异议。因为“假象”在这里意味着又一次的现实，只是在一种选择，加强和修正之中……悲剧艺术家不是悲观主义者，——他恰恰赞同所有成问题的和可怕的事物，他是狄俄尼索斯的[[62]](#footnote-62)……

**“真实的世界”如何最终成了寓言**[[63]](#footnote-63)

——**一个谬误的历史**

1．真正的世界对智者，虔诚者和有德行者来说是可以达到的，——他生活在其中，他就是它。

（观念最古老的形式，比较明智，简单，令人信服。对这个句子的改写“我，柏拉图，是真理”。）[[64]](#footnote-64)

2．真正的世界，现在是不可达到的，但许诺给智者，虔诚者，有德行者（“给悔过的罪人”）

（观念的进步：它变得精巧，棘手，不可把握，——它成了女人，它成了基督教的……）

3．真正的世界，不可达到，无法证明， 不可许诺，但已经被想好，是一个安慰，一项义务，一个命令。[[65]](#footnote-65)

（本质上是那个旧的太阳，但透过迷雾和怀疑；观念变得精深，灰白，北方式，哥尼斯堡式。[[66]](#footnote-66)）

4．真正的世界——无法达到？无论如何未达到。未达到也就是未知的。所以也无法安慰，拯救，赋予义务：某种未知的东西能让我们承担什么义务？……

（拂晓。理性的第一个哈欠。实证主义[[67]](#footnote-67)的雄鸡啼鸣。）

5．“真正的世界”——是一个不再有任何用处的观念，甚至不再让人承担义务，——一个无用的，一个成为多余的观念，因此是一个被驳斥的观念：让我们废除它！

（天明；早餐；健全的理智（bon sens）和快活心情的回归；柏拉图羞得面红耳赤；所有自由的英才[[68]](#footnote-68)大声喧哗。）

6．我们已经废除了真正的世界：剩下的是什么世界？也许那个虚假的世界？……但是不！连同那真正的世界，我们也把那虚假的世界废除了！

（中午；阴影最短的时刻；最长久的谬误的终结；人类的顶峰；查拉图斯特拉开始。[[69]](#footnote-69)）

**作为反自然的道德**

1

所有的激情都有一个时段，那是当它们只是灾难性的时候，当它们以愚昧的重力把它们的牺牲者拖倒的时候——一个后来的，过了很久的时段，当它们同精神联姻，“精神化”的时候。从前人们因为激情中的愚蠢，向激情自身开战：人们发誓要将其消灭，——所有古老的道德怪物都一致主张“人们必须抑制自己的激情”（il faut tuer les passions）。对此最著名的表达形式在《新约》中，在那个山上宝训[[70]](#footnote-70)里，顺便说一下，在那里，事物绝对不是被人从高处观察的。比如，在涉及到性的问题时那里有言：“若是你的右眼叫你生气，就剜出来丢掉”：幸亏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按照这个训令行事。消灭激情和欲望，仅仅是为了预防其愚蠢及其愚蠢的不快后果，就我们今天看来，这本身只是愚蠢的一种极端形式。我们不会对那些牙医再表示赞叹，倘若他们以拔掉牙齿的方式医治牙痛……另外，合理地说，在基督教生长出的土壤上，“激情的精神化”的这个概念，根本不可能被构想。众所周知，最早的教会为了培植“精神的贫困”，[[71]](#footnote-71)而反对“才智人士”：怎么能期待它展开一场反对激情的理智的战争呢？教会以彻底的切除来抵制激情：它的策略，它的“治疗手段”是阉割术。它从来不问：“人们该如何使一种欲望精神化，得到美化和神圣化？”——它在任何时代都把风纪的重点放在根除（根除感性，自负，统治欲，占有欲和复仇欲[[72]](#footnote-72)）上。——不过从根子上攻击激情，这意味着：教会的实践是敌视生命的……

2

这同样的手段，切除，根除，也被那样的人选用，出于本能地同一种欲望进行斗争。他们意志太软弱，退化太厉害，无法在欲望中自行克制：也被那样的天性选用，他们需要苦修会，[[73]](#footnote-73)用比喻的话说（不过没有比喻），需要任何一种最终的敌对的声明，一条间于自己和一种激情的鸿沟。这些极端的手段仅对那些退化者不可或缺；意志的衰弱，更具体地说，无法对一种刺激做出反应的无能，本身只是退化的另一种形式。针对感性的极端敌意和不共戴天，始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征兆：以此人们得以推测这样一个好走极端者的整体状态。——此外，那种敌意，那种仇恨会登峰造极，一旦这些天性不再足够地坚强，自己去接受彻底的治疗，回绝他们的“魔鬼”。请回顾一下教士，哲学家以及艺术家的整个历史：对付感官的最恶毒的话，不是出自阳痿者，也不是出自禁欲主义者，而是来自不可能是的禁欲主义者，来自那些有必要当禁欲主义者的人……

3

对感性的升华叫爱：爱是对于基督教的一个伟大胜利。另一个胜利是我们对敌意的升华。其内容是，人们深刻地领会拥有敌人的价值：简而言之，同以前不一样地行动和推论，相反地行动和推论。教会在一切时代都想消灭它的敌人：我们，我们这些伤风败俗者和反基督者，在教会的存在这点上，看到了我们的优势……就是在政治中，现在敌意也得到升华，——变得更明智，更审慎，更宽容。几乎每个党派都领会到，它们那自我保存的利益所在，正是反对党力量不衰；而这对大政治同样有效。特别是一个新的创造物，比如一个新的帝国，比之需要朋友，更需要敌人：只有在对立中，它才感到自己是必要的，在对立中它才成为必要……针对“内心的敌人”，我们的行为没什么两样：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对敌意进行了升华，就是在这里我们也领会了它的价值。人要多产，充满矛盾是代价；人要永葆青春，只有以此为前提，即灵魂不伸懒腰，不贪图平和……没有什么比以前那种求得“灵魂平和”[[74]](#footnote-74)的愿望，基督教的愿望，更让我们感到陌生了；没有什么比道德母牛和心安理得的好运,更不让我们嫉妒了。如若放弃战争，就是放弃了伟大的生命……在许多情况下“灵魂平和”只是一种误解，——是某种不知道诚实地称呼自己的另类。不绕弯子，不带偏见地举几个例子。比如，“灵魂的平和”可以是一种丰富的动物性进入道德（或宗教）的柔和的射线。或者疲惫的开始，是傍晚，任何一种傍晚，投下的第一道暗影。或者是空气湿润，南风吹拂的标记。或者是无意识地对一种顺利的消化的谢意（有时被称为“博爱”）。或者是痊愈者的缄默，他重新品尝万物，等待……或者是跟随一种我们那占支配地位的激情得到强烈满足而来的状况，一种少有的饱足的舒适感。或者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欲求，我们的恶习的衰老。或者是被虚荣说服，道德地打扮自己的懒惰。或者在一种由于不确定性而长时间地紧张和受折磨之后，一种确定性，哪怕是骇人的确定性的出现。或者在行动，创造，劳作和意愿中间的成熟和熟练的表现，那平静的呼吸，那业已达到的“意志的自由”……偶像的黄昏：谁知道呢？也许仅是一种“灵魂的平和”……

4

我概括地提出一个原则。道德中的每种自然主义[[75]](#footnote-75)，也就是说，每种健康的道德，都受生命的一种本能支配，——生命的任何一种戒律都被借助某种关于“应该”和“不应该”的法则得以贯彻，生命道路上的任何一种阻碍和敌意被借此清除。相反，那反自然的道德，这意味着几乎每种至今为止被倡导、受崇拜和鼓吹的道德，恰恰反对生命的本能，——它时而是一种隐蔽的，时而是一种响亮和狂妄的、对于这种本能的谴责。通过说“你们的心，上帝知道”，[[76]](#footnote-76)它对生命最低和最高的欲望说不，而且把上帝当作生命的敌人……上帝喜爱的圣人，是那个理想的阉人……生命结束在“上帝的疆域”开始的地方……

5

假如，一个人领会了这样一种反对生命之行为的亵渎神灵性质，而这种反对在基督教道德中几乎已变得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他由此也幸运地领会到其他一些什么：这样一种反对的无用，虚假，荒谬和欺骗性。来自生活者一边的对于生命的谴责，最终只是生命之某种类型的征兆：有理还是无理，借此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提出。人们必须在生命之外有一个立场，此外对生命有很好的认识，如一个人、许多人、所有人经历过的一样，这样才能真正触及生命的价值[[77]](#footnote-77)这个问题：有足够的理由去领会，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可企及的问题。倘若我们谈论生命的价值，我们是在生命的激励，在生命的视阈中谈论的：生命自身迫使我们设定价值，倘若我们设定价值，那么生命自身通过我们进行评价……由此推论，那个把上帝作为生命的对立概念和谴责的、那个道德上的反自然，同样只是生命的一种价值判断——不过是什么生命的？是何种类型的生命？——但我已经作答：是那个走向没落的、已被削弱的、疲惫的和受到谴责的生命的价值判断。就迄今为止被理解的那样，道德——就像它最近还被叔本华表述为“对于生命意志之否定”[[78]](#footnote-78)那样——是颓废的本能自身，它把自己变成一道命令：它说：“去毁灭吧！”——它是受谴责者的判决……

6

最后再让我们斟酌一下，说“人该如此这般和这般如此！”，这有多么天真。现实向我们展示了类型的一种令人迷醉的丰富，一种挥霍的形式游戏和形式变化的繁盛：某个可怜的、是道德学家的游手好闲者对此说：“不！人应该是别样的”？……他甚至知道，人应该怎样，这个可怜虫和伪君子，他把自己画到了墙上，并且说：“看哪这人！”[[79]](#footnote-79)……但是，即使道德学家只面向一个人，对他说：“人该如此这般和这般如此”，他也没有停止，把自己弄得滑稽可笑。个人是命运的一部分，前后一样，对一切将要到来之事和成为之事，这更是一条法则，一种必然。对他说“请改变自己”，意味着要求改变一切，甚至还朝后追溯……真的有一些坚定的道德学家，他们要人变成另外的样子，即有德行，他们要别人效仿他们的模样，亦即当伪君子：为此他们否定世界！不要狭隘的疯狂！不要谦逊的苛求！……道德，只要它就其自身进行谴责，而不是从生命的角度、理由和意图出发，就是一种特别的谬误，我们就不必对它表示同情，它就是一种退化的特异体质，它已经酿成无穷的祸害！……我们其他人，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相反为所有类型的理解，领会和赞同，敞开我们的心扉。我们不轻易否定，我们在当肯定者中寻觅我们的荣耀。我们越来越明白那种经济学。为了生命法则中的那种经济学，它需要，也懂得去利用那些被教士、教士病态理性中的神圣愚昧所谴责的一切，从伪君子，教士，有德行者的可憎一类人身上，获得它自己的好处，——什么好处？——不过我们自身，我们这些反道德主义者，在这里就是答案……

**四种大谬误**

1

混淆原因和结果[[80]](#footnote-80)的谬误。——没有什么比混淆结果和原因更危险的谬误了：我把这个谬误称作理性真正的堕落。尽管如此，这个谬误属于人类最旧和最新的习惯：它甚至在我们中间被神圣化，它拥有“宗教”和“道德”的名称。宗教和道德所表达的每句话，都包含着它；教士和道德立法者是理性堕落的始作俑者。——我举一个例子：人人知道著名的柯尔纳罗[[81]](#footnote-81)的那本书。在书中，他把自己少量的特种饮食，当作幸福长寿的——而且有德行的——生活的良方推荐给别人。很少有书曾被这么多的人读过，直到今天在英国，每年还要印几千册。我毫不怀疑，几乎没有一本书（《圣经》除外，而这是公平合理的）像这么个善意的怪物一样，曾造成如此多的祸害，缩短了这么多的生命。其原因是：混淆了结果和原因。这个诚实的意大利人在他的特种饮食中看到自己长寿的原因：而其实，长寿的先决条件，即特别缓慢的新陈代谢，少量的消耗，才是他少量的特种饮食的原因。吃多或者吃少，他并没有选择的自由，他的知足不是一个“自由的意志”：要是他多吃，他会得病。谁如果不是一条鲤鱼，就不仅最好，而且必须像样地吃饭。我们时代的学者，精神力量快速消耗，使用柯尔纳罗的规定饮食，只会致自己于死地。请相信专家。[[82]](#footnote-82)——

2

每种宗教和道德当作基础的，是这样一句最普遍的套语：“请做这个和这个，不要做那个和那个——这样你就会幸福！不然的话……”每种道德，每种宗教都是这样的命令，——我把这个命令称为理性的巨大原罪，[[83]](#footnote-83)不朽的非理性。在我的嘴里，那句套语转变为它的反面——我的“一切价值的重估”的第一个例子：一个发育良好的人，一个“幸运者”，必须采取某些行动，而本能地害怕其他的行动，他把自己生理上表现出的秩序，带入他与人和物的关系中。用公式说：他的德行是他的幸福的后果……长寿，兴旺的子孙后代，并非是德行的报酬，相反，德行自身更是新陈代谢的一种延缓，它也是一种长寿，兴旺的子孙后代，简而言之，是柯尔纳罗主义的后果的一种。——教会和道德说：“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会由于恶习和奢侈而灭绝。”我那重建的理性说：当一个民族灭绝和生理上蜕化时，恶习和奢侈就由此产生（这就是说需要越来越强烈和频繁的刺激，就像每个疲惫的生灵所熟悉的那样）。这个年轻人过早地脸色苍白和精神萎靡。他的朋友们说：这归咎于这个和这个疾病。而我说：他得病的原因是，他不能抵抗疾病，这本身已经是一种衰退的生命，一种遗传性衰竭的后果。报纸读者说：这个政党用这样一个错误搞垮自己。我的更高的政治说：一个犯这样错误的政党，已穷途没落——它不再拥有安全本能。每种意义上的每种错误，是本能衰退和意志消解的结果：由此大家几乎能给坏下定义了。所有的好是本能——而且，由此说来，是容易的，必须的，自由的。艰难是个异议，上帝同英雄在类型上有别（用我的语言：轻松的脚步是神性的第一属性）。

3

一种错误的因果联系的谬误。——在所有的时代，人们都相信自己知道，何为原因：不过我们从哪里获得我们的知识，准确地说，我们知道在这里的信念？那是从著名的“内在事实”领域出发的，可迄今为止其中没有一个事实证明自己是事实。我们相信，在意志的行为中自己就是原因；我们认为，至少在这里当场逮住了因果联系。人们同样不怀疑，一个行动的所有前项（antecedentia），它的原因，可以在意识中找到，只要去找，能被重新发现——作为“动机”[[84]](#footnote-84)：否则人们对此没有自由，对它也就不负责任。最后，谁会否认，一个想法总有东西造成？是自我造成这个想法？……在这三个“内在事实”中，因果联系似乎以它们保障自己，第一个和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是作为原因的意志；一种意识（“精神”）作为原因，接着还有自我（“主体”）作为原因的设想仅是后来的，而在此之前,因果联系被意志确定为业已存在，作为经验[[85]](#footnote-85)……在此期间我们作了更好地思考。我们今天已不再相信以前的任何一句话。这个“内心的世界”充满幻觉和磷光：意志为其中之一。意志不再推动任何东西，也不再解释任何东西——它仅仅伴随过程，它也可以缺席。所谓的“动机”：另一个谬误。只是意识的一种表面现象，以及行为的附带物，与其说它表现，不如说它掩盖了一种行为的前项。至于自我！它已经变成了寓言[[86]](#footnote-86)，虚构，语言游戏：它已完全彻底地停止了思考，感觉和打算！……结果是什么？根本就不存在精神的原因！这方面全部所谓的经验都见鬼去了！这就是结果！——而我们彬彬有礼地滥用了那种“经验”，于是我们创造了作为一个原因世界、一个意志世界、一个精灵世界[[87]](#footnote-87)的世界。最古老和最悠久的心理学参与其事，它做的事别无其他：对它来说，一切事件是一项行为、一切行为是一个意志的结果，对它来说，世界成了众多案犯，一个案犯（一个“主体”）藏身到所有事件之后。人从自身投射出他坚信不移的三个“内在事实”，意志，精神，自我——他先从自我这个概念里，取出存在[[88]](#footnote-88)这个概念，根据他的样子[[89]](#footnote-89)，根据他的作为原因的自我概念，把“物”设定为存在者。他以后在物中不断重新找到的，只是他塞入其中的东西，这又有什么奇怪？物自身，再说一遍，物的概念，只是关于相信自我是原因的一个反映罢了……甚至你们的原子，我的机械论者和物理学家先生们，在你们的原子里，还残留着多少谬误，多少蜕化的心理学！——更不用说“自在之物”[[90]](#footnote-90)和形而上学家[[91]](#footnote-91)们的可怕的耻辱（horroendum pudendum）了！精神作为原因的谬误被混淆为现实！被设定为现实的尺度！被称为上帝！——

4

幻想的原因的谬误。从梦出发：比如，对于远处一声炮响的某种感觉，但被强行追加了一个原因（常常是一部完整的小小说，其中的主角恰恰是那个梦幻者）。感觉这时延续下去，以一种回响的类型：它仿佛等待着，直到原因冲动允许它，走到前台——，从此不再作为偶然，而是作为“意义”。炮声以一种因果关系的方式，在一种时间的表面倒转中出现。后来的东西，那个动机说明被首先经历，经常携带着犹如在闪电中飞驰而过的上百种细节，接踵而至的是炮声……出了什么事？某一状态造成的表象，被误解为同样状态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在清醒时也这么做。我们那大多的普通感觉——器官在作用和反作用中，抑制、压力、紧张和爆发的所有类型，如同在交感神经系统[[92]](#footnote-92)的特殊状态里——都激发起我们的原因冲动：我们想得到一个理由，处于这样或那样的状态中，——好的或者坏的状态中。确定简单的事实，我们处于这样或那样的状态中，这从来不让我们满足：当我们对一个事实给出一种动机说明时，我们才会认可这个事实，——会意识到它。——在这样的情况里，记忆不用我们知道就会进入工作状态，唤起以前同样类型的状态和与此相互缠绕的因果解释，——不是其因果联系。当然，以为表象和伴随着的意识过程是原因，这个信念也由记忆同时唤起。由此产生了对某种原因解释的习惯，而这种解释事实上阻碍甚至排除对于原因的一种探究。

5

对此的心理学解释。——把某些陌生的东西归溯到某些陌生的东西上，使人轻松，满足，此外还有一种权力感。伴随着陌生之物的是危险，不安，忧虑——第一个冲动就是消除这种令人难堪的状况。第一原理：有一个解释比没有好。因为归根到底牵涉到的仅是摆脱压抑人的表象的愿望，人们就不怎么严格地对待摆脱它们的手段：陌生事物借此宣布自己为已知的第一个表象，让人感到如此舒适，以至于人们把它“当作真实的”。（“力量的”）快感证明是真理的标准。——原因的冲动，也就是由恐惧感决定和激起。“为什么？”的问题，只要可能，就不该是为了原因自身的缘故而提供原因，相反是原因的一个种类——一个令人宽慰、解脱和轻松的原因。某些已知的事物，被经历过的事物，作为原因被录入记忆的事物，是这种需求的第一个结果。新的、未经历过的、陌生的事物，被作为原因排除在外。——也就是说，被寻找的不是某种作为原因的解释，而是某种被挑选的和受偏爱的解释。借助这类解释，陌生的、新的和未曾经历过的感觉，能够最迅速和最频繁地得以清除，——最通常的解释。——结果是：某种原因的设定愈来愈占优势，集结成系统，最后取得支配地位，这就是说，简单地排除了其他的原因和解释。——银行家立刻想到“生意”，基督徒立刻想到“罪孽”，姑娘立刻想到她的爱情。

6

道德和宗教的全部领域可归到这个幻想的原因概念之下。对于令人不快的总体感觉的“解释”。同样的感觉由仇视我们的生灵（凶恶的幽灵：最著名的案例——歇斯底里作为女巫[[93]](#footnote-93)的误解）造成的。同样的感觉是由不能认可的行为造成的（“罪孽”感和“邪恶”感被归咎于一种生理的不愉快——人们总能找到对自己不满的理由）。同样的感觉被造成，作为惩罚，作为对一种我们不该做之事和不该是之人的惩罚和清偿（被叔本华以公开的形式概括为一个命题，在此之中道德作为其本身、作为生命那实际的投毒者和诽谤者出现）：“每种巨大痛苦，不管它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表明我们理应得到；因为，倘若我们并非应得它，那么它就不会光顾我们。”[[94]](#footnote-94)《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2，666）。同样的感情被造成，作为轻率、结局糟糕的行为的后果（情绪，感官被设定为原因和“有过失”；生理的紧急状态借助其他的紧急状态被解释为“理应得到”）。——对令人愉快的总体感觉的“解释”。同样的感觉由信任上帝造成。同样的感觉由对善行的意识造成（所谓的“善良”，一种生理状况，它有时同一种顺利的消化酷似得难已区分）。同样的感觉由事业的成功结局造成（——天真的错误推断：一项事业的成功结局根本不能给一个忧郁症患者或者一个帕斯卡[[95]](#footnote-95)带来令人愉快的总体感觉）。同样的感觉由信，爱，盼望[[96]](#footnote-96)造成——基督教的德行。——事实上，所有这些臆想的解释都是结果状态，似乎是乐意或者不乐意之感觉的一种错误的方言翻译：人们处在希望的状态里，因为生理的基本感觉重又变得强大和丰富；人们信任上帝，因为充裕和强大的感觉给他带来安宁。——道德和宗教完全属于谬误的心理学：在任何单个情况中，原因和效果被混淆；或者真理被同信以为真的东西的效果混淆；或者意识的一种状态被同这个状态的因果关联混淆。

7

自由意志的谬误。——我们今天不再同情“自由意志”的概念：我们太清楚它是什么了——世间最臭名昭著的神学家的手腕，目的是让人类按他们的想法“负起责任”，这就是说让人类依赖于自身……我在这里仅展示一切让人承担责任之做法的心理学。——在有人寻找责任性的所有地方，通常有着惩罚和意愿审判的本能，在那里寻找机会。倘若这个或者那个存在，被追溯到意志，意图和责任的行为，人们就会脱下他无辜的生成的外衣：关于意志的学说实际上是被发明的，其目的是惩罚，也就是说，其目的是发现有罪的意愿。整个古代心理学，意志心理学的前提是，其发明人，在古代政体的顶层是僧侣，想给自己创造一种进行惩罚的权力——或者想要给上帝创造对此的一种全力……人被认为是“自由的”，为了能受到判决和惩罚，——为了能变得有罪：因此，任何行为一定是故意的，任何行为的起源被设想为存在于意识中（——由此心理学事物中最基本的弄虚作假，被确定为心理学自身的原则……）今天，我们已进入相反的运动，尤其是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在竭尽全力，要把罪与罚的概念，重新清除出世界，试图让心理学，历史，自然，社会机构和它们的制裁，变得纯净。在我们眼里，没有比神学家更激进的敌对势力了。他们继续以“道德的世界秩序”[[97]](#footnote-97)概念，用“惩罚”和“罪责”来玷污生成的无辜。基督教是刽子手的一种形而上学……

8

我们的学说只能是什么？——没人把人的特性给予人，上帝不能，社会也不能，他的父母和祖先也不能，还有他自己也不能（这里最后否定的观念的荒谬性，作为“思维的自由”，已被康德，或许也已被柏拉图传授过[[98]](#footnote-98)）。一个人就这么存在，被创造成这样或者那样，处在这样的状况下，这样的环境中，没人该为此负责。他那本性的宿命[[99]](#footnote-99)，无法从所有已是和将是之存在的宿命中剔除。他不是一个自身意图、一个意志、一个目的[[100]](#footnote-100)结果，不会用他去尝试，实现一个“人的理想”或者一个“幸福的理想”或者一个“道德的理想”，——想要把自己的本性推入任何一种目的，这是荒谬的。我们发明了“目的”这个概念：现实中目的阙如……人是必然的，人是一段厄运，人属于整体，人身处整体中，——不存在任何东西可以判决，衡量，比较和责难我们的存在，因为这意味着判决，衡量，比较和责难整体……不过除却整体什么也没有！没人再得负责，存在的类型不再允许被归诸于第一因[[101]](#footnote-101)，世界既非知觉，也非作为“精神”的一个统一体，这才是伟大的解放，——生成的无辜[[102]](#footnote-102)这样才能重建……“上帝”这个概念至今是针对此在[[103]](#footnote-103)的最大异议……我们否定上帝，我们否定上帝的责任：借此我们才能拯救世界。——

**人类的“改善者”**

1

大家知道我对哲学家的要求，即站到善与恶的彼岸[[104]](#footnote-104)，——超越道德判断的错觉。这个要求出自一种由我首次表达的洞见：根本就不存在道德事实。道德判断同宗教判断有这么个共同点，即它相信不是现实的现实。道德只是对某些现象的解说，确切地说，一项误说。同宗教判断一样，道德判断隶属无知的一个阶段。而在这个阶段，甚至那现实的概念，对现实和幻觉的区分，尚告阙如：所以在这样一个阶段上的“真理”，它描述的纯粹是我们今天称为“想象”的东西。就此说来，道德判断始终无法被认真对待：作为这样的判断，它一直仅包含荒谬。不过，作为符号学[[105]](#footnote-105)它价值不凡：至少对知情者，它袒露出文化和内心世界的最具价值的现实情况，可它们不够明白，无法“理解”自身。道德只是符号话语，只是症状学[[106]](#footnote-106)：大家应该已经知道，要想从中获益，问题何在。

2

暂且举第一个例子。在所有时代，大家都想“改善”人：这首先就叫道德。不过，在这同一个词的下面，却隐藏着最最不同的倾向。不仅对人这个野兽的驯化，而且对人的某个种类的培育，都叫“改善”：正是这些动物学的术语表达了现实——当然，是那个典型的“改善者”，那个教士对此一无所知——宁愿一无所知的现实……把对一头动物的驯化称作对它的“改善”，就我们听来简直是开玩笑。知道动物园里发生什么事的人，会怀疑野兽真会得到“改善”。它会被弄得虚弱，不再那么有害，由于恐惧的沮丧情绪，疼痛，伤口，饥饿，变成病恹恹的野兽。——教士“改善”的、被驯服之人的情况别无二致。在中世纪早期，在教会实际上主要是一个动物园的时候，人们到处猎取“金发野兽”[[107]](#footnote-107)的最美丽的标本，——人们比如“改善”了高贵的日尔曼人。可是，这样一个被引诱到修道院里的日尔曼人，那个“被改善者”，日后看上去情况如何？如同一张人的漫画，如同一个怪胎：他成了“罪人”，他蹲在笼子里，被囚禁在许多十分可怕的概念中间……他躺在那里，身心交病，憎恶自身；充满对生命之生机的仇恨，充满对一切健壮和幸福之人的猜忌。简而言之，一个“基督徒”……用生理学的话说：在与野兽的斗争中，使之生病是削弱它的唯一手段。教会懂得这点：它败坏人，它使之虚弱，——可它自称，它“改善了”人……

3

让我们看所谓道德的另一个情况，某个种族和种类的培育情况。对此最了不起的例子是印度道德，作为《摩奴法典》[[108]](#footnote-108)被认可为宗教。在此设定的使命是，同时培育不少于四个种姓：僧侣的，武士的，农商的，最后是仆役的种姓，即首陀罗[[109]](#footnote-109)。在这里，我们显然不再身处驯兽人之中：前提是有百倍地温柔和理智的人种，才能制定出这样一种培育计划。从基督教的病房和牢狱氛围中走出，进入这样的更为健康，更高尚，更广袤的世界，人们会大舒一口气。同《摩奴法典》相比，《新约》是如何地可怜，气味是何等地难闻！——不过，就是这个组织也有必要是可怕的，——这次不是在同野兽的斗争中，而是在同它的对立概念，同非道德的人，同杂种人，同贱民[[110]](#footnote-110)的斗争中。而且，除了使他得病，它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让他变得无害，让他变得软弱，——那是同“多数”的斗争。也许没有比这种印度道德的保护条例更违背我们感情的东西了。比如第三条“关于不洁的蔬菜”的谕令（Avadana-Sastra I）规定，贱民允许吃的唯一食物，是大蒜和洋葱，与此相关，神圣的经文禁止给他们谷物或者携带种子的水果，或者水，或者火。同样的谕令规定，他们需要的水，不能从河里，也不能从泉眼里，更不能从池塘中汲取，而只能从沼泽入口，从由牲口踩踏而成的坑穴中获得。同时他们被禁止洗衣服和洗澡，因为恩赐给他们的水，只能用于解渴。最后有一个禁令，不让首陀罗妇女帮助贱民妇女分娩，同时也禁止贱民妇女，此时互相帮助……这样一种卫生警察不无成效：要命的瘟疫，可憎的性病，接着还有“刀法”，规定对男孩施行割礼，对女孩切除小阴唇。——摩奴自己说：“贱民是通奸、乱伦和犯罪的产物（——这是培育概念的必然后果）。”他们只配以尸布为衣裳，以破罐为餐具，以锈铁为饰物，以恶精灵为礼拜对象；他们该毫无安宁地四处流浪。他们不允许从左到右写字：使用右手和从左到右写字的权利，仅为有德行者和有种姓者所有。“——

4

这些规定有足够的教益：我们在其中有机会看到雅利安的人道[[111]](#footnote-111)，十足地纯粹，十足地天然，——我们懂得了，“纯粹血统”的概念是一种无害概念的对立面。另外事情也变得清楚，仇恨，贱民针对这种“人道”的仇恨，在哪个民族中得以永存，化为宗教，成为天才……以这个观点看，《福音书》是第一等级的一份文件；《以诺书》[[112]](#footnote-112)更是如此。——基督教源自犹太根基，只有作为这片土壤的植物才可理解，体现了对于培育、种族、特权等任何道德的反动：这是出色的反雅利安的宗教：基督教是对所有雅利安价值的重估，是贱民的胜利，是向穷人和低贱者传播的福音，是一切被践踏者、不幸者、失败者、被遗弃者针对“种族”的总暴动，——是作为爱的宗教的永恒的贱民复仇……

5

培育的道德和驯化的道德，它们在贯彻自身的手段上，彼此完全相称：我们可以确定这样的最高命题，为了创造道德，人们必须具有追求其对立面的绝对意志。我探究时间最长、意义重大和叫人害怕的问题是：人类“改善者”的心理学。一个小小的、本质上不起眼的事实，是所谓的虔诚的欺骗[[113]](#footnote-113)，是它给我提供了理解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通道：虔诚的欺骗，是所有“改善”人类的哲学家和教士的遗产。无论是摩奴，柏拉图，孔子[[114]](#footnote-114)，还是犹太和基督教的老师，都从不怀疑他们说谎的权利。他们从不怀疑其他所有的权利……用概括的话语，人们也许能说：迄今被用来使人类变得道德的所有手段，究其根源，是非道德的。——

**德国人失去了什么**

1

今天在德国人中间，享有精神，已经不够：还必须把它据为己有，并且放肆地使用精神……

也许我了解德国人，也许我自己可以告诉他们一些真相。新德国[[115]](#footnote-115)表现出大量遗传和习得的才干，以至于它能长时间地、甚至挥霍地使用那积聚起来的力量财富。这不是一种依靠这种财富成了统治者的高级文化，更不是一种讲究的鉴赏力，一种高贵的“本能”之美；但较之于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显示的，那是更男子气的德行。许多卓越的勇气和对自身的尊重，交往和互尽义务中的许多自信，许多勤奋，许多毅力——以及一种遗传的节制，而它与其说需要制动铁鞋，不如说需要芒刺。我补充一句，这里还提倡服从，不过这种服从不使人屈辱……没人蔑视他的对手……

大家看到，对德国人公正，这是我的愿望：在这点上我不想对自己不诚实，——所以我也必须对他们提出异议。获取权力，得付出高昂的代价：权力使人愚蠢……德国人——以前有人称他们为思想家的民族[[116]](#footnote-116)：他们今天真的还思想吗？——德国人现在厌倦了精神，德国人现在不信任精神，政治吞噬了对于真正精神事物的所有严肃——“德国，德国高于一切”[[117]](#footnote-117)，我担心，这已是德国哲学的终结……“德国有哲学家吗？德国有诗人吗？德国有好书吗？”在国外有人这么问我。我面红耳赤，但带着就是在绝望中也拥有的勇气回答：“有，俾斯麦！[[118]](#footnote-118)”能允许我承认，今天人们在读什么书吗？……该死的平庸本能！——

2

谁不曾忧伤地思考过，德国精神能是什么！可是，几乎近千年来，这个民族任意让自己变得愚蠢：没有一个地方像在这里一样，欧洲的两大麻醉剂，酒精[[119]](#footnote-119)和基督教，如此堕落地被滥用。近来甚至有第三样东西加入，单凭它，精神那所有精妙果敢的灵活性能被扼杀。这就是音乐，我们那受梗阻的和起梗阻效应的德国音乐。[[120]](#footnote-120)——在德国的智力中，有多少令人沮丧的沉重，疲塌，潮湿，睡衣和多少啤酒！那些青年男子，把他们的此在献给最富精神的目标，怎么可能在自己身上感受不到精神性的第一本能，精神的自我保存本能——而去啜饮啤酒？……博学青年的酒癖也许还不是对他们的博学的问号——甚至缺少精神，一个人也能是个大学者——，不过在任何别的方面他依旧是个问题。——这种啤酒在精神中造成的慢性的堕落，在哪里发现不了它！我曾经[[121]](#footnote-121)在一个几乎已经出名的事件里，指出了这样一种堕落——我们德国的第一个无神论者，那个聪明的戴维·斯特劳斯[[122]](#footnote-122)的堕落，他成了啤酒店福音和“新信仰”的作者……对“妩媚的褐色美人”以诗句发誓[[123]](#footnote-123)——忠诚至死……

3

我曾谈论德国精神：说它变得更加粗鄙，变得浅薄。这么说足够了吗？——实际上让我感到骇然的，完全是别的东西：在精神事物中，德国的严肃，德国的深沉，德国的热情，都每况愈下。不仅知性，而且激情也有变化。——我不时地[[124]](#footnote-124)接触到德国的大学：学者中盛行的是怎样的风气，精神性已经变得何等地荒芜、何等地自满和冷淡！倘若这里有人以德国的科学作为理由来反驳我，那是一个深深的误解——此外还是一个证据，即他没有读过我的一个字。十七年来[[125]](#footnote-125)我孜孜不倦地揭露我们时下科学活动的非精神化影响。今天，科学那巨大的势力，判处每位个人接受严酷的希洛人制[[126]](#footnote-126)。而具有完满、丰富、深沉之天性者，不再能找到适合于他们的教育和教育者，其原因就是这种奴隶制。我们的文化遭受的苦难，莫过于自负的游手好闲者和零碎不全的人性论的泛滥；我们的大学，违逆意愿地是这类让精神之本能变得枯萎的真正温室。整个欧洲已经对此有所了解——大政治骗不了任何人……德国越来越被视为欧洲的平淡乏味之地。我仍在寻找一个我能以我的方式严肃对待的德国人，——更在寻找一个与之相处我可以快活的德国人！偶像的黄昏：哦，今天谁能领会，这里的一个隐士从怎样一种严肃中得到恢复！——在我们身上，快活[[127]](#footnote-127)是最难理解的东西……

4

粗略估算一下：德国文化的没落不但显而易见，而且对此也不乏充分根据[[128]](#footnote-128)。归根到底，任何人的付出不能多于他的拥有——个人如此，民族亦同。有人为权力、大政治、经济、世界交往、议会制、军事利益付出自己的精力，——有人在这个方面给出一定量的知性、严肃、意志、自我克制，即他自身，那么在另一方面他就缺少这样的量。文化和国家[[129]](#footnote-129)——在这点上人们不自欺——是敌对者：“文化——国家”仅仅是个现代观念。一方以另一方为生，一方靠另一方的支出生长。文化的所有伟大时代是政治的没落时代：文化意义上的伟大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歌德因为拿破仑现象而心灵洞开，——而对于“自由战争”他又心灵关闭[[130]](#footnote-130)……就在德国作为强国崛起之时，法国获得了作为文化大国的一种变化了的重要性。今天，许多新的严肃，许多新的精神激情迁移去了法国；比如悲观主义问题，瓦格纳问题[[131]](#footnote-131)，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和艺术问题，较之在德国，都在那里得到不可比拟地更精微和更透彻的思考，——德国人自己无法胜任这种类型的严肃。——在欧洲文化史上，“帝国”的兴起主要意味着一点：重心的转移。人们已经都知道：在主要事情上——这始终是文化——德国人已经不在考虑之内。有人问：你们能够为欧洲哪怕提供一个算得上的思想家吗？就像你们的歌德，你们的黑格尔[[132]](#footnote-132)，你们的海因里希·海涅[[133]](#footnote-133)，你们的叔本华可以算得上的人那样？——甚至不再有唯一的一个德国哲学家，而这让人无比惊讶。——

5

在德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教育，教养是目的自身——而不是“帝国”——，为了这个目的需要教育家——不是文理中学教师和大学学者——可人们忘了这点……急需那种自我培育而成的教育家，深思熟虑的，高贵的思想家，他们时刻表现出，通过言语和沉默，表现出成熟的，甜美的文化，——不是文理中学和大学今天作为“高级保姆”展示给青年人的博学的粗汉。缺少教育家，除了例外中的例外，这个教育的首要前提：因此有了德国文化的没落。——最最稀罕的例外之一，是我在巴塞尔的值得尊敬的朋友雅各布·布克哈特[[134]](#footnote-134)：巴塞尔在人性方面的优先地位首先要归功于他。——德国“高等学校”事实上做到的，是一种残忍的训练，为了以最少量的时间支出，让大批青年男子能被使用，能被利用于服务国家。“高等教育”和大批——这从一开始就互相牴牾。每一种高等的教育仅属特殊：一个人必须特权化，才能享有这样一种高级的特权。所有伟大的，所有美好的事物，从来不是公共财产：美属于少数人。[[135]](#footnote-135)——什么决定了德国文化的没落？“高等的教育”不再拥有优先权——“普及的”，平庸化的“教育”的民主主义[[136]](#footnote-136)……不能忘记的是，军事的特权死板地强求高等学校的过高入学率，这意味着这些学校的没落。——在今日德国，无人再具有给予他的孩子们一种高贵的教育的自由：我们的“高等的”学校，及其教师，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全部以最暧昧的平庸作为准绳。到处盛行着一种不体面的匆忙，似乎一个23岁的年轻人倘若尚未“结束”，对于诸如“什么职业”那样的“主要问题”尚无答案，就是耽误了什么。——恕我直言，一种更高类型的人，不喜欢“职业”，正是因为他懂得自己负有使命……他有时间，他不慌不忙，他根本不考虑“结束”，——在高级文化的含义上，30岁的人是个初学者，是个孩子。——我们那些拥挤的文理中学，我们那些扎堆的、被弄得愚笨不堪的文理中学教师，乃是一个丑闻：为了替这样的状况辩护，就像新近海德堡的教授们做的那样，人们也许有因由，——不过不存在这样做的理由。

6

——我的天性是肯定的，同异议和批评仅仅间接地、不情愿地有关系。为了不失去我的天性，我立刻提出三项任务，而人们需要教育者正是由于它们的缘故。一个人得学习看，一个人得学习思考，一个人得学习说话和写字：全部三者的目标是一种高贵的文化。——学习看——就是让眼睛习惯于平静，耐心，和让事物接触自己；学习不急于判断，从各个角度观察和理解单个事例。第一项走向精神性的先期培训是：对一种刺激不立刻作出反应，而是把握那种延缓和隔离的本能。学习看，就我的理解，几乎是非哲学的表达方式称之为坚强意志的东西：其本质的东西恰恰不是“意愿”，而是能够推迟决定。一切非精神性，一切卑劣性，都基于无法抵抗一种刺激的无能——人们必得作出反应，人们顺从每种冲动。在许多情况下，这样一种必得，已是病态、没落、疲惫的征兆，——几乎被非哲学的粗话称之为“罪恶”的一切，只是那种生理的无能，无法做到不反应。——学会看的一种应用：一个人作为学习者完全会变得迟缓，多疑，勉强。他会带着怀有敌意的平静，暂且让每种陌生和新奇的事物靠近自己，——可他会对此缩手不顾。敞开一切大门，对每种琐碎小事的恭顺的卑躬屈膝，随时准备就绪的纵身跳跃，对于他事和他物的全身心的沉湎，简而言之，那著名的现代“客观性”，是糟糕的鉴赏力，是典型的不高贵。——

7

学习思考：在我们的学校里人们对此已不再懂得。即使在大学中，甚至在真正的哲学学者中间，作为理论，作为实践，作为手艺的逻辑也开始灭绝。人们阅读德国书籍：丝毫也无法回忆起，为了思考需要一种技术，一项教学计划，一个获得技艺的意志，——想学会思考，就得像想学会跳舞一样，把它当作一种舞蹈……在德国人中间，谁还通过经验认识精神中的轻快步履带给所有肌肉的那种细微的战栗！——神态的僵硬呆板，动作的粗鲁迟钝——在很大程度上如此地德国式，以至于有人在国外竟然把它同德国人的天性混淆起来。德国人没有感觉细微差别（nuances）的手指……尽管德国人也容忍了他们的哲学家，尤其是那个史无前例地最最畸形的概念的残疾人，那个伟大的康德，这也丝毫不说明德国人的秀美[[137]](#footnote-137)。——也就是说，人们不能把各种形式的舞蹈从高贵的教育中排除出去，得有用脚、用概念、用语言跳舞的能力；我是否还得说，人们也该能用笔跳舞，——人们得学习写字？——不过在这方面，我恐怕将完全是德国读者的一个谜……

**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

1

我那不可能做的事。——塞内加[[138]](#footnote-138)：或者德行的斗牛士。——卢梭[[139]](#footnote-139)：或者进入污秽的原始自然[[140]](#footnote-140)的返归自然。——席勒：或者塞金根的道德号手[[141]](#footnote-141)——但丁[[142]](#footnote-142)：或者在坟墓里作诗的鬣狗[[143]](#footnote-143)。——康德：或者伪善言辞[[144]](#footnote-144)作为理知的特性[[145]](#footnote-145)。——维克多·雨果[[146]](#footnote-146)：或者荒谬之海上的法鲁斯[[147]](#footnote-147)。——李斯特[[148]](#footnote-148)：或者精湛技巧的学校——追逐女人[[149]](#footnote-149)。——乔治·桑[[150]](#footnote-150)：或者丰富的乳汁[[151]](#footnote-151)，用德语说：具有“秀美风格”[[152]](#footnote-152)的奶牛。——米什莱[[153]](#footnote-153)：或者脱去外套的激动……卡莱尔[[154]](#footnote-154)：或者悲观主义作为撤回了的午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55]](#footnote-155)：或者侮辱人的清晰[[156]](#footnote-156)。——贡古尔兄弟：或者与荷马作战的两个埃阿斯[[157]](#footnote-157)。奥芬巴赫[[158]](#footnote-158)的音乐。——左拉[[159]](#footnote-159)：或者“臭气冲天的快乐”[[160]](#footnote-160)。——

2

勒南[[161]](#footnote-161)。——神学，或者由“原罪”（基督教）造成的理性的败坏。勒南的明证。一旦他要冒险道出一般类型的肯定或否定意见时，他就会以死板的按部就班的方式出错。比如他想把科学（la science）和高贵（la noblesse）合成一体：但是，科学属于民主，这是明摆着的。他希望，不带任何小小的虚荣心，表现一种精神的贵族主义[[162]](#footnote-162)：但同时他又对其相反的学说，即卑贱者的福音（évangile des humbles）跪拜，而且不仅仅是跪拜。所有的自由精神，现代性，讥讽的本领和蚁鴷的灵巧[[163]](#footnote-163)都有何用，倘若人们骨子里依旧是基督徒，天主教徒，甚至是教士！在进行诱惑方面，勒南有他的发明才能，完全像个耶稣会会士[[164]](#footnote-164)和忏悔神甫；他的精神性里不缺乏教士那咧着嘴的微笑，——同所有的教士一样，只有当他爱的时候，他才会变得危险。没人能像他那样，以一种致命的方式礼拜……勒南的这个精神，一种麻痹神经的精神，对这个可怜的、患病的、意志有病的法国来说，甚于一个厄运。——

3

圣伯夫[[165]](#footnote-165)。——毫无男子气概；充满对一切阳刚精神的渺小的愤懑。四处游荡，伶俐，好奇，无聊，好打听，——归根到底一个惹人讨厌的女人，具有一种女人的复仇欲和女人的官感性。作为心理学家，是个诽谤（médisance）的天才；对此拥有极其丰富的手段；无人比他更善于用一句赞美去拌和毒药。在最深的本能中是粗俗，而且同卢梭的愤懑类似：所以是浪漫主义者——因为在一切浪漫主义[[166]](#footnote-166)背后都有卢梭复仇的本能在嘟哝和渴想。是革命的，但可惜被恐惧控制住。特别是面对一切强大的东西（公众意见，科学院[[167]](#footnote-167)，宫廷，甚至波尔罗亚尔[[168]](#footnote-168)）毫无自由。激烈地反对一切伟大人物和伟大事物，反对一切自信者。诗人和半个女人，已足够把伟大当作权利感受；不停地蠕动，就像那条著名的虫子[[169]](#footnote-169)，因为它总是觉得自己被踩踏。作为没有准则、立场、脊柱的批评家，带着谈论宇宙之各种自由精神的舌头，但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放荡无度。作为缺少哲学的历史学家，缺少哲学目光的强力，——所以在一切重要问题上拒绝接受判断的任务，把“客观性”持为面具。在一种精美和有利的鉴赏力是最高审级的地方，他对万物的态度就是不同：在那里他确实有对于自身的勇气，对于自身的乐趣，——他在那里是大师。——就有些方面来看，是波德莱尔[[170]](#footnote-170)的一个雏形。——

4

《效法基督》[[171]](#footnote-171)属于那种我拿在手中不会不产生生理反抗的书：它散发出一股永恒的女性的芳香，接近她一个人必须已是法国人——或者是瓦格纳的追随者……这个圣徒具有一种谈论爱的方式，甚至能让法国女人也生出好奇心。——有人告诉我，那位最聪明的耶稣会会士，孔德[[172]](#footnote-172)，他想把他的法国人绕道科学带往罗马，在这本书里获得了灵感。我相信这点：“心灵的宗教”[[173]](#footnote-173)……

5

艾略特[[174]](#footnote-174)。——他们失去了基督教的上帝，现在不得不更加坚持基督教道德：这是一种英国式的合乎逻辑的行动，我们不愿为此而责怪艾略特这个道德小女子。在英国，为了每次从神学那里的小小解放，作为道德狂热分子，人们得以令人恐惧的方式让自己再获荣誉。在那里，这是人们支付的赔偿。——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情况不同。要是一个人放弃基督教信仰，以此他就把对于基督教道德的权利从自己脚下抽去。这种道德绝对不是不言自明的：人们得不顾那些英国的平庸家伙，不断地揭露这点。基督教是个体系，一个对事物作了总体考虑的和完整的观点。如若有人从中剥离出一个主要概念，即对上帝的信仰，他就会以此摧毁这个整体：他就不再持有任何必要的东西了。基督教的前提是，人不知道，不能知道，对他来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信仰上帝，唯有上帝知道这点。基督教的道德是个命令；其根源是超验的；它处在一切批评，一切批评之权利的彼岸；唯独当上帝是真理时，它才拥有真理，——它与对上帝的信仰共存亡。——倘若英国人真的相信，他们从自身出发，“本能地”知道，何为善恶，倘若他们因此而以为，基督教作为对于道德的保证不再有必要，那么这本身是基督教价值判断之统治的后果，是这个统治的强大与深刻的一个表达；以至于英国道德的起源被遗忘，以至于其对此在之权利的非常的有限性，不再被感觉到。对英国人来讲道德还不是个问题……

6

乔治·桑。——我读过《一个旅人的书简》第一卷：就像卢梭写的一切东西，虚伪，做作，吹嘘，夸张。我受不了这种花哨的糊墙纸风格；同样受不了这种小民追求豁达情感的野心。当然，最糟糕的依旧是带有男子气和顽童举止的女人的打情卖俏。在做这一切时她得多么镇定自若，这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女戏子！她像一只钟表那样上紧发条——进行写作[[175]](#footnote-175)……镇定自若，如同雨果，如同巴尔扎克[[176]](#footnote-176)，如同所有浪漫派作家，只要他们进行创作！此刻她会多么自得地躺在那边，这条多产的写作母牛，身上带有糟糕的德国特征，与她的师傅卢梭本人一样，而无论如何只有当法国的鉴赏力趋于没落时，这种情况才可能出现！——可勒南崇拜她……

7

心理学家的道德。——别兜售廉价的心理学！永远别为了观察而观察！这会产生一种错觉，一种斜视，一种勉强和夸张的东西。想要体验而去体验——这不合适。一个人不能在体验中凝视自身，每一瞥都会成为“凶险的目光”。一个天生的心理学家本能地防止自己，为了看而去看；这一点也适用于画家。他从不“依照自然”[[177]](#footnote-177)工作，他听任自己的本能，他的暗室[[178]](#footnote-178)去筛选，去表现“事件”，“自然”，“经历”……然后他才意识到普遍的东西，结论，结果：他不懂对个别事件作那种任意的抽象。——倘若换一种做法，情况会怎样？比如以大大小小的巴黎小说家[[179]](#footnote-179)的方式，去兜售廉价的心理学？这仿佛在暗中守候现实，每晚带着几件希罕之物回家……不过，人们最后看到的结果是——一堆涂鸦，最多是一张镶嵌图象，无论如何是某种拼贴一处、令人烦躁、颜色刺目的东西。在这方面龚古尔兄弟做得最糟：他们凑不齐三句不对眼睛、心理学家们的眼睛，造成伤害的句子。——艺术地看，自然不是典范。它夸张，它扭曲，它留下漏洞。自然是偶然。“依照自然”的研究就我看来是个不好的征象：它暴露出屈服，弱点，宿命论，——对凌乱无关之事（petis faits）的顶礼膜拜，这对一名完全的艺术家来说有失身份。看看是什么——这种做法属于另一类的英才，属于反艺术者，属于事实论者。一个人得知道，自己是谁……

8

艺术家的心理。——为了艺术能存在，为了某种审美的行为和关照能存在，一种心理的前提必不可缺：迷醉。迷醉得先提高整个机体的敏感性：否则不会产生艺术。所有受不同条件所决定的迷醉类型都具有对此的力量：首先是性冲动的迷醉，这是迷醉最古老和最原始的形式。同时还有随同所有巨大欲望、所有强烈感情而来的迷醉；节庆、比赛、精彩表演、胜利、一切极限运动的迷醉；残酷的迷醉，摧毁的迷醉；某种天气影响下的迷醉，比如春天的迷醉；或者在麻醉剂影响下；最后是意志的迷醉，一种积聚的和膨胀的意志的迷醉。——迷醉的本质是力量升华和充溢的感情。出于这种感情人们投身于事物，强迫事物向我们索取，强暴事物，——有人称这样的过程为理想化。让我们在此摆脱一种成见：理想化并非如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在于排除或去掉无关紧要的微末小事。相反，对主要特征的大力突出是决定性的，其他的特征就会由此消失。

9

在这个状态里，人出于自身的丰盈，充实万物：他看到自己的所见所愿，鼓鼓胀胀，被挤受压，强大，承载着重力。这个状态中的人改变事物，直到它们映现他的力量，——直到它们是他的完美的反射。这个进入完满的必须-转变就是——艺术。甚至一切他不是的东西，也成为他乐趣的自身；人在艺术中把自身当作完满享受。——也许能允许别人，想象出一种相反的状态，本能的一种特殊的反艺术家类型，——一种使万物变得贫乏，稀疏，患上肺结核病的类型。事实上，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反艺术家，这样的生命饥谨者：他们必然地把万物扯向自身，必定使之虚弱，更加贫瘠。比如那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情形，比如帕斯卡：一个同时身为艺术家的基督徒，但这不存在……请别太天真，提出拉斐尔[[180]](#footnote-180)或者19世纪随便别的什么采用顺势疗法的基督徒来反驳我：拉斐尔说是，拉斐尔作肯定，所以拉斐尔不是基督徒……

10

由我引入美学的对立概念，阿波罗的和狄俄尼索斯的[[181]](#footnote-181)，两者都被理解为是迷醉的类型，它意味着什么？——阿波罗的迷醉首先让眼睛保持激动，以至于眼睛获得幻觉之力。画家，雕塑家和叙事文学家是出色的幻觉者。相反在狄俄尼索斯的状态中，却是整个情绪系统的激动和增强：以至于它突然地调动自己一切的表达手段，释放表现、模仿、改造、变化之力，同时还有表情和表演的全部种类。本质的东西依然是形变的轻巧，无法不反应（——类似于某些歇斯底里者，他们会根据每种暗示进入任何角色）的无能。狄俄尼索斯的人无法不去理解任何一种暗示，他不会错过任何情绪的征兆，他具有最高级的理解和推测之本能，正如他掌握最高级的传达艺术。他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和情感世界：他不断变化自己。——音乐，如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同样是一种情感的整体激发和释放，但毕竟只是一种更充溢的情感之表达世界的残留，是狄俄尼索斯戏剧演员的一种纯粹的余渣。为了让音乐作为特殊艺术成为可能，人们停止了一批感官，尤其是肌肉的感觉功能（至少相对如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节奏都诉诸我们的肌肉）：于是，人不再立刻模仿和表现他感受到的一切。尽管如此，这其实是狄俄尼索斯的标准状态，无论如何是原初状态；以最相近之能力为代价，音乐是缓慢地形成的对同一状态的具体说明。

11

演员，戏子，舞蹈家，音乐家，诗人，他们在本能上基本相近，就其自身来说是一体，但逐渐地专门化和互相分离——直到甚至有冲突。诗人与音乐家保持着最长久的联合关系；演员则同舞蹈家。——建筑师既不表现一种狄俄尼索斯状态，也不表现一种阿波罗状态：这里有伟大的意志行为，移山的意志，渴望艺术的伟大意志的迷醉。最强有力的人总是赋予建筑师以灵感；建筑师则始终处于力的启发之下。建筑物应该体现骄傲，体现对重力的胜利和权力的意志[[182]](#footnote-182)；建筑艺术是表现为形式的一种权力之能言善辩的种类，它时而诲人不倦，甚至阿谀奉承，时而断然号令。最高的权力感和安全感在伟大的风格中得以表达。强权不再需要证明；它不屑于讨好；它沉稳作答；它不感到周围有证人；它生存着，不意识到存在着反对它的异议；它宿命地沉湎于自身，是法则中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作为伟大的风格谈论自身。——

12

我读过托马斯·卡莱尔的生平，这场违背心愿的闹剧，这个对于消化不良状态的英雄道德的阐释。——卡莱尔，一个大言不惭和趾高气扬的家伙，一个不得已的雄辩家，不断地受到对一种强大信仰之渴望和对此又无能的感觉的骚扰（——在这点上是个典型的浪漫派作家！）对一种强大信仰的渴望不是一种强大信仰的证明，而是相反。一个人有了信仰，就可以允许自己享受怀疑的美好奢华：他对此就足够安全，足够坚定，足够受约束。卡莱尔对具有强大信仰的人强烈地（fortissimo）表明他的景仰，对不太幼稚人的表明自己的愤怒，由此来麻痹自己内心的某些东西：他需要喧闹。一种面对自己的持续和狂热的不诚实——这是他的特性（proprium），因此他是，依然是饶有趣味的。——当然，在英国，他恰恰因为诚实而受到敬仰……好吧，这是英国式的；考虑到英国人是地道的伪善言辞（cant）的民族，这不仅可以理解，甚至合情合理。卡莱尔本质上是个英国的无神论者，他在不是无神论者这点上，追求自己的荣誉。

13

爱默生[[183]](#footnote-183)。——比卡莱尔开明得多，逍遥得多，更复杂，更狡黠，尤其更幸运……这样的一个人，他本能地单靠长命百岁的神仙美食（Ambrosia）为生，把无法消化之物留在事物中。与卡莱尔相比，他是个有鉴赏力的人。——卡莱尔非常喜欢他，可尽管如此还这样谈论他：“他无法给我们足够的东西咀嚼”[[184]](#footnote-184)：尽管这话可能说得有理，但无损于爱默生。——爱默生具有一种善良和智慧的快活性格，能消解一切认真；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已有多大年纪，还会如何年轻，他可以用维迦[[185]](#footnote-185)的一句话说自己：“我跟随我自己”[[186]](#footnote-186)。他的精神总是找得到满意的、甚至感激的理由；而他有时达到那个老实人快活的超然境界。此人从一次与情人的幽会处，如同从一件出色地完成的事务（tamquan re bene gesta）中返回。“即使缺少力量，他感激地说，享乐依然值得赞扬。”[[187]](#footnote-187)——

14

反达尔文[[188]](#footnote-188)。——至于著名的生存斗争，我眼下以为，与其说它被证明，不如说它被断言。这发生过，但作为例外；生命的总体不是匮乏，饥谨，相反是富足，丰盛，甚至是荒谬的挥霍，——凡是有斗争的地方，人们为权力而斗争……人们不该把马尔萨斯[[189]](#footnote-189)同自然混为一谈。——假定有这样的斗争——事实上它出现了——可惜它的结果同达尔文学派希望的、或许同人们允许同这个学派一起希望的相反：即对强者，有特权者，幸运的例外者不利。物种并不在完善中生长：弱者总是不断地控制强者，——原因为，他们是多数，他们也更聪明……达尔文忘记了精神（——这是英国式的！）弱者拥有更多的精神……人们得需要精神，才能得到精神，——倘若他不再需要它，就会失去它。谁强大，谁就放弃精神（——“让它们被拿走吧！今天有人在德国这么想——帝国将留给我们”[[190]](#footnote-190)……）大家看到，我理解的精神，是谨慎，耐心，计谋，伪装，伟大的自我克制，和一切是模仿（mimicry）的东西（属于最后一项的有大部分的所谓德行）。

15

心理学家的病例报告。——这是个老于世故者：他为何要琢磨人？他想从他们身上获得小小的好处，或者大好处，——他是个政客！……那一位也是老于世故者：你们说，他不想为自己获取任何东西，这是个伟大的“无个性者”。请你们仔细看看吧！也许他甚至想谋得一种更糟糕的好处：即感到自己比他人优越，可以俯视他人，不再让自己被混同于他们。这个“无个性者”是人的蔑视者：而前面那个是比较人道的种类，这也是凭印象可以说的。他至少把自己放在与别人同等的地位，他置身于内……

16

就我看来，德国人的心理节奏由于一系列事件成了问题，而我的谦逊妨碍我展示问题的清单。可有一个事件给了我一个大的理由，去论证我的命题：我对德国人耿耿于怀，他们在康德及其被我称为“后门哲学”的方面弄错了，——这不是知识分子的诚实的类型。——我不爱听的另一件事，是一个声明狼藉的“和”：德国人说“歌德和席勒”[[191]](#footnote-191)，——我担心他们说“席勒和歌德”……难道大家还不认识这个席勒？——还有更糟糕的“和”；我亲耳听见，不过只是在大学教授中间，“叔本华和哈特曼[[192]](#footnote-192)”……

17

最富有精神的人，前提为，他们是最勇敢的人，也绝对是经历了最痛苦之悲剧的人：不过，他们之所以尊敬生命，正是因为生命以最大的敌意同他们对抗。

18

关于“理智的良心”。——就我看来，今天没有什么比真正的伪善更罕见了。我的怀疑很大，这种植物受不了我们文化的轻柔之风。伪善属于强大信仰的时代：那时人们甚至在被迫展现另一种信仰时，也不抛弃自己旧有的信仰。今天人们抛弃它；或者更常见的是，再给自己添上第二种信仰，——而在每种情况中他们依旧保持诚实。毫无疑问，与往日相比，今天有一批数目大得多的信念成为可能：可能，这意味着允许，这意味着无害。由此产生出对自身的宽容。——对自身的宽容允许更多的信念：它们自己和睦相处，——它们提防，不让自己出丑，同如今大家都那么做的一样。如今一个人怎样才会出丑？要是他坚定不移。要是他一条道路走到底。要是他不模棱两可。要是他纯真……我的担心很大，对有些恶行而言，现代人过于懒散：以至于这些恶行正在灭绝。一切由强大的意志所决定的恶——也许不存在任何缺少强大意志的恶——正在我们那温暖的空气中，蜕化为德行……我所认识的几个为数不多的伪善者，模仿着伪善，就像今天几乎每十个人中的一个那样，是演员。——

19

美和丑。——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美感更有条件，让我们这么说，更受限制。倘若有人试图离开人对于人的乐趣去思考，就会立刻失去根基和立足点。“自在之美”[[193]](#footnote-193)仅仅是一个词，甚至不是一个概念。人在美中实现作为完善之尺度的自身；在精选的情形中，他在美中进行自我崇拜。一个种类非此不能单独地自我肯定。它那至深的本能，自我维护和自我扩展的本能，在这样的精湛高雅中继续作用。人相信世界本身充满着美，——他忘记自己是美的原因。唯有他把美赠与世界，唉！只是一种人性的，太人性的[[194]](#footnote-194)美……归根到底，人在事物中映照自己，他把一切反射其图象的东西都看作是美的：“美”的判断是他的种类的虚荣心……一个小小的猜疑也许会对怀疑论者[[195]](#footnote-195)轻声耳语，提出问题：人把世界当作是美的，难道它恰恰由此真的得到了美化？人把世界人性化了：这就是一切。不过，无法担保，什么也无法担保我们，恰恰是人给出了美的典范。谁知道，他在一位更高级别的鉴赏家眼里是什么样子？也许这样说过于大胆？也许是令人发笑的？也许稍稍有些任意？……“啊，狄俄尼索斯，神灵，你为何扯我耳朵？”阿里阿德涅在拿克索斯的一次著名谈话中，这样问她的哲学情人。“我在你的耳朵里发现了一种幽默，阿里阿德涅：它们为何不更长一些？”[[196]](#footnote-196)

20

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全部的美学都建立在这样一种简单的事实上，它是美学的第一真理。让我们立刻添上它的第二真理：没有什么比蜕化的人更丑，——审美判断[[197]](#footnote-197)的领域由此被限定。——从生理学上核算，一切的丑使人虚弱和悲哀。它令人想起颓败，危险，软弱无力；人在此时的确会丧失力量。丑的作用能以测力计测出。只要人在哪里确实受到压抑，他就能嗅出某种“丑陋”就在近前。他的权力感，他的权力意志，他的骄傲——与丑同降，与美同升……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美丑之前提以其无比的丰富性积聚在本能中。丑被理解为衰败的一个暗示和征象：哪怕最最略微地让人想起衰败的东西，都会引起我们“丑”的判断。枯竭，沉重，衰老，疲惫的每种征兆，每种不自由，无论是痉挛还是瘫痪，尤其是解体和腐烂的气味，颜色和形状，即使在最后成为象征的稀释中——这一切都会引起同样的反应，都引起“丑”的价值判断。此刻，一种憎恨之情会油然而生：人憎恨谁？不过这毫无疑问：憎恨他的类型的衰落。在此，他出于族类最深的一种本能憎恨；在这个憎恨中，既有惊恐，谨慎，也有深刻，远见，——这是世上最深的憎恨。由于它的缘故，艺术是深刻的……

21

叔本华。——叔本华，最后一个要关注的德国人（——像歌德，像黑格尔，像海因里希·海涅一样，是个欧洲的事件，不仅仅是个地方的，而是个“民族的”事件），对一名心理学家来说，是个一流的病例：作为恶意的天才尝试，它有利于一种虚无主义的对生命的整体贬低，但恰恰是反向审判，把“生命意志”[[198]](#footnote-198)的伟大的自我肯定，生命的富足形式当作理由提出。他依次把艺术，英雄主义，天才，美，伟大的同情，认识，求真的意志和悲剧，解释为“否定”或者“意志”[[199]](#footnote-199)之否定需要的后果——除了基督教，这是历史中最伟大的心理学弄虚作假术。更仔细地观察，他在这方面只是基督教解释的继承者：不过他也懂得，依旧在一个基督教的、也就是说虚无主义意义中，去赞同被基督教拒绝的东西，即人类伟大的文化事实（——即作为通向“拯救”[[200]](#footnote-200)的道路，作为“拯救”之前奏，作为对“拯救”之需求的刺激……）

22

我举单个的例子。叔本华以一种忧伤的激情谈论美，——究竟为什么？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一座桥，人在上面继续走，或者渴望继续走……对人来说，它是从“意志”的暂时解脱——它吸引人们永久地获得解脱……他特别赞赏它是让人摆脱“意志的焦点”[[201]](#footnote-201)、即摆脱性欲的女救星，——他的美中看到生殖本能被否定……奇人！会有人反驳你，我担心，那是自然。在自然中，以声音，颜色，芳香，有节奏的运动为表现形式的美究竟为何存在？是什么催生了美？——幸运的是也有一位哲学家反驳他。并非小人物，而是权威人士，那个神圣的柏拉图[[202]](#footnote-202)（——叔本华自己也这么称呼他）认为另一个原理是正确的：即所有的美，刺激生殖[[203]](#footnote-203)，——这恰恰是其效果的特性，从最感性的上升到最精神的……

23

柏拉图走得更远。他带着一种必须是希腊人而不是“基督徒”才能享有的无辜说道，倘若没有如此英俊的雅典青年，根本就不会有柏拉图的哲学：他们的目光让哲学家的灵魂陷于性爱的迷醉，急不可待，直到它把一切崇高事物的种子，播洒到这样一片如此美妙的土壤里[[204]](#footnote-204)。也是一个奇人[[205]](#footnote-205)！——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要假定，他们相信柏拉图。他们至少可以猜测，雅典人不一样地进行哲思，尤其在公开场合。没有什么比一个隐士编织的概念蜘蛛网，比斯宾诺莎[[206]](#footnote-206)式的对上帝的精神之爱（amor intellectualis dei），更不是希腊式了。按照柏拉图的方式，哲学抑或更可以定义为一场性爱的比赛，对古代体育竞赛及其前提的一种延续和内省……从柏拉图这种哲学的性爱里最终产生出什么？希腊式竞赛[[207]](#footnote-207)的一种新形式，雄辩术。——我还记得，这反对叔本华而为柏拉图增添荣耀，就是古典法国的全部高级文化和文学[[208]](#footnote-208)，都在性兴趣的土壤上长出。在那里，人们可以四处寻找殷勤[[209]](#footnote-209)，性感，性竞争，“女人”，——寻找永远不会徒劳无功……

24

为艺术而艺术[[210]](#footnote-210)。艺术中反对目的的斗争，始终是反对艺术中道德化倾向、反对它屈服于道德的斗争。为艺术而艺术意味着：“让道德见鬼去吧！”——可是，即使这个敌意也透露出偏见的强势。要是把道德说教和改善人类的目的从艺术中排除，那么其结果还远非这样，即艺术完全是无目的、无目标、无意义的，简言之，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虫子——。“宁愿全无目的也不要一个道德目的！”——纯然的激情如是说。一个心理学家反问：一切的艺术何为？它不赞美？它不美化？它不选择？它不偏爱？它以这一切手段加强或者削弱某些价值评价……这只是一种无关紧要？一种偶然？某种艺术家的本能完全不参与的事？或者：这难道不是前提，只有这样艺术家才能……？艺术家的至深本能指向艺术或者不是，相反指向艺术的意义、即生命？指向生命的可盼之望？——艺术是生命最伟大的兴奋剂[[211]](#footnote-211)：怎么可以把它理解为无目的、无目标、为艺术而艺术的呢？——还有一个问题：艺术也显现出生命中许多丑陋、严酷、可疑的东西，——难道它以此不怪罪生命？——事实上，有这样的哲学家，他们赋予艺术这个意义：叔本华认为“弃绝意志”是艺术的全部意图，把“赞同绝望”尊为悲剧的最大功利[[212]](#footnote-212)。——不过——我已经阐明——这是悲观主义者的视角和“凶险的目光”——：人们得诉诸艺术家本身。悲剧艺术家传达着自身的什么？他展现的，难道恰恰是面对恐惧和可疑的无所畏惧状态？——这个状态自身是个非常的可盼之望；谁认识这个状态，就以最高的崇敬对它表示崇敬。他传达这个状态，他必须传达这个状态，前提是，他是个艺术家，一名传达的天才。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面对一种巨大的灾难，面对一个引起恐惧的问题，感情的无畏和自由——这是悲剧艺术家所选择和美化的胜利状态。在悲剧面前，我们灵魂里的好战性庆祝着它的农神节[[213]](#footnote-213)；习惯于痛苦和寻求痛苦的英勇之人，他以悲剧颂扬自己的此在，——悲剧作家只为他，捧上这杯最甘美的残酷之酒[[214]](#footnote-214)。——

25

将就别人，敞开心扉，这是宽宏大量，不过这只是宽宏大量。人们认出那些具有高贵的待客能力的心灵，可在这些心灵上有许多遮掩的窗户和关紧的护窗板：它们让自己最好的房间空着。为什么？——因为它们等待那些人们不“将就”的客人。

26

一旦我们表达自己，我们就不再充分地评价自己。我们的实际体验根本就不是好说话的。它们自己无法表达自己，即使它们愿意。原因是，它们缺少语言。一旦我们对什么有语言，我们就已经超越了它。一切话语中都有那么一点儿蔑视。看来语言仅为平常的，不偏不倚的，可以言说的东西而发明。说话人已经用语言使自己平庸化。——来自聋哑人和其他哲学家的一种道德。

27

“这幅画漂亮得令人心醉！”[[215]](#footnote-215)这个文学女人，不满，激动，身心一片荒凉，时刻怀着痛苦的好奇心倾听从她肌体深处悄悄发出的命令：“孩子或者书籍”（aut liberi aut libri）。这个文学女人，有足够的教养，懂得自然的声音，即使它说着拉丁语，另外还足够虚荣和愚蠢，甚至私下里还对自己说法语“我将看自己，我将读自己，我将入迷陶醉，并且说：这可能吗，我有这么多的精神？”[[216]](#footnote-216)

28

“无个性者”开口说话。——“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智慧，耐心和深思熟虑更容易了。我们身上浸透了宽容和同情之油，我们以一个荒谬的方式公正，我们原谅一切。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更严格一些；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不时地培育一点小小的情绪，一点小小的情绪的罪孽。这可能会让我们气恼；而我们互相之间也许会嘲笑我们表现出的这个观点。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就自我克服而言，我们别无他法：这就是我们的禁欲主义，我们的赎罪”……成为有个性的——“无个性者”的德行……

29

出自一次博士考试[[217]](#footnote-217)。——“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把人弄成机器。——“其方法是什么？”——他得学习让自己感到无聊。“怎么做到这点？”——通过责任的概念[[218]](#footnote-218)。“谁是他这方面的典范？”——那个语文学家：他教人死记硬背。“谁是完美之人？”——国家官员。——“哪一种哲学为国家官员给出最高级的公式？”——康德的：国家官员作为自在之物被任命为法官，审判作为现象[[219]](#footnote-219)的国家官员。——

30

做蠢事的权利。——疲惫和呼吸迟缓的工人，善意地瞧着，对事物的发展任其自然：这种典型的人物眼下可以在工作（和“帝国”！——）的时代里，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碰到。这样的人物今天恰恰要求享有艺术，包括书籍，尤其是报刊——更多的是美丽的大自然，意大利……迟暮的人，带着浮士德谈及的“已经安睡的野蛮冲动”，[[220]](#footnote-220)需要避暑，海水浴，滑冰，拜罗伊特的……在这样的年代，艺术有权做纯粹的蠢事，作为精神、诙谐和情感的一种休假。瓦格纳懂得这点。纯粹的蠢事复原……

31

还有一个养生问题。尤利乌斯·凯撒[[221]](#footnote-221)用来防止疾病和头痛的办法是：长途行军，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不间断地在户外逗留，经常的操劳[[222]](#footnote-222)——概而言之，这是对付那种灵敏的、在极端压力下工作之机器的极度易损性的，维持和保护措施，这种机器名叫天才。——

32

非道德主义者发话。——只要他有愿望，那么没什么比他更不合一位哲学家的鉴赏力了……如果哲学家仅看到此人在行动，看到这头最英勇的、最狡猾的、最有忍耐力的动物，自己走失在迷宫似的困境中，这个人在他眼里就是多么地值得赞叹！他还对他说话……不过哲学家蔑视愿望着的人，还有“可愿望的”人——总而言之，一切的可愿望性，一切的人的理想。倘若一个哲学家能是虚无主义者的话，那么他会是，因为他在人的所有理想后面找到虚无。或者甚至虚无也找不到，——而只有无耻之极，荒谬，病态，懦弱，疲惫，所有出自他生命之被啜尽的酒杯中的各类残渣……怎么回事，作为事实的如此值得尊敬的人，只要他愿望，就得不到重视？他得为他作为事实而如此地勤奋而受到惩罚？他得用一次在幻想和荒谬中的伸展四肢，来舒缓他的行动，以及在一切行动中的脑力和意志的紧张？——人的可愿望性的历史至今是他的不体面部位（partie honteuse）：该小心，别过久地在里面阅读。替人说明理由的，是他的现实性，——它会永久地替他说明理由。同任何一个只是企望的、梦见的、卑鄙地捏造出来的人相比，同任何一个理想的人相比，这个真实的人具有多么大的价值？……只有理想的人才不合哲学家的鉴赏力。

33

利己主义的自然价值。自私自利的价值，同那个自私自利者生理学方面的价值一样：它可能很有价值，它可能毫无价值和令人鄙视。每位个体人可以就此得到评价，即根据他表现的生命线条是上升容或下降。有了这样一个相关的判断，人们也就有了一个标准，看他的自私自利具有什么价值。他表现的是线条的上升，那么他的价值事实上是杰出的，——为了随同他继续前进一步的生命整体的缘故，对于他的最佳条件的保持和创造的操心，甚至可以是极端的。个体人，“个人”，如民众和哲学家至今所理解的那样，是个谬误：他不是自为的，不是原子，不是“链条的环节”，不单纯是过去的遗传物，——他依旧是完整的一条线，一如到他自身为止的人……要是他表现出下降的趋势，衰退，慢性的蜕化，疾病（——概括地说，疾病已是衰退的后果，不是其原因），那么他就没什么价值，而那第一公正要求他，尽可能少地向发展良好者索取。他只是他们的寄生虫……

34

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作为社会没落阶层的喉舌，当他愤然作色地要求“权利”，“正义”和“平等”时，他仅仅受他愚昧的支配，而这种愚昧无法领会，他其实为何受苦，——他缺乏什么，缺乏生命……他身上追根究底的冲动强大无比：他自己处境不妙，一定有人要对此负责……就是那“愤然作色”本身已经让他感到舒畅，对所有的穷鬼来说，咒骂是一种享乐，——这提供一种小小的权力迷醉。悲叹，怨天尤人，这能给生活提供一种刺激，为此人们忍受生命：在每一声悲叹中有一精微的复仇的剂量。有人因为自己的坏处境，可能甚至自己的坏品质，而指责其他不同的人，就像指责一种不公正，一种不容许的特权。“倘若我是一个混蛋，那么你也应该是”：人们根据这样的逻辑进行革命。——怨天尤人在任何场合都无用：它源自软弱。一个人把自己糟糕的处境归咎于别人或者归咎于自己本身——比如社会主义者取前面的做法，基督徒取后面的做法——，这其实并无差别。这里的共同点，我们也称它为不体面处，就是有人受苦，有人就应该负有责任——简而言之，为了对付他的苦难，受难者为自己制定复仇蜂蜜的疗法。这个复仇需要作为乐趣需要，其客体是临时的原因：受难者到处寻找原因，以发泄他渺小的复仇欲，——倘若他是基督徒，再说一遍，他就在自身找到原因……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两者都是颓废者。——不过，即使基督徒谴责、诽谤和污蔑“世界”，他是出于一样的本能，如同社会主义的工人出于同样的本能谴责、诽谤和污蔑社会：“最后的审判”自身还是复仇的甜蜜安慰——革命，正如社会主义的工人期盼的那样，只是设想得遥远了些……这个“彼岸”自身——这样一种彼岸有何用，倘若它不是一种污蔑此岸的手段？……

35

颓废道德批判。——一种“利他的”[[223]](#footnote-223)道德，一种自私自利在那里枯萎的道德——，在任何情况下，这种道德都是一个糟糕的征兆。这一点适用于个人，尤其适用于民族。一旦开始缺少自私自利，就缺少了最好的东西。本能地选取有害自我，受“无利害感的”[[224]](#footnote-224)动机的吸引，那就几乎为颓废给出了简单的表达方式。“别寻求他的好处”——这仅仅是块道德遮羞布，以掩盖一种全然不同的，即生理的事实性：“我不再懂得找到我的好处” 这是本能的崩溃！——当一个人变得利他时，他也就完了。——颓废者口中的道德谎言，不是天真地说：“我不再有任何价值”，而是说：“任何东西都毫无价值，——生命毫无价值”……这样一种判断最终依然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它有传染性，——在整个社会那病态的土壤上，很快就蔓延为热带的观念植物，有时是宗教（基督教），时而为哲学（叔本华主义）。很有可能，这种从腐烂中长出的毒树植物，会带着它的臭气，长达千年地继续毒害生命……

36

医生的道德。——病人是社会的寄生虫。在某些情况下，还赖活下去，是不体面的。倘若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权利已经丢失，卑怯地靠医生和医疗苟活下去，这该受到社会的深深鄙视。医生应当是这种鄙视的中介，——每天给病人开出的不是药方，而是一剂新的厌恶……当生命和上升着的生命的最高利益，最最无情地要求压制和排除那蜕化着的生命时，——比如为了生育的权利，出生的权利，生活的权利……为所有这些情况，医生要有一种新的责任心……一个人倘若不能继续以一种骄傲的方式活着，就该以一种骄傲的方式去死。自愿选择的死，适时的死，开朗而愉快，在孩子和证人中间实行：那个尚且在世者，那个告别的人，就有可能作真正的告别，同时能对已实现的成就和意愿进行一次真正的评价，对生命作一次总结——这一切同基督教在临终时刻上演的可怜又可怕的喜剧恰恰相反。人们不该忘记，基督教滥用了弥留之人的软弱以强暴良心，滥用了死亡的方式以对人及其过去进行价值判断！在此，要反对一切偏见的懦弱，尤其要确立所谓自然死亡之正确的，也就是说生理的尊严：即使它最后只是一种“非自然的”死亡，一种自杀。一个人从不死于他人，而是死于自身。不过，在最可鄙之条件下的死，一次非自由的死，一次非适时的死，是一种懦夫的死亡。出于对生命的爱，——，一个人应该要不一样的死，自由地，有意识地，非偶然地，不是突如其来地……最后对虚无主义者的先生们和颓废者提一个建议。我们无法阻止自己的出生：但我们能把这个错误——因为这间或是个错误——重新纠正。要是一个人清除自己，就做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事：以此，他几乎替自己赢得了生的机会……社会，我该说什么！还有生命自身，由此获得的好处，要比在断念，枯黄病和其他什么德行中的随便什么“生活”多得多——，他使别人摆脱了他的景象，他使生命摆脱了一种异议……悲观主义，纯净而新鲜，只有通过悲观主义者先生们的自我反驳才能证明自己：人们得在他的逻辑中向前推进一步，不仅仅像叔本华那样，用“意志和表象”[[225]](#footnote-225)来否定生命——，人们得首先否定叔本华……顺便提一下，悲观主义尽管如此具有传染性，一个时代、整个族类的病态还是没有增加：悲观主义是这种病态的表现。一个人受制于它，就像受制于霍乱：他肯定已经足够地病入膏肓了。悲观主义自身没有增加任何一名颓废者；我想起统计的结果，在霍乱大肆流行的年份，死亡的总数与其他的年份并无二致。

37

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不出所料，针对我那“善与恶的彼岸”[[226]](#footnote-226)的概念，在德国众所周知地被视为道德自身的道德愚蠢化，以其全部的怒火——，发作了：对此我可以讲一些有趣的故事。首先，人们要我思考我们时代在德行判断方面的“无可否认的优越性”，我们在这里真正取得的进步：与我们相比，一个博尔吉亚[[227]](#footnote-227)完全不能被竖立为一个“更高尚的人”，某种正如我所称的超人[[228]](#footnote-228)……一个《联邦报》的瑞士编辑[[229]](#footnote-229)，走得如此之远，尽管对进行如此冒险的勇气表达出些许敬意，但“理解”我的著作的意义在于，我要用它来提出申请，废除所有正派的感情。非常感谢！——请允许我作为答复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确实变得更道德了。全世界都相信这点，这已经是个对此的异议……我们现代人，虽然非常脆弱，非常敏感，互相给予和接受关怀，事实上自己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展现的这种脆弱的人性，在爱护，帮助，互相信任方面那取得的一致，似乎是一种积极的进步，我们以此业已远远超过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每个时代都这么想，也必定这么想。确实，我们不能把自己置身于文艺复兴的状态：我们的神经无法经受那种现实，更不用说我们的肌肉了。可是，这样一种无能，它证明的不是进步，而只是另一种更迟暮、更虚弱、更脆弱、更敏感的状态，从中必然会产生一种顾虑万千的道德。让我们撇开我们的脆弱，迟暮和我们生理的老化不考虑，那么我们“人性化”的道德就立刻失去它的价值——道德自身没有价值——：它会受到我们自己的蔑视。另一方面，要是我们不怀疑，我们现代人那裹着厚棉被、根本经不起石头碰撞的人性，会给博尔吉亚的同时代人上演一出笑死人的喜剧。事实上，携带着我们的现代“德行”，我们不得不显得极度可笑……敌对和猜疑本能的减退——这可能就是我们的“进步”——只表现出生命力普遍降低中的后果之一：要实现这样一个如此受局限、如此迟暮的此在，要付出几百倍地多的辛劳，更多的审慎。大家在这里互相帮助，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人人是病人，人人又是护士。这就叫“德行”——：在曾经别样地认识生命的人中间，那时生命更饱满，更挥霍，更充溢，他们可能对德行的称呼不一样，也许称其为“懦弱”，“可怜”，“老太婆道德”……我们习俗的轻柔化——这是我的命题，要是别人愿意，也是我的革新——是没落的一个后果；相反，习俗的硬朗和可怕可以是生命之充沛的一个结果：这样才可以有众多冒险，众多挑战，众多浪费。从前是生命之调味品的东西，对我们可能是毒药……态度冷淡——这也是坚强的一种形式——对此我们同样年纪太老，太迟暮：我们那可以被称作道德感伤主义（l’impressionisme moral）的同情道德，我曾作为第一人对此提出警告，更是生理过敏的表现，它是一切颓废者所特有的。那个试图借助叔本华的同情道德科学地显示自身的运动——一个非常不幸的尝试——实际上是道德中的颓废运动，作为这样的运动，它与基督教道德深切近似。那些坚强的时代，高贵的文化，它们把同情，“博爱”，缺乏自我和自我感，视为某种可鄙之事[[230]](#footnote-230)。——衡量时代得依据其积极的力量——此刻，文艺复兴那个如此挥霍和多灾多难的时代表现为最后的伟大时代，而我们，我们这些有着自己那战战兢兢的自我操心和博爱的现代人，携带着我们劳作的德行，谦逊，正义，科学性——搜集着，节俭而刻板——却表现为一个虚弱的时代……我们的德行是由我们的虚弱所限定，和引发的……“平等”，某种事实上的接近相同（Anähnlichung），在“平等权利”[[231]](#footnote-231)的理论中仅仅得到了表达，本质上属于没落：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鸿沟，类型的多样化，自我实现和自我彰显的意志，我称这一切为距离的激情[[232]](#footnote-232)，是每个强大时代的特性。今天，极端之间的张力和跨度变得越来越小，——极端自身终于模糊不清而成为相同……我们所有的政治理论和国家宪法，“德意志帝国”绝对没排除在外，都是没落的结论和必然后果；颓废的无意识的作用，一直渗入到单个学科的理想中，并取得支配地位。我对英国和法国的整个社会学持有异议，因为它仅从经验出发去了解社团的衰败形态，而且完全无辜地把自己那衰败的本能当作社会学价值判断的标准。走向没落的生命，一切组织的，也就是说分离的、扩大缝隙的、使人服从和指挥他人的力量的减退，在今天的社会学中表达为理想……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是颓废派，不过斯宾塞[[233]](#footnote-233)先生也是个颓废者，——他在利他主义的胜利中看到某种值得希望的东西！……

38

我的自由概念。——有时，一件事物的价值并不在于人们以它获得什么，而在于为它付出什么，——它让我们花费了什么。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主义的机构一旦达到了目的，就立即停止是自由主义的了：此后对于自由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主义的机构，是更麻烦和更彻底的亵渎者。大家当然知道，它们都做了什么：它们削弱权力意志，它们把抹平山峦和峡谷的落差提升为道德，它们提倡渺小，懦弱和享受，——每次同它们一起欢庆胜利的是动物群体。自由主义：用德语说，是畜群动物化[[234]](#footnote-234)……只要这样的机构还被努力争取，它们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它们确实会以一种强大的方式促进自由。仔细观察，产生这些作用的，是战争，为了自由主义机构的战争，作为战争，它让非自由主义的本能得到延续。而战争培育自由。因为何为自由！就是一个人具有自我负责的意志。就是一个人紧守分开我们的距离。就是一个人对劳累，严酷，匮乏，甚至对生命变得更加漠然。就是一个人准备为他的事业牺牲别人，不排除自己。自由意味着，男性的，好战和好胜的本能支配其他本能，比如支配“幸福”的本能。成为自由的人，更是成为自由的精神，踩踏着小商贩，基督徒，母牛，女人，英国人和其他民主主义分子所梦想的舒适的可鄙方式。自由人是战士。在个人如同在民族，自由根据什么衡量？根据必须克服的阻力，根据保持在上之地位要付出的辛劳。自由人的最高级类型必须到那里寻找，在那必须克服最强大阻力的地方：离暴政咫尺之遥，紧靠被奴役之危险的门槛。这在心理学上是真实的，倘若人们这里在“暴君”统治下领教那无情可怕的本能，而它们要求最高的权威和自我约束——尤利乌斯·凯撒是最好的典范——；这在政治上也是真实的，人们只要回顾一下历史。曾经有些价值和成为有价值的民族，从来不是在自由主义机构下成就自己的：巨大的危险从这些民族中造就出某些值得敬畏的东西，是危险教导我们认识我们的救助手段，我们的德行，我们的武器装备，我们的精神，——迫使我们坚强……第一准则：一个人得有必要坚强：否则永远不会坚强。——那些有史以来培育坚强和最坚强类型的人的硕大温室，罗马和威尼斯类型的贵族社会，恰恰在同我理解自由这个词的同样意义中理解自由：把它看作人所拥有又不拥有、想要和赢得的东西……

39

现代性批判。——我们的机构已毫无用处：对此人们意见一致。不过责任不在他们，而在我们。当我们失去了从中产生机构的所有本能之后，我们也就完全地失去机构，因为我们不再适合它们。民主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是组织力衰退的形式：我已经在《人性的，太人性的》[[235]](#footnote-235)第一卷318节中，把现代民主及其半成品，比如“德意志帝国”，标示为国家的衰落形式。为了有机构，一定要有某种意志，本能，命令，反自由主义得达到恶毒的程度：对于传统、权威、超越千年的责任心、前后无限（in infinitum）之世代相连的团结的意志。一旦有了这样的意志，那么类似于罗马帝国这样的东西就得到建立：或者像俄国，那今天体内有持续力、能够等待和做出允诺的唯一的政权，——俄国是可怜的欧洲小国和神经质的对立概念。而这种神经质随着德意志帝国[[236]](#footnote-236)的建立进入了一种危急的状态……整个西方不再拥有从中产生机构和产生将来的本能：也许没有什么如此地违背它的“现代精神”了。人们为当下而活，人们活得非常敏捷，——人们活得非常不负责任：人们恰恰称此为“自由”。那些从机构中造出的机构，受到鄙视，憎恨，拒绝：只要有人大声说出“权威”这个词，大家就相信面临一种新的奴隶制的危险。我们的政治家和政党在价值本能中的颓废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本能地偏爱那些瓦解事物、加速终结的东西……证据是现代婚姻。现代婚姻显然已失去所有的理性：但这给出的异议并非针对婚姻，而是针对现代性。婚姻的理性——它基于男人法律上的单独负责：婚姻由此就有它的重心，而今天它却两脚跛行。婚姻的理性——它基于其原则上的不可解体性：由此它获得一种音调，面对感情，激情和瞬间的偶然，它懂得让自己受到别人的倾听。婚姻的理性，用样也基于家庭所承担的对选择夫妇俩的责任。随着有利于爱情婚姻的不断增长的宽容，人们简直清除了婚姻的基础。那是首先把婚姻弄成一个机构的东西。人们绝对不会在一种过敏反应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机构，人们不会把婚姻，如前所说，建立在“爱情”上，——人们把它建立在性冲动、财产冲动（女人和孩子作为财产）、统治冲动的基础上，而这种冲动不断地组织统治的最小形态，家庭，它还需要孩子和继承人，为了即使在生理上也保持在权力、影响、财富等方面达到的尺度，为了替长期的使命，替世纪间的本能团结做准备。婚姻作为机构，其内部已经包含了对最伟大、最持久的组织形式的肯定：要是社会本身不能作为整体，直面最遥远的世代为自己担保，那么婚姻完全没有意义。——现代婚姻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人们废除它。——

40

工人问题[[237]](#footnote-237)。——愚昧，从根本上说，作为今天所有愚昧之原因的本能的蜕化，就在于存在着一个工人问题。对某些问题人们不发问：本能的第一命令。——我完全看不出，自从有人把欧洲的工人弄成一个问题之后，人们想拿他干什么。他的情况相当好，无须别人一步接着一步、恬不知耻地提问。他们本身终究占多数。希望业已完全破灭，即希望在这里，一种淳朴知足的人，某种中国人的类型会形成：而这曾可能是理性的，而且恰恰曾是一种必须。人们都干了什么？——什么都干，为了把前提消灭在萌芽状态，——人们以最最不负责任的漫不经心，彻底毁灭了本能，而正是借助这样的本能，工人才可能成为阶层，才能成为自身。人们使工人善于军事，赋予他们结社权和政治投票权：要是工人觉得他今天的实存已处于危急状态（道德地说是不公正——），这又有什么奇怪？不过再问一次，人们想要什么？想要目的，也得想要手段：要的是奴隶，倘若把他们教育成主人，这是傻瓜。——

41

“自由，我指的不是它……”[[238]](#footnote-238)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放任自己的本能，更是一种灾难。这样的本能彼此冲突，互相干扰和毁灭；我已经把现代定义为生理上的自我矛盾。教育的理性会要求，在一种铁的压力下，至少这些本能系统中的一个会瘫痪，以便允许另一个获得力量，变得强大，取得支配地位。今天也许人们必须首先对个人进行限制，才能让个人成为可能：可能意味着完整……事实却相反：关于独立、自由发展、放任[[239]](#footnote-239)的要求，恰恰由那些人最最激烈地提出，而对于这些人，没有任何缰绳过于严厉——这在政治事务（in politicis）和艺术领域中也同样。这是颓废的一个征兆：我们那对于“自由”的现代概念，更是一个本能蜕化的证明。——

42

哪里亟需信仰。——在道德主义者和圣人中，没有什么比诚实更为罕见；也许他们说反话，也许他们自己相信这个。倘若一种信仰比有意识的虚伪更有用，更有效，更令人信服，那么出于本能，虚伪立刻成为无辜：理解大圣人的第一定理。就是在哲学家那里，另一种圣人，这个定理也带来整套的手艺，以至于他们仅允许某些真理：亦即那些使他们的手艺获得公众的认可的真理，——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实践理性的真理[[240]](#footnote-240)。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证明什么，在这方面他们讲究实际，——他们凭借这点互相认出，即他们对于“真理”意见一致。——“你不该说谎”——用德语说是：我的哲学家先生，请您提防道出真理……

43

说给保守党人听。——人们以前不知道，人们今天知道和能知道的事——，任何意义及任何程度上的退化和倒退，都绝对不可能。至少我们生理学家知道这点。不过所有的教士和道德学家却相信这点，——他们想把人类送回到、旋回到过去的一种德行规范上。道德曾经一直是一个普洛克斯路斯忒斯之床[[241]](#footnote-241)。甚至那些政治家也在这方面模仿德行布道者：即使今天也还有些政党，它们把一切事物的蟹行[[242]](#footnote-242)梦想为目标。但是没人有当螃蟹的自由。无济于事：人们必须前进，也就是说在颓废中一步接着一步地继续向前（——这就是我对现代“进步”的定义……）。人们可以阻碍这个发展，通过阻碍，拦住并且积聚蜕化自身，使它来得更猛烈，更突然：更多的事人们做不到。——

44

我的天才概念。——伟大的男人[[243]](#footnote-243)如同伟大的时代，是爆炸性的材料，其中聚集着一种巨大的力量；其历史和生理的前提始终是，他们身上长久地搜集，累积，储存和保持的力量，——长时间地没有爆炸。如果张力的强度过大，那么最最偶然的刺激，就足以把“天才”，“伟绩”，伟大的命运，唤入世界。这同环境，时代，“时代精神”，“公众舆论”有何相干！——可以举拿破仑的例子。革命时期的法国，以及革命前的法国，可以产生同拿破仑格格不入的类型：但也产生了他。因为拿破仑是另类，较之法国的蒸汽和戏剧文明，是一种更强大，更久远，更古老的文明的继承人，所以他在此成了统治者，在此他单独是统治者。伟大的人物是必然的，产生他们的时代是偶然的；他们几乎总是成为时代的主人，究其原因，他们更强大，更古老，身上积聚的东西更久远。在一个天才和他的时代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就像在强大和软弱，年老与年轻之间一样：相对来说，时代总是年轻、单薄、未成年、不可靠和幼稚得多。——就此，今天人们在法国的思考非常不同（在德国亦同：不过这无关紧要），在那里，一种关于环境的理论[[244]](#footnote-244)，一种真正的神经病患者理论，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几乎成为科学，最终得到生理学家的相信。这“闻起来不对头”，让人生发悲哀念头。——就是在英国，人们的理解也没什么不同，可没人为此悲伤。容忍天才和“伟人”，英国人只有两条路可走：巴克尔[[245]](#footnote-245)的民主方式或者卡莱尔的宗教方式。——伟人和伟大时代的危险非同寻常；各种各样的疲惫和创造乏术，对他们紧追不舍。伟人是一个终点；而伟大的时代，比如文艺复兴，是一个终点。天才——在创作中和行动中——必然是个挥霍无度者：耗尽精力，是他的伟大之处……自我保存的本能仿佛被弃置；汹涌而来的力，其巨大的挤压禁止他保持任何这样的小心和谨慎。有人称此为“牺牲”；有人赞扬他这方面的“英雄主义”，即他面对自己的安康漠不关心，而献身于一种观念，一件伟大的事业，一个祖国：一切都是误解……他汹涌而出，泛滥无边，消耗自己，损伤自身，——带来的厄运后果严重，而且不由自主，就像一条河流，不由自主地决堤奔腾。但是，由于人们有众多事情要感谢这样的爆炸，所以人们也回赠许多，比如某种较高尚的道德……这是人类表示谢意的方式：他们误解他们的行善者。——

45

罪犯及其近亲者。——罪犯的类型是不利条件下强者的类型，一种被弄成病态的强者。他缺少荒野，某种更自由和更危险的自然和生存方式，而在这样的生存方式里，一切强者进攻和防卫的本能，是合法存在的。他的德行受社会排斥；他那随身带来的最活跃的冲动，立刻又同起压抑作用的情绪、狐疑、恐惧、耻辱等交织一起。但这几乎是促进生理蜕化的药方。谁不得不秘密地干他最擅长和最喜欢做的事，身处长久的紧张、谨慎、诡秘状态，就会变得贫血；而因为他从自己的本能那里得到的只是危险、迫害和灾难，他的感情也倒转过来反对这些本能——他痛苦地感受它们。正是在我们那驯化、平庸、被阉割的社会里，一个来自山岭或者大洋冒险的天然之人，必然地堕落为罪犯。或者几乎是必然地：因为也有这样的事例，一个这样的人证明自己比社会强大：科西嘉人拿破仑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对这里提出的问题来说，陀斯妥耶夫斯基[[246]](#footnote-246)的证词具有深意——顺便说一下，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唯一一个我从他那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心理学家：他属于我生命中最美妙的幸运，甚至超过发现斯丹达尔[[247]](#footnote-247)。这个深刻的人，有十倍的权利蔑视肤浅的德国人，他曾长期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囚犯中间，对那些已经无法重返社会的重犯，有过与他自己的期待完全不同的体验——他们差不多是用生长在俄罗斯土地上最好、最坚硬和最有价值的木头雕刻而成。让我们把罪犯的例子普遍化：让我们思考一下那类天性的人物。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缺少公众的赞同，他们知道，他们不被视为有益和有利，——他们具有贱民感，觉得不享有同等地位，受到排斥，缺乏尊严，还起污染作用。所有这些天性，在思想和行动中都有地下生活者的色彩；较之其此在受到日光照耀的人，他们身上的任何东西显得更加苍白。可是，几乎一切我们今天显示的实存形式，从前都曾在这样半是坟墓的空气中生活过：科学界人士，艺术家，天才，无神论者，演员，商人，伟大的发现者……如若教士被视为最高的类型，那么每种有价值类型的人都受到贬低……这个时代到来了——我预言——，那时教士将被视为最低贱者和我们的贱民，被视为最不诚实和最不体面类型的人……我注意到，如同现在，在地球上，至少在欧洲，处于地球上有史以来最温和的风俗统治下，每种怪癖，每种长久的、过于长久的在下状态，每种不同寻常的、不透明的此在形式，都让人熟悉那种罪犯所完成的类型。所有精神的革新者都曾在一个时期，额头上印有贱民那惨白和宿命的标记：并不是因为他们被如此看待，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感觉到那可怕的鸿沟，它让他们同一切传统和身处荣耀的人隔开。几乎每个天才都认识到“卡提利那[[248]](#footnote-248)式的实存”，对一切已经存在和不再生成的东西的一种憎恨、报复和反抗的感情，是自己的一个发展阶段……卡提利那——每个恺撒的前实存形式。——

46

这里视野开阔[[249]](#footnote-249)。——倘若一位哲学家沉默，这可能是心灵的高潮；倘若他反驳自己，这可能是爱；说谎也许是认知者的一种礼貌。人们不无优雅地说：伟大的心灵，不值得去散播他们所感受到的内在震颤[[250]](#footnote-250)：不过必须补充，面对最失身份之事不感到害怕，同样可以是心灵的伟大。一个爱着的女人，奉献着她的荣誉；一个“爱”着的认知者，或许奉献着他的人性；一个爱着的上帝，成了犹太人……

47

美不是偶然。——即使一个种族或家庭的美，它们所有举止中的优美和善意，是通过努力获得的：和天才一样，美是世代积累的工作的最终结果。人必须为美好的鉴赏力付出巨大代价；人必须为此做许多事，放弃许多事——十七世纪的法国在这两方面都令人赞叹不已——；对于社会，地点，衣着，性满足，人必须有个挑选的原则；比起利益，习惯，意见，懒散，人必须更喜欢美。最高的准绳：人必须对于自己也不能“放任自由”。——美好的事物是非同寻常地昂贵的：而这样的法则一直有效，即拥有它的人，是另外一个人，不是努力获得它的人。一切财产是遗产：非继承的东西，是不完善的，是开端……在西塞罗时代的雅典，西塞罗[[251]](#footnote-251)对男子和少年在美貌方面远胜于女人而表示惊讶：可是，为了美，千百年来男人曾付出怎样的劳作和努力！——在此人们不应该弄错方法：对感情和思想的单纯培育近乎无用（——德国式教育的巨大误解就在这里，它完全是幻想）：人必须首先说服肉身。严格地维持优秀和讲究的举止，只同不“放任自流”的人一起生活的约束力，这已完全足够，让人变得优秀和讲究：在两三代里，一切已经内化。对民族和人类之命运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在正确的位置开始文化——不从“心灵”开始（如教士和半教士们灾难性的迷信那样）：正确的位置是肉身，举止，规定饮食，生理学，其余由此产生……希腊人之所以依旧是历史的第一个文化事件——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做，是必须做的事；蔑视肉身的基督教，是迄今为止人类的最大不幸。——

48

我理解的进步。——我也谈论“退回自然”[[252]](#footnote-252)，尽管它其实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上升——上升到崇高，自由，甚至可怕的自然和和天性中，一种游戏和允许游戏伟大使命的天性……用比喻来表达：拿破仑是一出“退回自然”的戏，如我对这个自然的理解（比如在战术上，一如军事家所知，更在战略上）。——可是卢梭——他究竟想退回何处？卢梭，这第一位现代人，是集理想主义者和恶棍（canaille）于一身的一个人；他需要道德的“尊严”，以忍受自己的观点；由于无节制的虚荣心和无节制的自卑感而忧伤。就是这个躺到新时代门槛上的怪胎也想“退回自然”——再问一遍，卢梭想退回何处？——我憎恨卢梭已在革命[[253]](#footnote-253)中：它是理想主义者和恶棍之双重存在的世界历史的表达。这场革命所演出的血腥闹剧，它的“非道德性”，均与我无多大干系：我所憎恨的，是卢梭式的道德性——那所谓革命的“真理”，而革命携带着这些所谓的真理一直还在发生作用，并说服所有的浅薄者和平庸者相信它。这个平等的学说[[254]](#footnote-254)！……不过没有更毒的毒药了：因为这个学说看上去宣扬公正自身，其实是公正的终结……“以平等对平等，以不平等对不平等——这大概是公正的真话：不过，其结论是，决不让不平等变得平等。”[[255]](#footnote-255)——围绕着平等学说发生了如此可怕和血腥的事件，这赋予这个出色的“现代理念”某种荣誉和火光，以至于革命作为景观也诱惑了那些最高贵的英才。但最终这不是对它更重视的理由。——我只看到一个人，他对它感到厌恶，就像它必定会这样被感觉的那样——歌德……

49

歌德——不是一个德国事件，而是一个欧洲事件：一个了不起的尝试，想通过退回到自然，通过上升到文艺复兴的质朴，来克服十八世纪，来自这个世纪方面的一种自我克服。——他身上带有这个世纪最强烈的本能：多愁善感，崇拜自然，反历史，理想主义，非现实和革命（——革命只是非现实的一种形式）。他借助历史，自然科学，古希腊罗马，同样还有斯宾诺莎，尤其借助实践活动；他用完全封闭的视阈圈住自己；他不离弃生命，他置身其中；他不气馁，尽可能多地接受，承担，吸收。他想要的，那是整体；他抵制理性、感性、情感和意志的互相隔离（——这种隔离受康德，歌德的对趾人，以最可怕的经院哲学鼓吹），他训练自己成为整体，他创造自身……身处一个非现实地思考的时代中心，歌德是个坚定的实在论者：他肯定同他在这点上相近的所有人，——他的所经所历，没有比那个最最实在者（ens realissimum），即拿破仑更伟大。但歌德塑造了一个坚强、有高度修养、所有体态动作灵巧轻盈、具自制力、敬畏自身的人，他可以把自然品质的全部领域和财富，大胆地给予自己，他强大得足以使用这个自由；他塑造了宽容的人，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强大，因为他懂得把那导致平庸者毁灭的东西，为自己的利益所用；他塑造了无所顾忌的人，除了软弱，不管它现在叫罪孽或者德行……这样的一个实现了自由的英才，带着快乐和信赖的宿命论站在宇宙中央，心怀信仰，唯独个体卑劣，而在整体中一切得到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可是，这样一种信仰在所有可能的信仰中层次最高：我用狄俄尼索斯的名字为它举行洗礼。——

50

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十九世纪所追求的一切，也是歌德作为个人所追求过的：理解和赞同中的一种整体性，对每个人的接纳，大胆的实在论，对所有事实的敬畏。可整个结果不是歌德，却是一种混乱，一种虚无主义的唉声叹气，一种不知所措，一种疲惫的本能，而它在实践中还驱使人们回溯十八世纪，（——比如情感的浪漫主义，利他主义和极端的多愁善感，鉴赏力中的女性主义，政治中的社会主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十九世纪，尤其在它的末叶，只是一个野蛮化加强的十八世纪，也就是说一个颓废的世纪？所以不仅对德国而且对整个欧洲来说，歌德仅是一个偶然，一个美妙的徒然无效？——但是，倘若人们从一种公共利益的可怜角度关注伟人，那会误解伟人。一个人不懂得从伟人身上获利，或许这本身就属于伟大……

51

歌德是让我肃然起敬的最后一个德国人：他感受到了我所感受的三件事，——就是对于“十字架”我们的理解也一样……时常有人问我，我究竟为什么用德语写作：在任何地方我都不会像在祖国那样，被更糟糕地阅读。不过其实有谁知道，我是否还希望，在今天被人阅读？——创造岁月无法侵蚀的事物；根据形式和实质，争取一个小小的不朽——我还从未谦虚得向自己要求更少。警句和格言是“永恒”的形式，而我在这方面是德国人的首席大师；我的抱负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的话，——别人用一本书也没说出的话……

我已经给予人类它所拥有的那本最深刻的书，我的查拉图斯特拉：不久我要给它那本最具独立性的书[[256]](#footnote-256)。——

**我感谢古人什么**

1

最后谈一下那个我曾寻找过其入口的世界，那个也许我发现了一个新入口的世界——古代世界。我的鉴赏力，它或许是那宽容的鉴赏力的对立面，即使在这里保持着距离，不笼统地说是：它根本不喜欢说是，而宁愿说不，而最喜欢一声不吭……这适用于整个文化，这适用于书籍，——这也适用于地方和风景。归根到底，只有很小一部分古代书籍，在我的生命中还算回事；最有名的不在其中。我对于风格，对于作为风格的警句诗[[257]](#footnote-257)的感受力，是接触萨鲁斯特[[258]](#footnote-258)的时候，几乎在一瞬间觉醒的。我没有忘记我尊敬的老师科森[[259]](#footnote-259)的惊讶，那时他不得不给他最差的拉丁文学生最好的分数——，我一下子变得成熟。简练，严格，有尽可能多的基本储备，针对“华丽辞藻”和“华丽情感”的一种冷峭恶意——就此我看透了自己。一直深入到我的查拉图斯特拉，人们可以在我身上重新认出对于罗马风格和风格中“比青铜更加不朽”[[260]](#footnote-260)的一种非常认真的追求。我第一次接触贺拉斯[[261]](#footnote-261)时，情况没什么两样。在其他诗人那里，我迄今未曾有过同样的、贺拉斯的颂歌却从一开始就带给我的艺术惊喜。在某些语言里，这里达到的东西，甚至无法想望。文字的马赛克，每个词作为音调、位置、内容，左顾右盼，朝着整体迸涌力量，在符号的范围和数量上是最低的限度，可在符号的能量上获得最高——这一切是罗马式的，倘若大家愿意信我，而且出色地高贵。相反，其余的全部诗歌是过于流俗的东西，——纯然是一种感情的喋喋不休……

2

对希腊人我完全没有什么类似的强烈印象需要感谢；坦率地说，他们对于我们来说，不可能像罗马人一样。人们不向希腊人学习——他们的种类过于陌生，也过于流动，不能产生命令和“经典”的效用。有谁曾向一个希腊人学习写作！有谁曾缺少罗马人学习写作！……请别用柏拉图来反驳我。与柏拉图相比，我是个彻底的怀疑论者[[262]](#footnote-262)，而且始终不去附和学者中具有传统的、对杂耍演员柏拉图的惊叹。在这方面，古代那些最挑剔的鉴赏家毕竟站在我的一边。就我看来，柏拉图把风格的所有形式弄得一团糟，由此他是风格的第一个颓废者：他做错了某些类似的事，像发明了迈尼普斯讽刺[[263]](#footnote-263)的犬儒学派。柏拉图的对话[[264]](#footnote-264)，辩证法的这种极其自负和幼稚的类型，一个人必须从未读过像丰特内勒[[265]](#footnote-265)这样的优秀法国作家，才会觉得它有魅力。——柏拉图枯燥无味。——最后，我对柏拉图的不信任是深刻的：我觉得他如此偏离希腊人的所有基本本能，如此道德化，如此先于基督教存在[[266]](#footnote-266)——他已经把“善”这个概念当作最高概念——，对于这整个柏拉图现象，我宁愿使用这个严厉的 “高级诈骗” 的词，或者，倘若别人更愿意听，用理想主义——而不愿使用别的什么词。这个雅典人曾在埃及人那里[[267]](#footnote-267)上过学（——或者在埃及的犹太人那里？……），为此人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基督教的巨大灾难中，柏拉图是被称为“理想”的双关语和迷惑力，它让古代的高贵天性有可能误解自身，从而踏上通往“十字架”的桥[[268]](#footnote-268)……而在“教会”的概念里，在教会的建构、体系和实践中，还有多少柏拉图！让我从一切柏拉图主义那里获得恢复，嗜好和疗养的，在任何时候是修昔底德[[269]](#footnote-269)。修昔底德，也许还有马基雅弗利[[270]](#footnote-270)的《君主论》，由于它们的绝对意志，即毫不自欺，在现实中而非“理性”中、更非在“道德”中看待理性，它们与我自身最为相近……为了进入生活而受到文理中学的训练，而作为报酬，这个“受到经典教育的”青年人赢得的是希腊人那可怜的对于理想的粉饰。可没人能比修昔底德更彻底地治疗这种粉饰。人们得一行一行地翻阅他，像读他的文字那样清晰地读懂他的隐念：很少有这样富有隐念的思想家。智者派文化，可以说实在论者文化，在他身上得到完满的体现：这个无比珍贵的运动，正处在苏格拉底学派[[271]](#footnote-271)的道德和理想欺骗正四处爆发之当口。希腊哲学是希腊人本能的颓废；修昔底德是古代希腊人本能中那强大、严格和硬朗的事实性的伟大总结和最后呈现。面对现实的勇气最后区分了修昔底德和柏拉图这样的天性：柏拉图是现实面前的懦夫，——所以他遁入理想；修昔底德能掌握自己，所以他也能掌握事物……

3

在希腊人身上闻出“美丽的灵魂”，“不偏不倚”和其他的完美性，比如欣赏他们身上的伟大的静穆，理想的意向，高贵的单纯——我自身携有的心理学家[[272]](#footnote-272)保护我避开这种“高贵的单纯”，那最终是一种德国式的愚蠢（niaiserie allemande）的东西。我目睹他们那最强烈的本能，权力意志，我目睹他们在这种冲动的狂暴威力前颤抖不已，——我目睹保护措施中产生出他们全部的机构，以针对他们内部的炸药求得互相间的安全。内在的巨大张力然后以可怕和无情的敌意向外爆发：城市行政区互相厮杀，每个城市公民也许就此找到自身的安宁。一个人必须强大：危险近在咫尺——，它在四处窥伺。矫健柔韧的躯体，希腊人拥有的大胆的实在论和非道德主义，这曾是一种必须，而非一种“天性”。它是以后的结果，而非开始就有。通过节日和艺术，人们要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想有健康自信的感觉，显示自己健康自信：那些是自我美化、在某些情况下是自我恐吓的手段……让我们按德国的方式，根据希腊人的哲学家评判希腊人，比如利用苏格拉底学派的庸俗性来解析，什么在本质上是希腊式的！……哲学家是希腊文化的颓废派，是针对古代和高贵鉴赏力（——反对好斗本能，反对城邦[[273]](#footnote-273)，反对种族的价值，反对出身的权威）的逆反运动。苏格拉底的德行得到宣扬，因为希腊人已经失去了它们：敏感，胆怯，反复无常，大家都是喜剧演员，他们有太多的理由，听人说教。似乎无济于事：不过，夸饰的词语和姿态如此地适合颓废派……

4

我是第一人[[274]](#footnote-274)，为理解那较古老的、仍然丰盈甚至充溢而出的希腊本能，而认真看待那名为狄俄尼索斯的奇妙现象：这唯独从力的过剩出发才能得到解释。谁像当今在世的那位希腊文化[[275]](#footnote-275)最深刻的专家、巴塞尔的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一样去探究希腊人，他就会立刻明白，这值得去做：就上面提到的现象，布克哈特给他的《希腊人的文化》一书添上了独立的一章。要是想了解相反的情况，可以看一下德国语文学家们接近狄俄尼索斯时那近乎可笑的本能贫乏状况。特别是那个著名的洛贝克[[276]](#footnote-276)，他带着一条在书本之间被挤干的书蠹的威严的自信，爬进这情状神秘莫测的世界，说服自己，把自己那令人厌恶的轻率和幼稚当成科学，——洛克使用他那全部的博闻强记向人暗示，所有这些稀罕事物其实毫无意义。事实上，教士们想向这些纵欲狂欢的参与者传达的，并非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比如葡萄酒刺激欲望，人在某些情况下依靠果实生活，植物春天繁茂，秋季衰败。至于纵欲狂欢之起源，其习俗、象征和神话令人惊讶地丰富，确实泛滥于整个古代世界。这样的丰富性给了洛克在精神的富足上提高一个级别的理由。“希腊人，他说，阿革劳法姆斯（Aglaophamus I,672），他们别无他事可做，就欢笑，跳跃，四处休息，或者因为人们有时也会对此有兴趣，坐下身体，哭泣和悲鸣。另一些人随后过来，为这种引人注目的举止寻找某个理由；由此产生了无数节日传说和神话，以解释那些习俗。另一方面人们相信，那种在节日中进行的滑稽活动，也必定属于节日庆祝，并把它当成祭拜形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保存下来。”——这是可鄙的胡说八道，大家一刻也无须把这样一位洛贝克当真。倘若我们检验温克尔曼[[277]](#footnote-277)和歌德替自己造就的“希腊的”这个概念，并发现它同产生狄俄尼索斯艺术的因素——即纵欲狂欢[[278]](#footnote-278)，互不相容时，我们的感觉截然不同。其实我并不怀疑，歌德原则上大概也把这样类似的东西从希腊灵魂的可能性中排除在外。所以歌德并不理解希腊人。因为，只有在狄俄尼索斯的神秘仪式[[279]](#footnote-279)里，在狄俄尼索斯状态的心理中，希腊人本能的根本事实——其“生命意志”才得以表达。希腊人以这样的神秘仪式保证什么？那永恒的生命，生命的永恒轮回；未来在过去中得到预告和供奉；对于超越死亡和变化之生命的胜利首肯；通过生殖，通过性的神秘仪式，真正的生命作为整体的继续生存。所以，对希腊人来讲，性的象征，是庄严的象征自身，是整个古代虔敬内含的真正深意。交配、怀孕和分娩行为中的所有细节唤起最高昂和最庄严的情感。在神秘仪式的学说中，痛苦被神圣地言说：“产妇的呻吟”完全让痛苦神圣化，——所有的生成和生长，所有未来的担保取决于痛苦……为了有永恒的创造喜悦，为了生命的意志永恒地肯定自身，也必须有永恒的“产妇的阵痛”……这一切意味着狄俄尼索斯这个词：除了这个希腊的、即这个狄俄尼索斯的象征表达，我不知道有比这更高级的象征表达。在此之中，可以宗教地感受到生命那直指生命之将来、生命之永恒的最深邃本能，——通往生命自身的道路，生殖作为神圣的道路……只有基督教，带着它那从根本上反对生命的怨恨，把性当作某种肮脏的东西：它把污秽之物泼洒到开端上，即我们生命的前提上……

5

纵欲狂欢的心理作为一种漫溢的生命和力量感，甚至痛苦在此之中也作为兴奋剂起效，这赋予我理解悲剧性情感的钥匙，而这样的情感既遭到亚里斯多德，在特殊情况中也遭到我们悲观主义者的误解。悲剧远不能替叔本华意义中的希腊人的悲观主义证明什么，它相反可以被视为对悲观主义的决定性拒绝和反证。对于生命的首肯即使在其最陌生和严酷的问题中存在；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级类型的牺牲中为自己的不可枯竭而欣喜万分——我称这为狄俄尼索斯的，我猜这是通往悲剧诗人之心理学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同情，不是为了借助激烈的发泄，让自己从一种危险的情绪中得到净化——亚里斯多德就是这么理解——：相反是为了，超越恐惧和同情，成为生成之永恒的喜悦自身，——这种喜悦还包含着对于毁灭的喜悦……由此我再次触及我的出发点——《悲剧的诞生》曾是我对一切价值的首次重估：由此我重新站回到培育出我的意愿和我的能力的土地上——我，这个哲学家狄俄尼索斯最后的信徒，——我，这个永恒轮回的老师……

**锤子说话**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3，90

“为何如此坚硬！——有一次厨房用煤对钻石说：难道我们不是近亲？”

为何如此软弱？哦，我的兄弟，我如是问你们：难道你们不是——我的兄弟？

为何如此软弱，如此退让和顺从？你们的心中为何有这么多的否定和拒绝？你们的目光中只有这么少的命运？

倘若你们不愿成为命运和无情：你们将来如何能同我一起——取胜？

倘若你们的硬度不足以闪光、割断和剪切：你们将来如何能同我一起——创造？

所有创造者都是坚硬的。你们必须以为那是极乐，若把你们的手压在千年之上，犹如压在蜡上，——

以为那是极乐，若在千年的意志上书写，犹如在青铜上，——比青铜更硬，比青铜更高贵。十分坚硬，这才是最高贵者。

这块新的牌子，哦，我的兄弟，我把它放到你们头上：请变得坚硬！

1. 偶像的黄昏：题目极其多义。从词的历史上讲，它业已有违任何一种单义的理解。“götz”在中古高地德语中还是戈特弗里德（Gottfried）的一个昵称，在早期新高地德语中出现时，指的是“圣像”，然后自从路德时代起，指非基督教和多神信仰宗教的“异教之神”，以及指在这些宗教里享受神之崇拜的人，物，或者自然生灵。（关于“黄昏”请参见后记）（即这里的Pütz版说明。译者）。。以下未另注明，均为Pütz版注。原注没有序号。序号为译者所加。原注在汉译中，极个别地方有技术性处理（译者）。 [↑](#footnote-ref-1)
2. 用锤子：在《善与恶的彼岸》以“宗教的本质”为题的第三章里，尼采第一次使用这个比喻。那里（§62）谈到基督教历十八个世纪，把人变成“精妙的怪胎”：“谁要是（……）手持任何一把神的锤子，走向人的这种几乎是随意的蜕变和萎缩（……），难道他就不必带着愤怒，带着同情，带着惊骇呼叫：‘啊，你们这些愚蠢的家伙，（……）你们都干了些什么！（……）看你们怎样胡乱敲打和弄坏了我那漂亮的石头！你们把它都做成了什么！’” [↑](#footnote-ref-2)
3. 战争：在把战争评价为对抗性和对立性之创造力的象征时，尼采主要针对的是赫拉克利特（Heraklit von Ephesos, 前550-480），一个被他高度评价的哲学家。他曾在自己的残篇著作中宣称战争是“万物之父”。（请参见论《快乐的科学》的、出自《德语韵律的序曲》中的41篇，在标题“赫拉克利特派”下有：“尘世的所有幸福，/朋友们，由战争给予！/啊，为了成为朋友，/需要硝烟之助！”）在道德观念和品德行为的关联中，尼采还讨论了英国启蒙作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哲学中的战争的意义，其人类学理论追述了人的一种自然状态，而在这个状态中，流行着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homo homini lupusw”，“人是人的狼”）；尼采将这样的战争同英国自然研究者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82）的物种选择学说联系在一起。这种理论以为，在持续不断的竞争（“struggle of life”“生存竞争”）中，那些最好地适应当时主要环境条件的个人和物种，能得以生存。（参见《不合时宜的思想》第一篇第七节）。 [↑](#footnote-ref-3)
4. 胆量凭伤口生长，勇敢借伤口加强 (increscunt animi, virescit volnere virtus)：引言出自罗马编年史家安提阿斯 （Furius Anitias, 公元前一世纪），在罗马作家格利乌司（Aulus Gellius, 约130-170）的文集《雅典之夜》（Noctes Atticae）13卷11章中得以流传。这是一部有学术价值、内容丰富的文集，涉及到许多历史和文化史的题目。 [↑](#footnote-ref-4)
5. 也有人说……偶像：可想而知，这个句子能以“而是上帝”继续下去。不过在《偶像的黄昏》的论证过程中会显示出，尼采没有对基督教的“一神论”展开全面攻击，而是抨击了那种建立在一个唯一的形而上学最高等级的存在者之上的思想建筑，不管那牵涉到的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中世纪形而上学的“现实存在”（ens realissimum）或者是杜林（Dühring）的“生命价值”。 [↑](#footnote-ref-5)
6. 都林……完稿之日：1888年4月起，尼采第二次在都林逗留。9月底他还在修改定于1889年1月出版的《偶像的黄昏》。9月30日他结束了论文《敌基督。基督教批评试论》的手稿，计划为《重估一切价值》的第一部分。 [↑](#footnote-ref-6)
7. 懒惰……之始：谚语“懒惰是万恶之始”的警句式变体。 [↑](#footnote-ref-7)
8. 想要……或者上帝：“倘若他[个人]根本无法加入一个社会群体，或者由于他的自我满足，不需要这么做，那么他当然不是国家的一分子，不过正因为如此，或者是动物，或者是上帝。”（亚里斯多德，《政治学》，1253 a）。 [↑](#footnote-ref-8)
9. “所有的真理都是单一的”：引言源出于叔本华的箴言：“单一是真实的标志”（Simplex sigillum veri）。这个句名来自荷兰医生布尔哈夫（Hermann Boerhaave, 1668-1738），刻在莱登的彼得大教堂中他的纪念碑上。叔本华曾在《论法学和政治》（§121）第九章，《附录和补遗》（《论宗教》，§174）和《道德的基础》（§8）中引用过它。 [↑](#footnote-ref-9)
10. 我……不想知道：苏格拉底“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颠倒。苏格拉底在他的申辩中，以此解释了有人背后说他的智慧的话。即唯独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而其他所有他问过的人，总是自以为知道些什么，但其实并不比他知道得更多：“看来我还是在这一小点上要更智慧些[……]就是我对不知的事，并不以为知。”（柏拉图，《申辩篇，21d》）在苏格拉底的事例中，对于认识之局限的洞见导向智慧，而在尼采那里，对于认识之限定的意志是通往智慧的正确道路。 [↑](#footnote-ref-10)
11. 容或上帝是人的一个失误？：这第二个问题包含了一种影射，针对始于古代、尤其在色诺芬（Xenophanes, 约前565-470）那里可以看出的对上帝形象人格化的批评，也就是说对人根据自己的图像创造神灵的努力的批评。这个批评性的开端在19世纪中，在费尔巴赫（Ludwig Feuerbach, 1804-72）的哲学里留下最鲜明的印记。他在自己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1841；《宗教的本质》，1845）中，把宗教解释为人的自我崇拜，把神灵解释为投射到天上的人的愿望。 [↑](#footnote-ref-11)
12. 让我……坚强：对此请参见尼采自传体论著《看哪这人》（“我为什么这么智慧”，§2）。 [↑](#footnote-ref-12)
13. 你自助：然后人人助你：根据谚语：“你自助，然后上帝助你”。 [↑](#footnote-ref-13)
14. 内疚是不体面的：尼采在论著《论道德的谱系》（1887），准确地说在题为“‘罪孽’、‘内疚’及其他”的第二篇文章中，详细地讨论了良心折磨。在那里，心理现象被解释为攻击性的一种形式。处于社会化压力之下的人，把这种攻击性收入内心，对付自身；就此而言，良心折磨是对人的无拘无束、任性率真的活力的一种背叛类型。 [↑](#footnote-ref-14)
15. 一头驴子：暗指法国经院哲学家比里当（Johannes Buridan,约1295-1366）的一个道德哲学的譬喻。就此来看，人无法在两笔同样大的财富之间进行选择，就像一头驴子，面对两堆同样大的干草，无法决定要哪堆,而随后饿死（“比里当的驴子”）。 [↑](#footnote-ref-15)
16. 英国人：暗指18和19世纪英国哲学中伦理学的享乐主义（幸福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边沁（Jeremias Bentham, 1748-1832）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73）。就他们来看，“快乐”（pleasure）是唯一的和最崇高的财富：个人通过为他自己的快乐操心，同时也就为所有人的快乐操心。 [↑](#footnote-ref-16)
17. 男人[……]他“理想”的：警句源自尼采在《龚古尔兄弟日记》（巴黎1887，I，283页）中看到并摘录的话：“话题转到了女人身上。根据他的观点，男人创造了女人并且把他所有的诗情赋予了她。” [↑](#footnote-ref-17)
18. 遗腹子（postthume Menschen）：按字面意思：“晚生的人”；这里指的是，走在他们的时代之前和不“合时宜”的人。 [↑](#footnote-ref-18)
19. panem et Circren：使用罗马作家尤维纳利斯（Juvenal,58/67-约127）一句箴言的文字游戏。他在他的一篇讽刺诗中（10，81），抱怨“panem et Circren”（面包和[马戏团]游戏）是罗马民众所渴望的一切。尼采在文章中暗指了喀耳刻（Circre）的名字，她在希腊神话中被视为极具魅力的女骗子，其“艺术”是魔术（她借助自己的美貌对奥赛德的同伴施行魔法，把他们变成了猪）。尼采这里介绍的艺术家类型，仅仅在其物质的需求中，要求“不高”，不过这个艺术家类型在艺术中和使用他的艺术，追求控制人的有魔法、能迷惑人的威力。 [↑](#footnote-ref-19)
20. 走钢丝演员：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5）的序言中，尼采把一个走钢丝演员的出场，阐释为一个宽泛的寓言，直指处于“动物和超人”之间的人，他那漂浮不定、险象环生和受制于过渡的环境：“人的伟大在于，正是这样，他是桥梁而不是目的：人身上的可爱处，正是这样，他是一个过渡和一个没落。”（前言，§4） [↑](#footnote-ref-20)
21. “恶人无歌”：参见德国作家佐伊梅（Johann Gottfried Seume, 1763-1810）的诗《颂歌》中的第一段：“在有人歌唱的地方，你可以静静躺下，/[……]恶棍无歌。”（佐伊梅全集，莱比锡1839，第七卷，216页） [↑](#footnote-ref-21)
22. 十八年来：指1871年、帝国成立以来。（参见尼采《不合时宜的思想》，前言，§1）。 [↑](#footnote-ref-22)
23. 人们以为女人[……]肤浅过：警句源自法国画家和作家加瓦尔尼（Paul Gavarni）的一句名言，那是尼采从《龚古尔兄弟日记》（巴黎1887，I，325页）中摘引的：“我们问他，他是否曾经理解过一个女人？——女人完全是玄妙莫测的，不是因为她如此深刻，而是因为她空洞！” [↑](#footnote-ref-23)
24. 幸福[……]多么卑微：参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中午”。 [↑](#footnote-ref-24)
25. 缺少音乐[……]谬误：参见尼采1888年1月15日给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的信：“没有音乐的生命简直就是个谬误，一种艰辛劳累，一次流亡。” [↑](#footnote-ref-25)
26. 德国人[……]在歌唱：暗指德国作家和出版家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 1769-1860）的一首诗，作于1813年，题目是《德意志祖国》；诗中写道：“只要在德国的语言响起的地方/天上的上帝在歌唱[……]。”1888年9月20日，尼采的朋友加斯特在一封信里就此写道：“我以为，‘上帝’ [……]是第三格而不是第一格。”对此尼采在1888年9月27日回答：“老朋友，您以自己对于上帝概念之第三格和第一格的讨论，根本就没有达到我的高度。第一格是此处的关键，是它的对于此在的充足理由。” [↑](#footnote-ref-26)
27. 除了坐着[……]写作: On ne peut penser et écrire qu’assis（参见莫泊桑为《福楼拜致乔治·桑的信》所写的前言。巴黎1884，第3页。） [↑](#footnote-ref-27)
28. 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1888年7月28日，在给福克斯（Carl Fuchs）的一封信中，尼采承认非道德主义者类型，是“至今达到的最高级的‘知识分子的本分’”，而“当它自己成了本能和必然性之后，它就可以把道德当作幻觉处理。”而且，他在《看哪这人》中，曾称自己为非道德主义者的早期代表之一（见“我为什么是个命运”§2）。 [↑](#footnote-ref-28)
29. 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这个概念，首先是对一种社会哲学和政治思维模式的综合称呼。这个模式拒绝统治的任何形式（比如国家，教会等）。尼采在此隐射“集体主义和革命的”无政府主义。它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尝试通过恐怖袭击，争取对欧洲的社会关系进行暴力颠覆。俄国的革命家巴枯宁（Michail Alexandrowitsch Bakunin, 1814-76）被视为其最重要的鼓吹者。他还曾经参加了1849年5月的德累斯顿起义。1848年春，他认识了里查德·瓦格纳，后者自己的革命性著述——比如1848年4月出版的文章《革命》——明显地受到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影响。 [↑](#footnote-ref-29)
30. 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外最重要的希腊哲学家（约前470-399）。尼采视苏格拉底为理论家，批判性科学和乐观的理性信仰的第一位代表。他在自己的一生中，曾把苏格拉底作为这样一个人不断地进行最猛烈的抨击。对这个哲学家的批评，尽管如此地彻底无情，但其中也始终混杂着他对苏格拉底的敬佩。（参见尼采的论著《来自音乐精神的悲剧的诞生》。） [↑](#footnote-ref-30)
31. 我[……]一只公鸡：尼采在此自由和扩展地引用了出自柏拉图《菲多篇》的对话（118a）。据载，苏格拉底临死前最后的话是这样的：“啊，格黎东，我们欠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一只公鸡。还了这个愿，别忘了。”这段文字首先可以从生平上得到解释：由于家里有人生病，苏格拉底在受法庭审判前，许诺给医药神，即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要是病人痊愈的话（参见乌尔里希·封·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柏拉图II, 58页）。相反，被尼采扩展的引文示意地回溯《菲多篇》的主题，它同时概括了生命或者死亡，肉体或者灵魂对于人的重要性问题。面对他那即将来临的死刑，看来苏格拉底如此泰然自若和明白无疑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事实上[……]那些真正进行哲思的人仰慕死亡。在所有的人中间，死亡对他们来说，最不显得那么可怕。” （《菲多篇》，67e） [↑](#footnote-ref-31)
32. 颓废：法语“décadence”首先出现在17世纪，指称作为一种文化整体没落的（审美）鉴赏力的衰败；参见法国哲学家布瓦罗（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1636-1711）的《关于龙琴的思考》（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quelques passages du Rhéteur Longin）。在19世纪，颓废和“颓废派”——作为其代表——涉及一种文学运动，其特征首先是一种迷醉地得到升华的唯美主义，而它的前驱是法国诗人魏尔兰（Paul Verlaine,1844-96）和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67）；颓废派在1886-89年间在巴黎出版的《颓废者》杂志上，替自己创造了喉舌。在80年代，尼采把这个概念引入德国；他在自己的论著《敌基督》（1888）中，扼要地定义：“在权利意志以任何一种形式走向没落的时候，每次也都有一种生理的倒退，一种颓废。”（§17）尼采自视为颓废派的代表，同时又是它的克服者（参见《看哪这人》，“我为什么这么智慧”，§1），以其对于颓废的批判，作用非同一般，对包括里尔克（Rilke），霍夫曼斯塔尔（ Hofmannsthal），海因里希·曼和托马斯·曼（ Heinrich und Thomas Mann）等在内的人，产生了最持久的影响。（参见科本：《颓废的瓦格纳主义。关于欧洲颓废派文学的研究》，柏林和纽约1973。） [↑](#footnote-ref-32)
33. 《悲剧的诞生》1872：在这部论著中主要请参见12-15段，以及“后记”中“悲剧和苏格拉底”的那段话。 [↑](#footnote-ref-33)
34. 苏格拉底是小民：苏格拉底于469年左右出生在雅典的城区阿洛派克。那里的居民主要是小手工业者和他们的家庭。他的父亲苏福罗尼斯克斯（Sophroniskos）是石匠，而他的母亲费娜莱特（Phainarete），为了帮助维持家庭，在晚年曾当过接生婆。苏格拉底自己据说曾当过石匠学徒（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见解》，莱比锡1921，70页），然后才专心致志地投身于哲学，而同时生活在贫穷节俭的环境里；对于家庭的收入，他显然没有任何贡献，所以他自己和他那三个儿子，依靠他的妻子克桑梯珀（Xanthippe）挣来的不多的钱生活。 [↑](#footnote-ref-34)
35. 他有多么丑陋：对苏格拉底体态之寒酸相的最著名描写，可以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亚西比德的话中找到。在那里，苏格拉底被与极其丑陋的玛尔叙阿相提并论。那是一个长有马耳和马尾的萨梯（Satyrn）。当他吹笛子的时候，通常被描绘成鼓着面颊，登着双眼的样子。亚西比德就这样谈论苏格拉底：“所以我断言，他非常像萨梯玛尔叙阿。说你的外表同他相像，啊，苏格拉底，看来你自己也不会否定。”（苏格拉底《会饮篇》，215b） [↑](#footnote-ref-35)
36. 人类学学者：人类学是关于人类的起源，发展和分类的科学。自从其在古希腊时代的开端起，就自视为跨专业的学科；所以就有了哲学、教育学和神学的等专门的人类学。但尼采在这里提及的首先是所谓生理学的人类学，属于其研究对象的除了体格研究，血统理论和种族学，还有人的外貌和性格之关系。 [↑](#footnote-ref-36)
37. 一个外国人……先生！：这个传说在罗马作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前106-43）的《图斯库卢姆谈话录》中得到流传：叙利亚医生和巫师佐皮罗斯（Zopyros）（这个被尼采称为外国人的人）对苏格拉底说，从他的相貌中,他可以看出他的许多恶习和弱点；紧接着他遭到苏格拉底的朋友们的嘲笑，可苏格拉底自己证实了他的说法，说，佐皮罗斯说得对，他自己身上是带有恶习的标记，“不过这些恶习被他借助理性克服”（《图斯库卢姆谈话录》，IV卷，80章）。 [↑](#footnote-ref-37)
38. 佝偻病人的恶毒：佝偻病（“英国病”）是一种慢性的，儿童早期的疾病，其主要症状是骨骼的生长紊乱。尼采讥讽地影射的正是这点，其方式是，把确为“吃亏者”的充满仇恨的恶毒，强加给苏格拉底。此外，据说苏格拉底真的具有非常矮壮的体形。 [↑](#footnote-ref-38)
39. 精灵：精灵（Daimonion）同它的来源词“daimon”一样，指称一种神的生灵，不是某个确定的神，而是一种有时会表明自己的神力,或者一种个人的保护神或者折磨神。这里影射苏格拉底的“精灵”；苏格拉底自己在他的申辩中说，他不时地会遭遇到“某种神的和神灵的东西”：“我从儿童时代起身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那是一个声音，每次让我听到它的时候，总是劝说我，放弃我打算做的事，却从来不说服我做什么。”（柏拉图《申辩篇》，31d） [↑](#footnote-ref-39)
40. 滑稽演员（buffo）：意大利歌剧中丑角歌唱演员（Opera buffa）。 [↑](#footnote-ref-40)
41. 苏格拉底的……等式：尼采在此从形式上对一个理性主义的德行思想作了简化。那是苏格拉底根据柏拉图的描述所提出的。据此，只有那个知情者才真正是有德行的，而德行自身是可以获得的最高幸福。请参见柏拉图，《普罗塔哥拉》，361a-c，以及色诺芬尼(Xenophon)，《回忆苏格拉底》，III，9（主要§5）。 [↑](#footnote-ref-41)
42. 辩证法：人们起先理解的辩证法，仅仅是学术的讨论、修辞学上正确的问答艺术。尼采这里暗指的，是辩证法和修辞学通过柏拉图所获得的有决定性意义的新阐释：那些智者派（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希比亚，欧提德穆）风格化为肆无忌惮的演说家类型。对这样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对真理的哲学探究，而是赢利和个人的好处。他们使用自己那辩证的演讲术，只是为了进行自我标榜，喋喋不休的咬文嚼字，以及貌似哲学的吹毛求疵。 [↑](#footnote-ref-42)
43. 小民崛起：尼采在《悲剧的诞生》（1872）中已经断言这点。他在那里借助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喜剧《蛙》中第五幕的例子，描绘了由于理性主义和辨证思维方式的出现，希腊的“高贵性”的终结：在那里，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作为古代阿提卡悲剧的代表——和欧里庇得斯——作为“辨证的革新家”——一起进行比赛，看两人中谁是更出色的诗人。欧里庇得斯这样自夸：“女人得为我演讲，甚至奴隶也得演讲/男人开口讲话，姑娘开口讲话，还有老妇 - /[……]我只是民主地行事”；“这里的民众在我身边仅学会了说话 - /[……]学习了培养自己有条理，精确地斟酌言辞。”（诗行946-950以及953-956。Ludwig Seeger译） [↑](#footnote-ref-43)
44. 丑角：在17 和18世纪德国戏剧中，丑角是一个粗俗和滑稽的人物，在严肃的段落（“主剧”）之后，为了娱乐观众而出场。这个人物的构思可以回溯到英国和意大利的样板，到了18世纪，被启蒙运动美学赶下舞台（戈特舍德）。 [↑](#footnote-ref-44)
45. 列那狐：暗指歌德的史诗《列那狐》（1794），一个关于狡猾的狐狸的一连串系列改编的高潮。在歌德的版本中，列那狐两次成功地躲过了确定无疑的死亡，办法是对狮子诺勃尔和它的宫廷成员，做了诡计多端的，“辨证的”演讲，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敌对方的道德败坏。 [↑](#footnote-ref-45)
46. 小民的记恨（Pöbel-Ressentiment）：“记恨”字面含义是“重新感受”，特别是在已经发生的伤害之后的恼怒。在尼采的论著《论道德的谱系》（1887）中，记恨是解释不同道德发生史时主要思路中的一种：作为一种对生命的嫉妒，记恨的结果是，具有自信之本能的少数人，其自然的价值感受到篡改。其途径是大量弱者和吃亏者（“小民”）贬低和诋毁健康和强大，而这——尼采这样以为——至迟在基督教同情道德被引入时，又导致人的某种心灵上的自我毒害。 [↑](#footnote-ref-46)
47. 竞赛（Agon）：在古希腊，这个词指的既是体育竞赛，也是在宗教节日为表示对神的敬意而举行的戏剧比赛。 [↑](#footnote-ref-47)
48. 苏格拉底……色鬼：在《会饮篇》的最后，阿尔基弼亚德（Alkibiades）在他对苏格拉底的赞美辞中，证明了苏格拉底同爱神厄洛斯的理想的同一性。（柏拉图《会饮篇》，215a-222b）。 [↑](#footnote-ref-48)
49. 欲望[……]反暴君：“反暴君”，这个抵抗欲望的力量，是——西塞罗笔下的苏格拉底这么认为——理性（ratio）。 [↑](#footnote-ref-49)
50. 理性的日光：这整个段落以技巧精湛的方式，变幻着由明亮，灯光，清澈等组成的词汇场。那是自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以来对于理性和启蒙的最稳定的比喻（在法语里，18世纪就叫做“光的世纪”，也就是启蒙的世纪）。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里，对于认识的追求和真理的问题性，在一篇寓言里得到了描绘：被绑之人在一个洞穴里，在一面洞穴通道的墙上，总是仅看到外部世界的物体投在上面的阴影，而他们认为这是真实的现象。倘若他们有一天能够挣脱束缚，来到日光下，他们会被痛苦地灼伤双眼，从而试图逃回阴暗的世界。哲学家们最最高贵的任务是——柏拉图这样认为——把世人从幻象、阴影和错觉世界里解放出来，带到真实存在的“日光下”——也就是说借助于理性、认识和启蒙的帮助。 [↑](#footnote-ref-50)
51. 苏格拉底想死[……]染病已久：事实上，既在色诺芬尼那里（《回忆苏格拉底》，III，8，6）也在柏拉图的对话集《申辩篇》（34 c- 35b）和《格黎东篇》中，有清楚的提示，说苏格拉底甘愿接受判决和死刑。在他被处死前的一天，格黎东怂恿苏格拉底逃亡。监狱看守已经接受贿赂，色萨利的一处庄园可以提供流亡居住。但苏格拉底断然决然地，拒绝接受这个计划。内心独白（“苏格拉底不是医生[……]”）也许是对苏格拉底对法官的临终之言的一种改写：“我很清楚，死亡和摆脱一切烦恼，眼下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事，[……]现在，该我们走的时候是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活。我们中间谁走向更好的结局，这点除了上帝，大家都不知道。”（柏拉图，《申辩篇》，41d – 42a） [↑](#footnote-ref-51)
52. 埃及主义：影射埃及，尤其在金字塔时代（古代王国，3至6王朝，前2780–226）的僵化，等级制，造型艺术中的散点透视法，正如也在死亡和木乃伊习俗中展现的那样：在（成为木乃伊的）亡者的“永恒城市”里，实存该被彻底地从对于时间、生成和消亡的俯就中排除。 [↑](#footnote-ref-52)
53. 单一的有神论（Monotono-Theismus）：尼采使用这个文字游戏，把无聊的单一性强加给有神论，这个对唯一的一个上帝的信仰。 [↑](#footnote-ref-53)
54. 埃利亚学派：根据下意大利城市埃利亚得名的哲学流派，公元前540年由色诺芬尼建立，属于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的有，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前540 - 480），芝诺（Zenon，约前490 - 430），同样还有属于公元前5世纪的埃利亚的麦里梭（Melissos von Elea）。对尼采的论证的关联来说，埃利亚学派本体论的两个特征特别重要：1 事物的本质肯定处在听任生成和灭亡摆布的感官世界的事物之外（也就是说存在不处于事物中，而是超越事物或者躲在事物之后）；2 存在与生成对立，因为它源自非存在，重新又进入非存在。正是本质和事物、存在同生成的分离，在这里被尼采称为“谎言”。 [↑](#footnote-ref-54)
55. 符号协定[……]逻辑：尼采此处指的主要是形式逻辑作为思维内容间关系的学说，它的高度抽象性。而根据传统的、可以回溯到亚里斯多德的区分，那关于概念，判断和结论的学说也同属于此。在此，单个句子之间的关系，纯粹根据它们的结构，也就是独立于它们各自的内容，得到建立。 [↑](#footnote-ref-55)
56. 最最真实的存在者（ens realissimum）：在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理论中，这是全部现实的整体，即上帝。 [↑](#footnote-ref-56)
57. 拜物生灵：物神（Fetisch）这个词在原始的，首先在“泛灵论的”， 也就是说在建立在“唯思维论”之宗教基础上的宗教里，是对于从根本上来说是任意的对象的称呼。这种对象同护身符不一样，不是从它自身出发，而是通过一种被置入这个对象的符咒，起到保护和帮助的作用。尼采看到，正是这样一种神秘的投射过程，参与了对语言，理性和形而上学的构建。 [↑](#footnote-ref-57)
58. 理性范畴：在哲学中，范畴一方面是最普遍的，同时是最简单的直陈、陈述、和概念形式，从中可以派生出其他所有的概念；另一方面是认识对象的存在的基本形式。范畴学的奠基人是亚里斯多德，其最全面的设置由康德的“范畴表”完成，它举出了总共12个范畴，3个一组，分成4组：统一，多样，总体；实在，否定，限制；实体，因果关系，相互作用；可能性，此在，必然性。叔本华否定了康德的范畴，在他自己的哲学里，只认可一点：那个充分根据律：“为何如此，没什么会无根据。”（《充分根据律的四重根》1813，§5）叔本华在此提出4个“形态”：1.存在根据律（在时空中）；2.因果关系律；3.动因律；4.充分根据律（§46）。 [↑](#footnote-ref-58)
59. 在印度如同在希腊[……]理性：这里首先涉及古希腊和印度宗教（佛教）所共有的、关于再生或转世的理论（“灵魂转生”）。但尼采的论证关联表明，这里主要可以推测的，是对柏拉图的观念理论和它以此作为基础的、主要在《菲多篇》里发展的两个-世界-本体论的影射。根据这个学说，一个纯粹观念的宇宙，统领感性现象的世界；人类的灵魂在其原始的存在中同这样的观念是一致的，而以后才通过与一个肉身（出生）的联合，丧失了它“观念上的”实存；人的道路，尤其是哲学家的道路，被描述为，借助理性和认识，同观念的一次重新联合的尝试。 [↑](#footnote-ref-59)
60. 德谟克利特（Demokrit，约前460–370）：苏格拉底之前“原子论”的最重要代表；根据这个理论，原子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物质单位，从材料上看，被设想为是不变和不可摧毁的。另外，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原子不仅仅是一切事物的基本质地的载体，同时具有空间的数学秩序的基本特征，所以，原子论能够被扩展为对全部现象世界进行一种解释的基础，一种宇宙学。 [↑](#footnote-ref-60)
61.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18世纪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其主要著作为：《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判断力批判》（1790）。尼采在这里主要指的是由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辨证论”中展开的，对形而上学的认识乐观主义的批评。这种认识乐观主义主张事物的纯粹的逻辑和理性的可辨性（特别是：上帝，世界，灵魂）。相反在康德那里，作为感性直观之对象而可辨认的现象，同“自在之物”相对立，而这种“自在之物”作为超验的对象，处在任何感性经验之外，并且独立于它。 [↑](#footnote-ref-61)
62. 狄俄尼索斯的：来自狄俄尼索斯神的名字（Dionysos）。他是宙斯（Zeus）和塞墨勒（Semele）的儿子。除了阿波罗的(Apollinisch)，狄俄尼索斯的这个概念——作为全体的综合性的象征——是尼采早期著作《来自音乐精神的悲剧的诞生》（1872）中的重要纲领。 [↑](#footnote-ref-62)
63. “真正的世界”如何[……]成了寓言：蒙蒂纳里（Montinari）说，这一章根据1888年年初的一个计划，是计划要写的书《权利意志》中的第一章，所以在手稿中有“第一章”的标题（考订版，14卷，415页）。 [↑](#footnote-ref-63)
64. “我，柏拉图，是真理”：对柏拉图观念理论所包含的一个思想的论战性激化：在认识的道路上，国家中只有那些最优秀者才达到最高和决定性的阶段，即那些哲学家。只有他们能够进入观念，只有他们由此具有能力，从本质上认识智慧，虔诚，德行等的自身，而不依赖它们在现象世界中的表现。尼采在此影射的，正是柏拉图认识论中这个孤傲的、只有向哲学家们开放的观点。 [↑](#footnote-ref-64)
65. 命令：显然指的是“绝对命令”（kategorische Imperativ）。这在康德那里被宣布为道德的最高的论证原则：“请这样行动，时刻让你意志的准则同时能够是一种普遍的立法原则。”尼采在此加入了一种自黑格尔以来经常有人进行的批评，即认为“绝对命令”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原则。依据这个原则，某些目标规定或者准则的理由，无法物质地得到充分说明。 [↑](#footnote-ref-65)
66. 哥尼斯堡式：讽刺地影射康德。他一生几乎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乡哥尼斯堡。 [↑](#footnote-ref-66)
67. 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19世纪中叶以来人文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理论的教义；由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89-1857）建立。实证主义代表一种非常明显地反对形而上学的、严格以经验作为取向的立场，由此属于20世纪批判唯理论的先驱。 [↑](#footnote-ref-67)
68. 自由的英才：如同在尼采许多文稿中一样，就是在“自由的英才”概念中，也同时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一方面，他指的是一种仅在表面上不受束缚的自由精神的代表，“所有这些脸无血色的无神论者，反基督者，伤风败俗者，虚无主义者，这些精神的怀疑论者，优柔寡断者，肺痨病患者”。尼采——显然以贬低的口吻——指责此处被提到的人，说他们有一种最后的、纷乱的理想主义色彩，某种自由精神式自我驳斥的一种方式：“这些人远还不是自由的英才，因为他们还相信真理[……]”（《论道德的谱系》，《禁欲主义理念意味着什么？》§24）与此相对，尼采提出自由精神的一种类型，它甚至向对于真理的信仰宣战，而这个类型至今的唯一代表，他显然以为就是他本人，这个一切价值的重估者：“让我们别低估这点：我们自己，我们这些自由的英才，已经是一种对‘一切价值的重估’，针对有关‘真实’和‘非真实’的所有旧概念的一次真实的战争和胜利宣言”，§13） [↑](#footnote-ref-68)
69. 查拉图斯特拉开始（INCIPIT ZARATHUSTRA）：也就是说，查拉图斯特拉的哲学时代开始。尼采力图借助其帮助，最终克服和替换那充满矛盾的、在他眼里西方世界的敌视生命的哲学。关于“阴影最短的时刻”，请参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中的段落，“中午”：“小心！炎热的日午昏睡在田野上。别歌唱！安静！世界是完美的。” [↑](#footnote-ref-69)
70. 山上宝训：山上宝训在《马太福音》（5-7章）里得到流传；尼采引用的地方，完整的是：“若是你的右眼引诱你犯罪，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你的一个肢体，不叫全身被扔进地狱，这样对你更好。” [↑](#footnote-ref-70)
71. 精神的贫困：对《马太福音》5，3中一句话的讽刺性影射：“精神贫困者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footnote-ref-71)
72. 感性[……]复仇欲：尼采此处和在再下一段的结尾处列数的本能，显然让人想起基督教的七种深重罪孽：自负，贪心，淫荡，嫉妒，无节制，发怒，懒惰。 [↑](#footnote-ref-72)
73. 苦修会（la Trappe）：1644年，在法国西北部的特拉伯的西妥教团修道院，成立了特拉伯修士（有较严格教规的西妥教团修士）的天主教修士会；尼采在此涉及教会戒律的禁欲主义的严肃论。这类戒律规定了严格的缄默，素食和艰苦的田间劳作。 [↑](#footnote-ref-73)
74. “灵魂平和”：参见《新约全书》，《罗马书》14，19：“所以让我们追求有助于平和以及互修身心的事。”尼采用来描述这里状况的、极端的心理矛盾，提示了“心灵平静”之第二个、基督教之前的纲领，即“静观”（Ataraxie）：根据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kur，前341-270）的理论，人的目标和幸福应该是，通过对享受和自我约束的理智的权衡，达到一种不可动摇的心灵平衡。 [↑](#footnote-ref-74)
75. 自然主义：在哲学中，自然主义是一个表示某些立场的综合名称。在这些立场中，效用要求建立在所谓自然的发展序列或者自然的洞见上。自然主义的起源于针对基督教的上帝的启示和道德学说所作的宗教哲学批判。这种学说通过一种超自然的注解知识获得合法性。自然主义作为自然神论和自然宗教，确定了18世纪的宗教哲学。 [↑](#footnote-ref-75)
76. “你们的心，神知道”：参见《路加福音》16，15。 [↑](#footnote-ref-76)
77. 生命的价值：暗指1865年德国哲学家杜林（Karl Eugen Dühring, 1833-1921）出版的书《生命的价值》；针对达尔文的“生存斗争”论，他提出了关于一种“真正自由的社会”的乐观主义思想。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所有强制和统治关系都将被废除。这个思想受到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95）的反对（《反杜林论》，1878）。 [↑](#footnote-ref-77)
78. “对于生命意志之否定”：在叔本华那里，只有通过禁欲中意志反对自身的一种倒转，它才可以实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I.第四篇，§，70）。尼采这里指的就是这样一种道德心理学攻击自身的、“反自然的”观点。 [↑](#footnote-ref-78)
79. “看哪这人！”（ecco homo）：当彼拉多见到身穿紫袍，头戴荆棘冠冕的耶稣，出现在要求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群前时，说出这句话（《约翰福音》，19，5）。尼采以“看哪这人”，给出自为《快乐的科学》（1882）所写诗篇“玩笑、阴谋和报复——按德语韵律而写的序曲”的第二十六首诗作标题。以此作为标题的还有他1888年的自传体论著《看哪这人。一个人如何成为他是的人》。 [↑](#footnote-ref-79)
80. 原因和结果：早在古代，在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那里，就断定所有发生的事件，都具有原因的条件。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因果概念由培根（Bacon,1561-1626），伽利略（Galilei, 1564-1642）和克普勒（Kepler,1571-1630）发展出。英国经验主义者，特别是休谟（Hume,1711-76），提出一种主观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因果关系的基础是联想，期待和习惯。在康德那里，因果关系是一种知性范畴，并且以其时间和空间的直观形式，是认识的条件之一。叔本华把因果关系分成三种形式：原因，刺激和动机。 [↑](#footnote-ref-80)
81. 柯尔纳罗（Lodovico Cornaro,1467-1566）：威尼斯的古罗马贵族和艺术体育赞助者。曾著书《论有节制的生活》（Discorsi della vita sobria,1558）。森巴赫（Paul Sembach）的德语译本书名是《达到一个健康之高龄的艺术》（柏林，无出版年月）。 [↑](#footnote-ref-81)
82. 请相信专家（Crede experto）：出自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101年去世，罗马史诗诗人和执政官）描写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布匿战记》（VII，395）。 [↑](#footnote-ref-82)
83. 原罪：保罗首先从人类祖先面对上帝之禁令的违法行为中（I.摩西2和3）引出所有后世之人的原罪，用上帝在历史结束时的拯救，来对抗自亚当起历史开始时人类的厄运（I.哥林多15，21；罗马人 12-21）。 [↑](#footnote-ref-83)
84. 动机：一次行动的动因。在叔本华那里，尼采这里引述的就是叔本华的动机概念，除了“原因”和“刺激”，动机是因果关系的第三种形式，是行动着的人的有意识的目标想象（《充分根据律的四重根》，§20）。在《论道德的谱系》（1887）中，尼采第一次确定这个权利追求，这个“权利意志”，是人基本的生命动机。 [↑](#footnote-ref-84)
85. 经验（Empirie）：意识从现实中领会到的一切。在哲学中是关于所有非概念性知识的基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中把它作为问题提出，对它作了更准确的定义。对他来说，经验是知性的第一产物和认识的基础。 [↑](#footnote-ref-85)
86. 寓言：这里在“虚构的，幻想的叙述”的意义中使用。 [↑](#footnote-ref-86)
87. 精灵世界：譬喻式的术语。叔本华曾就概念的统治使用它（《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16） [↑](#footnote-ref-87)
88. 存在（Sein）：尼采此处在一个具有支配性意义的理解中使用这个概念。这个理解对现实的存在，即物的世界的已经存在，和观念、概念——比如自在之物——之理想的又无法体知的存在，不作区分。就是存在作为一切存在者之整体，作为世界整体之最普遍的规定，其最具概括性的意义，也在尼采关于存在的概念中显露出。尼采在这段话中，批评超验的唯心论，它把现实的和理想的事物确定为主体想象力的产物。 [↑](#footnote-ref-88)
89. 根据他的样子：影射创世故事：“他根据他的形象造他们。” [↑](#footnote-ref-89)
90. “自在之物”：出自康德主要著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的术语。根据这个术语，物体被设想为独立于主体的认识条件（时空和知性范畴的直观形式），所以无法认识。对立面：我们的认识可以达到的物。 [↑](#footnote-ref-90)
91. 形而上学家：“形而上学”最早是亚里斯多德一篇论著的题目，然后独立为概念，从新柏拉图主义者以来指称哲学的基础科学，探究超越经验上可感知的世界的合法关联。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终极原因、它的本质和意义的学说。基督教以柏拉图为根据，推行一种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它在此岸和彼岸、在感性的此在和真实的存在之间，借助康德，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进行区别。尼采在此反对思辨和唯心的哲学倾向。这种哲学意图从纯粹理性出发，认识人，世界和上帝，或者这个“真实的存在”。 [↑](#footnote-ref-91)
92. 交感神经系统（nervus sympathicus）：植物性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不依赖于意识地工作，作用于内部。 [↑](#footnote-ref-92)
93. 歇斯底里作为女巫：中世纪的女巫信仰，其根源在日尔曼、古代和东方关于不幸和伤害的想象。在14和17世纪之间，这种信仰上升为女巫狂热。教会和基督教神学，特别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约1225-1274），为了征服异教迷信的残余，而推动女巫信仰。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为了推动对女巫的迫害，颁布通谕《Summis desiderantes affectibus》。女巫迫害的牺牲者，常常是那些举止引人注目的，“歇斯底里”的妇女。 [↑](#footnote-ref-93)
94. “每种[……]光顾我们”：参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II，4，§46（“论生命的虚无和痛苦”）。 [↑](#footnote-ref-94)
95. 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62）：法国宗教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发展了“帕斯卡六边形”定律，发现了连通管原理，高度和逐渐减低的气压之间的关系，研究了概率计算问题。作为宗教思想家他接近詹孙教派信徒，反对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他以“心灵的逻辑”，把“心灵”定义为宗教判断力的、如同超验之直接体知的真正的和最高级的器官。主要著作：《宗教思想录》（1658）。尼采暗指帕斯卡的禁欲主义生活态度和他面对自然科学之理性的悲观主义。 [↑](#footnote-ref-95)
96. 信，爱，盼望：在《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1，3和5，8）中出现的话。 [↑](#footnote-ref-96)
97. “道德的世界秩序”：一个由善恶之定义预先规定的理想世界。具有自由决定权的人，必须通过道德的行动适应这个世界。 [↑](#footnote-ref-97)
98. 被柏拉图传授过：根据柏拉图，有着两种原因的类型，作为认识和存在者的实存之条件的必要性，作为存在和善存之原因的神性。通过让善作为幸福被人认识，神性将人引入正确选择的自由。（《蒂迈欧篇》，68，e） [↑](#footnote-ref-98)
99. 宿命：厄运，不幸。宿命论，相信一种不可改变的命运，是尼采关于同样事物永恒轮回之学说的一个本质因素。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85）中论述了这个学说。 [↑](#footnote-ref-99)
100. 目的：在哲学意义中“目的”是设想的和追求的效果，是最终原因（causa finalis）。设定一个目的，其前提是，假设一个由因果关系决定的可预料的自然事件，以及对这个关联的最后干涉的可能。对决定论和唯物主义来说，制约目的的行动是不可想象的。 [↑](#footnote-ref-100)
101. 第一因（causa prima）：按字面意思，第一原因。指的是哲学中，特别在经院哲学中，大多把上帝作为第一推动者，与把创造物作为第二因相对。 [↑](#footnote-ref-101)
102. 生成的无辜：自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起，就有了对于存在（巴门德尼）和生成（赫拉克利特）的区分。根据柏拉图的观念理论（尤其在《菲多篇》，《政治篇》，《巴门尼德篇》中），只有理念，作为单个事物那总是同样的本质，具有存在。物质被视为不是真正的存在者，因为它为生成所决定，也就是说，无法被思维把握，受制于永恒的变化。对尼采来说，“生成的无辜”是对值得追求的未来哲学的概括。 [↑](#footnote-ref-102)
103. 此在：由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pniz, 1646-1716）和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首先使用的概念，意指经验上的存有（existentia），区别于得有（Sosein）。在与存在和生成之本体论定义的关系中，此在仿佛具有起中介作用的中间地位。 [↑](#footnote-ref-103)
104. 善与恶的彼岸：尼采暗指他的同名论著（1886）。他在文中强调，世界既非善，也非恶，而是原初的“生命”。 [↑](#footnote-ref-104)
105. 符号学：这里在医学的意义中，作为病象理论使用；通常地说：符号的理论。 [↑](#footnote-ref-105)
106. 症状学：关于症状的医学理论。它同全部临床检查方法一起，组成医生诊断的基础。 [↑](#footnote-ref-106)
107. “金发野兽”：出自尼采自著《论道德的谱系》（1887）的引文。第一章，§11。 [↑](#footnote-ref-107)
108. 《摩奴法典》：在印度婆罗门教中，摩奴是人类的始祖和立法者。他是梵天的“自己生成”的儿子。这个十三名受期待的摩奴中的第一个摩奴，被视为《摩奴法典》的作者。而这部法典被看作婆罗门法律和道德的最完美的体现。这部书建立在较古老的法律起源上，其历史的形成时间被确定为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这些关于灵魂转世的宗教的律令和规定，被记录在十二卷中。尼采这里的摘引和以下的引文，出自雅各利奥（Louis Jacolliot）的《宗教立法者。摩奴-摩西-默罕默德》，巴黎，1876。 [↑](#footnote-ref-108)
109. 首陀罗（Sudras或Schudras）：亚利安印度人四个社会等级中最低一级的成员。首陀罗还分成许多下属等级，受到一些社会的制约。 [↑](#footnote-ref-109)
110. 贱民（Tschandala或Tschandal）：在本加伦（Bengalen）和阿萨姆（Assam）的最底层、现在几乎已经灭绝的印度种姓的成员，非雅利安人的，部分地是穆斯林；原先指一个首陀罗男人和一个婆罗门女人的后裔，可现在是刽子手，掘墓人和其他所谓不洁行业的代表。 [↑](#footnote-ref-110)
111. 雅利安的人道：尼采引证的印度人，就他看来，与米堤亚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和日尔曼人并列，属于雅利安人。 [↑](#footnote-ref-111)
112. 《以诺书》：尼采这里指的大概是3或4世纪产生的、所谓第三部或者希伯莱的《以诺书》，总共三部《以诺书》中的最新的一部；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埃塞俄比亚的和一部斯拉夫的《以诺书》。以诺被视为圣经的祖先中的一个，为亚当的第七代后裔和“知识的奇迹”（耶稣·西拉赫44，16）。据说他在一部内容广泛的秘密文献里记录下这个知识的奇迹。 [↑](#footnote-ref-112)
113. 虔诚的欺骗（pia fraus），根据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9，711。 [↑](#footnote-ref-113)
114. 孔子：原名为孔夫子（前551-约479），中国哲学家。他不是宗教创始人，他汇集了古代中国的“五经”，对它们作注，并且使之流传。他的道德学说建立在宗教的观念中，即正确的行为能够与永恒的世界秩序、与天道取得和谐。处于同自然协调中的德行是智，仁，信，礼，义。孔子学说在公元前1世纪经历了第一个繁荣期。自1530年起，出于宗教的原因，孔子受到国家的尊崇。 [↑](#footnote-ref-114)
115. 新德国：尼采指的是德意志帝国。1871年1月日在凡尔赛宫，随着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被宣布为德国皇帝，帝国成立。 [↑](#footnote-ref-115)
116. 思想家的民族：对流行语序“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的缩写。对德意志民族的这项指称是逐渐形成的；首次出现在穆索斯（Johann Karl August Musäus, 1735-87）为他《民间童话》（1782）所写的预告里：“[……]我们这个思想家、诗人，幻想者、先知的民族[……]。”以后出现在让·保尔（Jean Paul）的笔下，不过没有言及德国人。 [↑](#footnote-ref-116)
117. “德国，德国高于一切”：封·法勒斯雷本（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1798-1874）《德国人之歌》（1841）中的首行诗。由海顿（Joseph Haydn）谱曲，1922年起成为德意志帝国国歌（《德国国歌》），现在（用其第三段）也是联邦德国国歌。 [↑](#footnote-ref-117)
118.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k-Schönhausen, 1815-98）：1865年伯爵，1871年侯爵，1890年劳恩堡公爵；1847年和1862年间普鲁士议员和外交家，1862年起任普鲁士宰相和外交部长。对1871年帝国成立有重要贡献。 [↑](#footnote-ref-118)
119. 酒精：尼采对酒精消费的重复影射（《快乐的科学》，1，42；《论道德的谱系》。3，21）必须联系到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产业工人阶层的不断增长的酒癖，进行观察。对博学青年的酒癖的影射，针对的是大学生社团中泛滥成风的酒癖。在波恩学习期间，尼采认识了这样的大学生社团。 [↑](#footnote-ref-119)
120. 德国音乐：首先指的是瓦格纳音乐。（参见《瓦格纳事件》和《尼采反对瓦格纳》。） [↑](#footnote-ref-120)
121. 曾经：在《不合时宜的思想——第一篇：戴维·斯特劳斯，信仰者和作家》（1873）中，尼采对斯特劳斯的《新旧信仰——一篇自白》（1872）进行了责难。 [↑](#footnote-ref-121)
122. 戴维·斯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1808-74）：神学学习结束后在图宾根教会学校当哲学教师。在处女作《耶稣传，批判地观察》（1835）出版后被解聘，以后在路德维希堡当中学教师和自由作家。对于“耶稣生平研究”的创立，他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这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历史的拿撒勒的耶稣，就其生平所进行的科学批判研究。斯特劳斯以历史资料考证的认识为基础，表明圣经描述的神话的、广泛地受教义影响的特点。随后他努力证实，把一种传统宗教的内容简单地转变为一种哲学的抽象是不可能的，最后尝试填补由此产生的信仰空缺，途径是提出一种自己的、违背传统基督教传说的哲学草案，确切地说在他的论著《新旧信仰。一篇自白》（1851）中。尼采在他《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第一篇里，就是把它当作自己的批评对象。 [↑](#footnote-ref-122)
123. 以诗句发誓：暗指斯特劳斯的《挽歌》（1851）；诗的最后两行是：“只有死神/能把我同可爱的褐啤分离。” [↑](#footnote-ref-123)
124. 不时地：尼采于1879年辞去在巴塞尔的大学教职。他离开巴塞尔，在伯尔尼，苏黎士和奥伯伦加丁逗留，去威尼斯，热那亚，罗马和墨西拿旅行。他同德国大学的联系，主要局限于阅读大学的出版物。 [↑](#footnote-ref-124)
125. 十七年来：在《不合时宜的思想——第一篇：戴维·斯特劳斯，信仰者和作家》（1873）中，尼采首次明确反对狭隘的知识庸人。这个针对一种纯然机械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批评，特别在《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第二篇里（《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1874）继续，即使以后也是他的迫切需要。 [↑](#footnote-ref-125)
126. 希洛人制（Helotentum）：希洛人是被多利安人征服的希腊早期的原始居民，斯巴达国最低等的社会阶层。他们是占统治地位的斯巴达人的奴隶，没有人生自由。 [↑](#footnote-ref-126)
127. 快活：这个概念中带有对于希腊的快活的想象。尼采在《悲剧的诞生》（1872）中指出这点。就席勒看来（《论人的审美教育》，1795），希腊的快活作为阿波罗的天性，同关于世人和天神之间的矛盾的讨论联系在一起。只有世人同天神经历了争执后取得的和解，才会导致快活。在希腊人那里，快活把痛苦和绝望当作必要的前提。就席勒看来，喜剧中的人物，倘若他要获得快活的境界，得先追求悲剧的境界。——黑格尔没有在艺术中，而是在对于纷争的哲学洞察中、在对这种纷争的辨证的扬弃中，看到获得快活的和解可能。 [↑](#footnote-ref-127)
128. 充分根据：这个用法暗指由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引入哲学的“充分根据律”：现存的一切，必须有一个为什么是的充分根据。以后主要是叔本华，在他的论著《充分根据律的四重根》（1813）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反对康德对这个定律之效用的界定。康德只是在涉及到“时空中所有事物作为现象，但绝对不是自在之物本身”时，肯定其有效性（《论一种发现，据此所有新的纯粹理性批判可以通过一种旧的让它变成多余》1790，C章，第一节，科学院版，213页）。 [↑](#footnote-ref-128)
129. 文化和国家：在尼采时代，这个两极在“文化斗争”中具有特别的现实性。当时，普鲁士国家反对天主教的影响。俾斯麦通过法律措施，尝试取得对教育事业的监管权和削减教会的自治权（总理条款，对教会的监管权，耶稣会士法）。 [↑](#footnote-ref-129)
130. 歌德[……]心灵紧闭：主要在《编年史》（参见纪念作者诞辰版，30卷）中，一方面是歌德对拿破仑的敬仰，另一方面是他对德国解放战争的保留态度，得到清楚显现。 [↑](#footnote-ref-130)
131. 瓦格纳问题：参见《瓦格纳事件》和《尼采反对瓦格纳》。 [↑](#footnote-ref-131)
132.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尤其在《精神现象学》（1807）中，发展了欧洲和西方哲学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系统之一。尼采对黑格尔有一种矛盾心理的关系：一方面他讥讽在一些陈旧人物头脑里占主导地位的黑格尔哲学，另一方面他又对他表示出不加掩饰的认可：“在有名的德国人中，也许无人比黑格尔更富有机智”，但他接着补充：“可他又有这么大的德国人对于机智的恐惧，以至于这种恐惧造成了他那奇特和糟糕的文体。”（《朝霞》，第三部分，警句193） [↑](#footnote-ref-132)
133.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 原名Harry Heine,1797-1856）：德国诗人，1825年从犹太教皈依基督教。1831年作为《奥格斯堡总汇报》记者去巴黎。他的作家事业心，特别以德法两国间的沟通为目标。他对德国政治和文化状况的无情和尖刻的嘲讽式批评，致使德意志联邦议会于1835年对他的作品颁发禁令。 [↑](#footnote-ref-133)
134.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97），瑞士文化和历史学家，苏黎士和巴塞尔大学教授。主要著作为：《君士坦丁大帝时代》（1853），《向导》（1855），《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1860），《文艺复兴史》（1867），《世界史观》（1905）。他和尼采部分地共同的巴塞尔时期（尼采1869-79；布克哈特1858-93），奠定了他们互相间友好关系的基础。 [↑](#footnote-ref-134)
135. 美属于少数人：pulchrum est paucorum hominum.(根据贺拉斯，《讽刺诗集》I，9，44。) [↑](#footnote-ref-135)
136. “教育”的民主主义：1770年和1830年之间，在德国形成了现代教育体制，其主要概念“教育”包含了精神的个性和自决的理想。大约自1890年起，在学校中，反对资产阶级精神的改革运动得到加强。这些学校受到美国典范的激励，要求教育的民主化：国民应该独立于社会等级差别，在“统一学校”里受到培养。尼采的批评针对伴随这个新教育概念而来的、趋于一种传统的百科式“普遍教育”的倾向。 [↑](#footnote-ref-136)
137. 德国的秀美：尼采指的是席勒。他在其论著《论秀美与尊严》（1793）里，把秀美定义为“一颗美丽的心灵的表达”，作为由主体引起的运动的美，相对于尊严作为“一种崇高的信念的表达”（参见一百周年纪念版，11卷，223页）。对于德国的秀美的指出，应该理解为是讽刺性的。那些容忍这位知性哲学家的德国人，也许几乎不懂，什么是秀美。 [↑](#footnote-ref-137)
138. 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前4-公元65）：罗马哲学家，悲剧作家和政治家。经过官员（古罗马高级财政官，元老院议员）和一段时间在科西嘉岛的流放生涯，曾当过尼禄的老师，55/56年间为执政官；有过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由于莫须有的参与一次阴谋的罪名，他被尼禄勒令自杀。他写过道德文章，对话和信札，自然科学的研究报告和悲剧。实际上是斯多噶派，但也传播其他哲学家的影响（毕达哥拉斯，伊壁鸠鲁，犬儒学派）。其主要兴趣是伦理学，在此之中，他对人类的完善和社会的理解给予最高的重视。 [↑](#footnote-ref-138)
139.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78）：法国哲学家和作家；针对启蒙运动，强调情感，以代替理性，不仅批评专制主义的国家，也已经批评其对手，即新的市民社会，视文明的进步为堕落。通过其“社会契约”论，他成了法国革命的哲学家。其主要著作为：《新爱络绮思》（1761），《爱弥尔》（1762），《论社会契约》（1762），《忏悔录》（1781）。 [↑](#footnote-ref-139)
140. 污秽的原始自然（in impuris naturalibus）：可能是对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 1225-74）“纯洁的原始自然”（in puris naturalibus）说法的改变。尼采反对由卢梭提出的观点，即人只有在自然状态中才是善的，以及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政治价值能够实现；相反他强调，一个非由文化使之完善、缺乏阿波罗的秩序因素而固执于狄俄尼索斯的自然环境的人类，具有动物和暴力的天性。 [↑](#footnote-ref-140)
141. 塞金根的道德号手：暗指舍费尔（Joseph Viktor von Scheffel）的史诗《塞金根的号手——奥伯海因的一首歌》（1854），对席勒作品中对道德性意义之强调的旁敲侧击。 [↑](#footnote-ref-141)
142. 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他的主要著作，《神曲》（1311-21），是诗人穿越彼岸三个帝国，即“地狱”，“炼狱”和“天国”的幻觉旅行。 [↑](#footnote-ref-142)
143. 作诗的鬣狗：暗指但丁《神曲》（比如第一部的13歌，124-129行，10歌，40-53行，或者11歌，6行）。 [↑](#footnote-ref-143)
144. 伪善言辞（cant）：文字游戏，一方面指向英语和法语概念：“伪善的语言”，“虚情假意的空话”，另一方面指向康德的名字：Cant的写法源自家庭的氏族的来历，还被康德的父亲使用过。 [↑](#footnote-ref-144)
145. 理知的特性：根据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每个活动的主体都有一种特性，也就是说，以两种形式表现的一种因果律：作为经验的特性，它证明主体是自然规律之因果关系的现象，作为理知的特性，它确定这种因果律是行为的责任人，而他自身不受时间条件的限定。康德以这样的区分尝试，证明自由和自然的原则上的一致性，以及人的道德行动的可能性。 [↑](#footnote-ref-145)
146.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85）：诗人，属于法国浪漫主义盛期。 [↑](#footnote-ref-146)
147. 法鲁斯（Pharus）：在亚力山大城港附近的岛屿。托迷勒二世（Ptolemaios II.Philadelphos,前285-246）让索斯特拉塔斯(Sostratos)在上面建造了一个120米高的灯塔，属于世界奇观，被视为亚历山大的标志；所以法鲁斯=灯塔，如这里。 [↑](#footnote-ref-147)
148. 李斯特（Franz von Liszt, 1811-86）：作曲家和钢琴家；过着入世的生活，这让他曾同雨果，拉马丁(Lamartine)，德拉克洛瓦(Delacroix)，柏辽兹(Berlioz)等人结识。他同自己长年的生活伴侣达吉尔夫人（Marie d’Agoult）生有三个孩子。女儿柯西玛（Cosima, 1837-1930），先是比洛（Hans von Bülow）的妻子，然后成为瓦格纳的妻子，受到尼采的仰慕。作为作曲家,李斯特是一种新型钢琴音乐，即“交响诗”的创造者。这种音乐以最为精湛的技巧著称。 [↑](#footnote-ref-148)
149. 精湛技巧[……]女人：精湛技巧不仅被归于作为作曲家和钢琴家的李斯特；他对女人或者女人对于他的兴趣也同样强烈。 [↑](#footnote-ref-149)
150. 乔治·桑（George Sand, 1804-76）：本名阿芒丁-奥罗尔-吕西尔·杜德望（Amandine Aurore-Lucie Baronin Dudevant），出生名迪潘（Dupin），法国女作家。她曾与桑多（Jules Sandeau）生活一处，与他一起写出她的第一部小说《玫瑰红和白色》，还和缪塞（Alfred Musset,1810-57,法国作家）和肖邦（Fréderic Chopin,1810-48,作曲家）共同生活。在自己的小说中，她致力于为妇女争取婚外爱情的权利，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 [↑](#footnote-ref-150)
151. 丰富的乳汁（lactea ubertas）：参见《贡古尔日记》II，25，那里关于乔治·桑这样说：“在她的姿态里有一种深沉，一种温和，就像一头反刍动物的半醒半睡状态。”或者：“桑夫人，一个反刍的斯芬克斯。” [↑](#footnote-ref-151)
152. “秀美风格”：温克尔曼的术语。依照斯卡利杰（Scaliger, 1540-1690，法国古典学者），他把古希腊艺术分为四个“主要时期”：古朴风格、崇高风格、秀美风格、仿古风格时期。 [↑](#footnote-ref-152)
153. 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自1838年起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和法兰西学院历史学教授。作为一名热情奔放的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有倾向性地、带着追求效果的热情进行历史写作。尼采在此暗指的也许就是这点。1850年由于热心于政治活动他被解除教授职务，1852年，当他拒绝对宪法宣誓后，也失去了在国立档案馆历史部主任的职务。尼采关于脱下的外套的比喻，有可能指的是官职和尊严的丢失。 [↑](#footnote-ref-153)
154. 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英国作家。既处在苏格兰的清教主义传统里，也处在德国的唯心主义传统中，他反对19世纪的唯物主义。其著作有：《法国革命》（1837），《论英雄和英雄崇拜》（1841）。他在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世界史由受上帝引导的伟大人物的历史组成。 [↑](#footnote-ref-154)
155.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73）：英国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以自己那归纳和演绎的逻辑体系（1843），被视为英国古典经验主义的继承人，并把这种经验主义发展成实证主义。作为国民经济学家，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中代表了一种自由的社会主义。 [↑](#footnote-ref-155)
156. 侮辱人的清晰：尼采这个加密的比较，有可能意指穆勒的实证主义。它探究事实上曾有的、可靠的、毫无疑义的事物，探究“清晰的”事实，由此既阻挡了对于形而上学的思考的关注，尤其也阻挡了对于寻找尼采意义中生机勃勃之事物的目光。“清晰”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侮辱人的”，倘若它观察到的东西太少，忽略了模糊的、不过是全面的背景和关联。 [↑](#footnote-ref-156)
157. 两个埃阿斯：洛克勒尔的埃阿斯(Aias der Lokrer)，小埃阿斯，和特拉莫尼的埃阿斯(Aias der Telamonier)，大埃阿斯，两个希腊人，他们——常常并肩——在特洛伊战争中战斗。大埃阿斯被荷马（《伊利亚特》）描述为最勇猛和最大胆的希腊人。 [↑](#footnote-ref-157)
158. 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 1819-80）：作曲家。他为现代轻歌剧的继续发展作出贡献，进一步说，通过社会批评的抱负，音乐的诙谐，他的发明才能和易懂好记的节奏性。神话题材在他的几部歌剧中获得讽刺和诙谐的改造，比如在《美丽的海伦娜》（1864）和《地狱中的奥菲欧》（1858）中。 [↑](#footnote-ref-158)
159. 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法国作家。作为法国文学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理解的小说，是一种由生理条件限定的现实的文献。他以为，人由依赖于肉身的情感，由生物学的遗传和环境影响所决定。 [↑](#footnote-ref-159)
160. “臭气冲天的快乐”：其出处不明。尼采以这句引语，反对左拉那关于“丑陋的”、仅与肉身紧密相连的、片面的人的图像。 [↑](#footnote-ref-160)
161. 勒南（Ernest Renab, 1823-92）：法国宗教学家，东方学家和作家。受德国的批判神学和哲学的影响，他背弃了自己的教士职业，投身于科学。在他的历史哲学著作《科学的未来》（1848）中，他推崇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一种文化乐观主义的进步信仰。在宗教研究领域他还著有《基督教起源史》（1863-83），在此书的第一卷《耶稣的一生》（1863）中，他尝试从历史、地理、社会和人种学诸方面，解释耶稣的生平，并且把耶稣看作宗教的和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自1862年起他任法兰西学院闪语族语言教授，自1878年起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footnote-ref-161)
162. 精神的贵族主义：关于勒南“精神的贵族主义”，请参见《龚古尔日记》中那著名的“在马格尼处吃饭”的谈话——特别是——他的《哲学的谈话录》。尼采曾读过此书德译。（参见考订版14卷，423页。） [↑](#footnote-ref-162)
163. 蚁鴷的灵巧：蚁鴷是啄木鸟科的一种鸟。在古希腊，因为它那伸长的脖子会突然转动，被视为遭拒绝的情侣的魔鸟。为了夺回爱情，人们把鸟的脚和翅膀绑在一个四轮辐的轮子上，一边念咒语，一边转着轮子。 [↑](#footnote-ref-163)
164. 耶稣会会士：由依纳爵（Ignatius von Loyola）创立、1540年被教皇批准的天主教修会，即“耶稣会”的会士。其目的是传播和巩固天主教信仰，尤其是通过传教、授课、科学研究的以及写作的活动。其对世俗政治的强大影响在历史中不断导致同国家的冲突，比如在普鲁士文化斗争（1872-78）中。由俾斯麦于1872年发布和一直存在到1917年的耶稣会会士法，意味着对这个修会的一种遍及整个帝国的禁令。——尼采使用“耶稣会会士”时带有的轻蔑口气，同当时盛行的时代精神相吻合；此外，面对带有敌视“生命”的“奴隶道德”的基督教，这也是尼采拒绝性立场的表达。而这种“奴隶道德”在同耶稣会会士那秘密的政治影响或者间接的权力要求的关联中，变得清晰可见。 [↑](#footnote-ref-164)
165. 圣伯夫（Charles-Augustin de Sainte-Beuve, 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他在评论时不让自己受固定的形式和类型规则所左右，而是把有个性的文学作品放在它自身的历史关联中观察。 [↑](#footnote-ref-165)
166. 浪漫主义（romantisme）：在法国，这个表达方式指1789年后，在同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关联中，作为针对1804年和1830年间形成为经典的文学时期的相反运动。其主要代表是雨果，诺迪埃，拉马丁。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是主体性和感情崇拜，一方面是多愁善感的被动性，另一方面是对个人活力的渴求。 [↑](#footnote-ref-166)
167. 科学院（Akademie）：最初指柏拉图在雅典城郊，在阿卡德莫斯（Akademos）英雄林附近一个园子里的学校。尼采这里指的是1635年由黎塞留（Richelieu）在巴黎建立的法兰西科学院，它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维护语言的纯洁，制定它的表达方式。它对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和法语语法具有重大影响。 [↑](#footnote-ref-167)
168. 波尔罗亚尔（Port-Royal）：实际上指巴黎附近的波尔罗亚尔西妥教团女隐修院，1204年建立，1214年提升为修道院管辖区，自1625年起在巴黎的圣·雅克城郊；存在到1841年。在女修道院院长安吉里克（Angélique）领导下，它成为一个精神和宗教中心，对法国的精神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主要是反对耶稣会会士和整个詹孙教旨（17世纪）的反教权主义的、严守教义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它曾经起着一个主导作用。帕斯卡（Pascal）以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为出发点，同耶稣会会士斗争。 [↑](#footnote-ref-168)
169. 那条著名的虫子：虫子有着谚语的“知名度”：要是有人踩它，它就会蜷缩起身子。把软弱的人想象为虫子，首先起源于圣经；比如：“人自身只是一条地上的虫。”（《诗篇》22，7）此外蛇或虫是撒旦的一个化身。被天使米迦勒战胜后，它显现为蜷缩的虫（《约翰启示录》，12，7）。 [↑](#footnote-ref-169)
170.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67）：法国诗人，艺术评论家，散文作家。受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49）和E.T.A.霍夫曼(E.T.A.Hoffmann, 1776-1822)的影响，是瓦格纳整体艺术作品思想的追随者，创造了一种以严格的形式著称的诗歌，在这样的诗中，鉴于一种平庸的进步，他表现了人的不断增长的世界陌生化。 [↑](#footnote-ref-170)
171. 《效仿基督》（imitatio Christi）：指的是被归在奥古斯丁教团修士和神秘主义作家托马斯·封·肯彭（Thomas von Kempen, 1379/80-1471）名下的《关于基督的仿效》（De imitatione Christi）的四本书。它们产生自14/15世纪“新虔敬主义”精神。这种“新虔敬主义”意图用一种宗教的、积极的爱的理想，代替教条的基督教。 [↑](#footnote-ref-171)
172. 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实证主义想在对形而上学的背弃中，通过观察和实验，发现现象的关联和规律。不过，孔德同时宣扬一种普遍的宗教，其最高级的对象是人类自身，由爱、秩序和进步的价值所规定。尼采影射的是孔德哲学中反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倾向。 [↑](#footnote-ref-172)
173. “心灵的宗教”：以对帕斯卡（Pascal）恰恰反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心灵的逻辑》（logique du coer）的影射，他揭示出孔德同他自身的实证主义理论的基本矛盾。孔德说，他曾受到一本神秘的宗教著作的“启示”。 [↑](#footnote-ref-173)
174. 艾略特（Georg Eliot,1819-80）：英国女作家。其著作主要带有哲学和社会政治倾向的印记。她早年背弃清教主义的基督教，在斯特劳斯（Strauß）和费尔巴赫（Ludwig Feuerbach,1804-72）的影响下，维护一种自由的、不受宗教限制的伦理学。尼采假定艾略特具有无意识的摇摆性，虽然背离基督教信仰，但还是以一种新的伦理学，必然地重新接受了基督教的思想财富。 [↑](#footnote-ref-174)
175. 她[……]写作：在《龚古尔日记》II,146页，谈到乔治·桑，她在中午一点结束一部小说，在接下去的夜里开始另一部。（参见考订本14卷，424页） [↑](#footnote-ref-175)
176. 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法国作家。他被视为现代小说创作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那设计为对当代社会的整体描述的主要著作，是由91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组成的《人间喜剧》（1841）。尼采这里把巴尔扎克归于浪漫主义作家，仅在这方面有理由的，即相对于古典主义作家而言，法国浪漫派作家如同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其文学作品中，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十分紧张的矛盾性。 [↑](#footnote-ref-176)
177. “依照自然”：法语句子“d’aprés nature”的德译，可在《《龚古尔日记》的前言里找到。 [↑](#footnote-ref-177)
178. 暗室（camera obscura）：内部涂黑的盒子，带有透明的后壁，上面安有装在正面的一个聚光透镜，能拍出头朝下、左右颠倒的照片；照相机的雏形。 [↑](#footnote-ref-178)
179. 巴黎小说家：尼采指的是1830年和1880年之间法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司汤达，巴尔扎克，龚古尔兄弟，福楼拜和左拉。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描摹了19世纪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他们的意图是对现实的精确观察，不追求创造一种艺术的整体。 [↑](#footnote-ref-179)
180. 拉斐尔（Raffael,真名Raffaele Santi,1483-1520）：意大利画家和建筑师。开始当他父亲乔万尼·桑蒂的助手，然后是佩鲁吉诺（Perugino）的学生，1504年去佛罗伦萨，自1518年起生活在罗马。自1513年起参加彼得教堂的建造工作，1515年起为圣彼得教堂的首席建筑师和负责罗马古代文物保护的官员。他被葬在万神庙中。 [↑](#footnote-ref-180)
181. 阿波罗的和狄俄尼索斯的：这对概念在《悲剧的诞生》（1872）中提出。在出自80年代的遗著中，尼采自己曾扼要描述了这两个术语的内容：“‘狄俄尼索斯的’这个词表示：对于统一性的冲动，一种对个人，日常生活，社会，现实，对消亡之深渊的超越：进入更黑暗，更饱满，更漂浮之状态的激越和痛苦的充溢；一种对于生命之整体性格的，把它当作在一切变化中同样者，同样强大者和同样幸福者的欣喜若狂的肯定；伟大的泛神论的同乐和同情，它们也欢迎生命那最可怕的和最可疑的特点，并使之神圣化；生育、多产、回归的永恒意志；创造和毁灭之必要性的统一感——‘阿波罗的’这个词表示：对于完全的自为，对于典型的‘个性’，对于让事物简化，突出，变得强大，清晰，毫不含糊和成为典型的一切的冲动：律令下的自由。” [↑](#footnote-ref-181)
182. 权力意志：尼采哲学的中心概念，也是他自1885年起计划的哲学主要著作《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的书名。对这部书的笔记和箴言由他的妹妹弗斯特—尼采（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编辑，部分地篡改，以《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1905）为书名出版。——对尼采来说，权力意志表示维持此在的手段，甚至全然是生成的表达形式。它同基督教对于彼岸的定位和对于生命的敌视形成对立，是“生命”的驱动力。 [↑](#footnote-ref-182)
183.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82）：美国哲学家和诗人。原先当过牧师，1832年弃职——受卡莱尔等人的激励——转向德国的先验哲学。他鼓动美国独立于欧洲的传统，转向自己的将来。 [↑](#footnote-ref-183)
184. “他[……]咀嚼”：引文出处不明。 [↑](#footnote-ref-184)
185. 维迦（Lope de Vega,1562-1635）：西班牙作家，主要是戏剧家，也写诗歌，史诗，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 [↑](#footnote-ref-185)
186. “我跟随我自己”（yo me sucedo a mi mismo）：（出处不明）。 [↑](#footnote-ref-186)
187. “即使缺少力量[……]享乐依然值得赞扬”：（Ut desint vires[……]tamen est laudanda voluptas）：对奥维德《黑海零简》III，4，79中：“Ut desint vires, tamen est laudanda voluntas”(即使缺少力量，意志依然值得赞扬)的戏谑性模仿。 [↑](#footnote-ref-187)
188.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82）：英国自然科学家。他的进化论建立在由他发展的选择学说上：动物和人类发展的基本条件，后代的易变性，遗传，过量繁育，这让一种筛选变得必要。其特征最好地适应环境的生物，在“生存斗争”中获得成功，其余的走向灭绝。他的理论对生物学，精神史，政治学或意识形态具有重大影响。代表作是：《物种的起源》（1859）。 [↑](#footnote-ref-188)
189.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社会学家。由于他的人口增长理论而闻名。根据这个理论，人类贫困的原因是，与食物生产比较，人口急速增长。根据他的“人口理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数量由于不断减少的土地收成增长数，仅按算术级数增加。 [↑](#footnote-ref-189)
190. “让它们被拿走吧！[……]天国将留给我们”：出自路德的诗歌《我们的上帝是个坚固的城堡》。 [↑](#footnote-ref-190)
191. “歌德和席勒”：指的是歌德和席勒之间的友谊，从1794年持续到1805年（席勒逝世）。对此的明证是信件往来，他们共同编撰的《警句诗》，他们的叙事歌谣。尼采针对席勒的批评口吻可能是反对他的理性和理想主义。歌德作为“纯真的”诗人，表面上不假思索地模仿现实，接近原初的自然和世界。同歌德相反，席勒同自然的关系是破碎的。他更是一个“感伤的”诗人，不是通过对现实的简单模仿，来达到表现一种和谐的整体，而是以反思的方式，尝试去实现一个设想的理想。（请参见席勒，《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5 - 96。） [↑](#footnote-ref-191)
192. 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1842-1906）：哲学家，作为“无意识哲学家”出名。他关于一种有活力的形而上学的理论，组成一种黑格尔和叔本华哲学的综合，同时接受了谢林无意识的概念，莱布尼茨的个性理论和现代自然科学的现实主义的概念。他试图从无意识出发解释世界。这个无意识在“世界进程”中觉醒，把自己认识为精神和理念。哈特曼可被视为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先驱。叔本华和哈特曼代表了悲观的世界观。根据这种世界观，生命的目标在于克服生命的意志。尼采在此同哈特曼及其关于历史的有规律进程的学说拉开距离。在《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第二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1874）中，尼采以尖刻和讥讽的语调，同哈特曼及其出自对历史之过分强调的玩世不恭的末世哲学展开论争。 [↑](#footnote-ref-192)
193. “自在之美”：柏拉图建立了美的学说。在他那里，美作为尺度以及和谐是美之理念的写照。康德把美同有用，愉快和善分开。 [↑](#footnote-ref-193)
194. 人性的，太人性的：尼采在他的论著《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中，否定一种理知世界的可能。随着对因果关系的意识的出现，首先在德谟克利特（Demokrit,前460-371）那里，自由决定的美德消失不见。倘若尼采论及人性的太人性的美，他以此否定美是绝对的价值，并且把这种价值视为从属于生命维持的一种表面目的。 [↑](#footnote-ref-194)
195. 怀疑论者：怀疑论的拥护者。这是一种哲学流派，它可以回溯到希腊哲学家皮朗（Pyrrhon,前360-270），曾把怀疑提升为思维的原则。 [↑](#footnote-ref-195)
196. “啊，狄俄尼索斯[……]更长一些呢？”：阿里阿德涅曾在尼采著作中出现过多次。尼采曾借助她的嘴，说出神秘和荒谬的话。这个形象的意义在研究中是有争议的。其中的一个猜测看来较易理解，即这牵涉到尼采非常爱戴的柯西玛·瓦格纳的一个化名。他曾在1889年给她写过一张便条：“阿里阿德涅，我爱你！狄俄尼索斯。” 对阿里阿德涅耳朵的提及，看来指向尼采对他自己的耳朵的骄傲。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阿里阿德涅形象指的是他自己。（参见波达赫（E.F.Podach）：《尼采笔记概观。一项创作分析的研究》，海德堡1963，115-128页。） [↑](#footnote-ref-196)
197. 审美判断：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中把判断确定为表象内容与意识之统一的连接点；它把个别现象归纳到普遍概念之下。审美的或者鉴别的判断，根据兴趣或者反感的主观标准来决定对象，而不是根据其客观的性质（参见《判断力批判》，1790）。 [↑](#footnote-ref-197)
198. “生命意志”：叔本华引文，比如出自《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四篇§54。 [↑](#footnote-ref-198)
199. “意志”：叔本华哲学的中心概念：意志是“自在之物，内在的内容，世界的本质；生命[是]可见的世界，是现象，不过只是意志的镜子”（《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II，第四篇，§53。也请参见第二篇）。 [↑](#footnote-ref-199)
200. “拯救”：《旧约》和《新约》中的重要概念。在《旧约》里，是上帝对以色列和个别虔诚者的解救的行动，在《新约》中，同耶稣和他那意味着对人类赦罪的十字架之死相关。在哲学中，拯救思想在叔本华那里具有重要意义。他在佛教含义中，把对于生命意志的彻底否定，理解为通向真正解脱的“拯救”之路（参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II，特别是第四篇，§68）。 [↑](#footnote-ref-200)
201. “意志的焦点”：参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篇和第四篇。 [↑](#footnote-ref-201)
202. 神圣的柏拉图：参见《根据充分律的四重根》第一章，§1（《方法》）以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序，德累斯顿，1818年8月。 [↑](#footnote-ref-202)
203. 所有的美，刺激[……]：柏拉图，《会饮篇》，206b-d。 [↑](#footnote-ref-203)
204. 不会有柏拉图的哲学[……]土壤里：柏拉图，《费德罗篇》，249c-256e。 [↑](#footnote-ref-204)
205. 奇人（wunderlicher Heiliger）：谚语式，根据路德《诗篇》（4，4）的翻译：“看见吧，耶和华奇特地引导他的圣者。”“奇特（wunderlich）”代表“奇妙（wanderbar）”。 [↑](#footnote-ref-205)
206. 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77）：哲学家。继承笛卡尔，在他的主要著作《伦理学》中提出现代理性主义的思想：只有数学思想的方法才导向真理。与笛卡尔相似，他把实体定义为唯一的存在者。广延和思维是无限的实体的样式。个体的理性认识导致对存在、实体即上帝的认识。 [↑](#footnote-ref-206)
207. 希腊式竞赛（agonalen Gymnastik）：在古希腊，竞赛组成文化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被组织的有体育的、精神和艺术的、赛马体育的竞赛，部分地定期轮回，部分地出于特殊的原因。 [↑](#footnote-ref-207)
208. 古典法国的[……]文学：17世纪主要以高乃依（Corneille,1616-84）、莫里哀（ Moliére,1622-73）、拉辛（ Racine,1639-99）为代表的文学。这个文学以亚里斯多德的形式理想为准则，处理古代题材。主要以可能性（vraisemblance），适当性（bienséance）和合理性（raison）为典范。 [↑](#footnote-ref-208)
209. 殷勤（Galanterie）：特别是面对女人的殷勤举止。根据孟得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爱情那欺骗性的假象，目的在于寻求好感。 [↑](#footnote-ref-209)
210. 为艺术而艺术(Lˊart pour lˊart)：这个成为口号的句子由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库辛（Victor Cousin,1792-1867）1818年在他关于哲学的讲演（1836年在巴黎出版）里提出。诗人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1811-72）在他小说《模斑小姐》（1835）的前言中，要求一种无目的、不受外界（政治的，道德和宗教的）原因和目的影响、易懂和有自身规律的艺术。这种艺术应该作为自我目的仅仅产生自美的观念。尼采在下面附和这句名言，一方面针对艺术中的“道德倾向”，另一方面他不愿看到艺术被评价为“完全无目的，无目标，无意义”。这个尤其在文学创作中（比如波德莱尔,福楼拜，王尔德，格奥尔格）不断地被提出和得到继续发展的要求，以后在其过度发展中，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纯粹审美的形式游戏。 [↑](#footnote-ref-210)
211. 艺术[……]兴奋剂：尼采在这里重新续上他曾在1872年的处女作中表达的思想：“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此在和世界才显得有充分理由。”（《来自音乐精神的悲剧的诞生》，§24） [↑](#footnote-ref-211)
212. “弃绝意志” [……]悲剧的最大功利：叔本华在其主要著作中详细地探讨了悲剧的目标和目的，确定了它同艺术和生命的关系（参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I，第三篇，§51）。 [↑](#footnote-ref-212)
213. 农神节（Saturnalien）：古罗马对[农神]萨杜恩（Saturn）表示纪念的节庆，每年的12月17日举行。属于节日风俗的有取消等级差异，主人服侍仆人，互赠礼物以及公开的和私下的狂饮欢宴。 [↑](#footnote-ref-213)
214. 在悲剧面前[……]残酷之酒：这段话语在词语选择和思想内容上让人想起尼采在《悲剧的诞生》（1872）中的表述。他曾把悲剧在希腊人那里的形成，不是解释为人类弱点的结果，而是解释为强大和力量的一个标志。来自“最好、最强大、最勇敢之时代”的希腊人，不是出于对灭亡的“恐惧”而闭上眼睛，抱怨他们的此在，而是为了有意识地掌握他们的生命而创作了悲剧这个艺术形式，以说明“世界之此在[作为]审美现象”的理由。 [↑](#footnote-ref-214)
215. “这幅画漂亮得令人心醉！”：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91）谱曲的歌剧《魔笛》（I，4）中塔米诺斯（Taminos）的话。 [↑](#footnote-ref-215)
216. “我将看自己[……]我有这么多的精神？”（je me verrai,je me lirai, je m’extasierai et je dirai:Possible, que j’aie eu tant d’esprit?）：出自意大利国民经济学家和作家加利亚尼（Ferdiando Galiani，1728-1787）1769年9月18日给他的朋友埃佩奈夫人（ Madame d’Épinay）的信。加利亚尼在信中对此表达了他的喜悦之情，因为他的一些论著得到出版。 [↑](#footnote-ref-216)
217. 博士考试（Doktor-Promotion）：尼采这里指的是一种（口头）考试（Rigorosum），大多在获取博士学位的书面（家庭）作业（博士论文）完成后进行。 [↑](#footnote-ref-217)
218. 责任的概念：暗指康德。针对“倾向”，他把“责任”理解为人的被感召，即在某种无外界影响的情况下——一方面没有对奖励的指望，或另一方面也没有对惩罚的恐惧——人们得履行或者放弃的责任。比如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1785）中这么说“……我那出自对实践法则之纯粹尊重的行为的必然性，就是构成责任的东西，而任何别的动因都得让路，因为责任是一种善的意志自身的条件，而这种意志的价值超越一切。”（科学院版，第四卷，第一段，403页） [↑](#footnote-ref-218)
219. 作为自在之物[……]现象：尼采把康德主要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自在之物”（据此物体被思考为不依赖主体的认识条件，但不能被认识）和“现象”（被理解为由人的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和知性范畴所决定的经验的现实）的区别，用到了绝对地完美的国家官员的想象的可能性，和相对地不完美的国家官员的现实上，而前者（尽管或者恰恰因为他只是一种假想，亦即“不可能”）应该作为后者的典范起作用，不过其目标是，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footnote-ref-219)
220. “野蛮的冲动已经安睡”：参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1778诗行：“我离开田野村路，/那里暮色已经降临，/它以不祥和神圣的恐怖/唤醒我们善良的灵魂。/野蛮的冲动已经安睡/伴随着所有狂暴的行动，/仁爱之心搏动而起，/上帝之爱也振奋涌动。” [↑](#footnote-ref-220)
221. 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 前100-44）：罗马政治家和将军。有过成功的战役和行省管理经历之后，他成为终生的“大将军”，“祖国之父”和“独裁官”。公元前44年3月15日，他被布鲁图（Brutus）和卡修斯（Cassius）刺杀。 [↑](#footnote-ref-221)
222. 尤利乌斯·凯撒[……]操劳：1888年2月13日，尼采在给彼得·加斯特的一封信中，透露出他的出处：“我在普鲁塔克（Plutarch）那里发现，凯撒用什么办法治疗疾病和头痛：长途行军，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不间断地在户外逗留，操劳[……]。” 普鲁塔克自己报告说，凯撒“不顾体质虚弱，承担了所有的操劳事，尽管患头痛病和癫痫，以及因为他的病弱应该善自保重；相反，他试图通过战争生活治疗这些疾病，用长途行军，简单的饮食，经常在户外逗留和操劳来对抗病痛，由此磨练他的身体”（普鲁塔克，《罗马的英雄生活》，威廉·阿克斯编，莱比锡1934，316页）。 [↑](#footnote-ref-222)
223. “利他的”：“与别人有关的”；其对立面是“利己的”，“与自己有关的”。尼采在此暗指基督教教义，属于其最重要要求的，有“博爱”（“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而尼采把这当成弱点，作否定的阐释。 [↑](#footnote-ref-223)
224. “无利害感的”动机：尼采的表述包含对康德的批评。后者在其《判断力批判》（1790）中，把决定审美判断的“快感”定义为“完全无利害感”。对康德来说，“那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非常不公正，而且不是纯粹的审美判断”（科学院版，第五卷，§2，205页）；而就尼采看来，恰恰这个无利害感是蜕化和软弱的表现和标志。相反，出于爱好或者自私自利（也就是出于偏爱），有意识地赞同或者反对什么，这是强大和活力的标志。 [↑](#footnote-ref-224)
225. “意志和表象”：影射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2卷，1819）。倘若我们继续尼采的思绪——即“像叔本华那样”“否定生命”是不合适的，相反，人们得“首先否定叔本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通过对叔本华的这个否定，也就是说通过对他的悲观主义的驳斥，生命——在尼采的意义中——受到了肯定。 [↑](#footnote-ref-225)
226. “善与恶的彼岸”：尼采在此暗指自己1886年的同名著作。他在此书中故意不在一种基督教——转世论的意义中理解这个彼岸，作为值得追求的、尘世的此岸的对称，而是作为一种尚可达到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应通过对其对立的容忍，扬弃善与恶的两极。 [↑](#footnote-ref-226)
227. 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 1474-1507）：意大利枢机主教和大主教。曾起决定性作用地投身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通过废除许多封建和城市统治制度，为教会国家的新格局做了准备。在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中，他代表了具有典范作用的统治者。 [↑](#footnote-ref-227)
228. “更高尚的人”[……]超人：尼采这里暗指至少从他的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85）起，不断被他探讨的一个主要思想（也在《论善与恶的彼岸》）。超人被理解为更高级和更完善的人类的化身。他通过感性和知性的丰富的可能性而出众。 [↑](#footnote-ref-228)
229. 《联邦报》的瑞士编辑：《联邦报》作为自由思想和民主的报纸于1850年创办，每天出两版。提及的“瑞士编辑”牵涉到维德曼（Joseph Viktor Widmann, 1842-1911）。作为文学副刊的主任，他于1886年曾对尼采的书《论善与恶的彼岸》写过书评。 [↑](#footnote-ref-229)
230. 习俗的轻柔化[……] 坚强的时代[……] 可鄙之事：尼采在这里回忆起他曾在《悲剧的诞生》（1872）中详细展开的表述和思想。他的出发点是被描写为“最好，最强大，最勇敢时代”（《自我批评的尝试》，I）的典范和写照的古希腊人。他讨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那不断加速的没落和衰颓，而这种文化同时在近代达其最低点，不过也可能——无论如何根据尼采当时的推测——在瓦格纳的音乐里和通过瓦格纳的音乐，找到一个新的开端。 [↑](#footnote-ref-230)
231. 平等[……]“平等权利”：尼采在此回忆起他在其他地方详细表述过的思考；比如在《敌基督》（1888年写就，1894年出版）中：“‘人人平等’之学说的毒药——这是由基督教最基本地播洒的；基督教对人与人之间的每种敬畏和距离感，也就是说对文化每次提高和每次增长的前提，从卑劣本能的秘密角落出发，宣布了一场殊死之战——它给自己打造了主要武器，以对付我们，对付尘世上的一切高贵，快乐，豁达，对付我们在尘世上的幸福[……]”（§43） [↑](#footnote-ref-231)
232. 距离的激情：在《论道德的谱系》（1887）中，这个概念对尼采的高贵意向，有着重要意义。与距离的激情相对的，是被他否定的平等的伦理。他想用受难能力代替基督教的同情，想用人的高贵的等级去衡量这种受难能力的程度。（参见《论道德的谱系》，第一篇，§2） [↑](#footnote-ref-232)
233.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早于达尔文，以进化论确定宇宙间的物理、伦理、社会和宗教的特点。此时，道德是此在之争中的适应现象。人的意志以自我和族类保存为指向，而此刻第一原理（欲望原理）面对第二原理（同情原理）具有优势。既在社会的和谐，也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意义中推动生命的，就是善。 [↑](#footnote-ref-233)
234. 畜群动物化：尼采在这里批评（已经在语言上）这样的现象，即个体人被纳入和统一到（或者如他在《悲剧的诞生》中说的：“调整到”）得到否定评价的牲畜“群体”中，因为个体人以他的个性和主体性为代价被一体化，由此那对尼采来说生机勃勃的矛盾的正面对抗，或被削弱，或被清除。 [↑](#footnote-ref-234)
235.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1878年出版的书副标题是《一本献给自由英才的书》。尼采在第一卷中表达了下面的思想：“[……]国家衰落和国家死亡[……]是民主的国家概念的后果：这就是它的使命”；或者：“现代民主是国家衰落的历史形式”（第一卷，§472）。 [↑](#footnote-ref-235)
236. 俄国[……]德意志帝国：俄国（大约自15世纪起）或多或少持续地扩张，作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稳定了自己的地位，其统治人物为沙皇，具有几乎是毫无限制的权力；而此时（西部）欧洲的国家——就俄国的地理扩张而言——以其相对来说有限的领土，仅仅显示为“小国”。德意志的国家通过1871年的帝国建立，才合并为德意志帝国。 [↑](#footnote-ref-236)
237. 工人问题：尼采以这个自帝国成立成为口号的概念，暗指产生自帝国宪法的社会政治问题。在这个宪法中，最强大的社会群体，即工人阶级，与他们的“巨大数字”相比，只获得很少的政治权利。尽管根据帝国宪法，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工人也获得了帝国议会的选举权，但他们无法和其他社会阶层（贵族，资产阶级）一样，以同样的影响力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原因是，由于国家的限制，结盟非常困难。即使在军事领域，（起先）贵族和（以后）资产阶级占据了最重要的职位；工人一般只在下层级别中服役。 [↑](#footnote-ref-237)
238. “自由，我指的不是它……”：参见申肯多夫（Max von Schenkendorf,1783-1817）的诗歌《自由》（1813）的首行。其第一段是：“自由，我指的是它/它充满我的心里，/降临吧带着你的光环，/可爱的天使之像。” [↑](#footnote-ref-238)
239. 放任（laisser aller）：这句名言是19世纪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著名口号。 [↑](#footnote-ref-239)
240. 实践理性的真理：这里，尼采在概念和思想上联系康德“实践理性”的定义。这种理性由习俗的愿望规定，假设观念，以便让意愿和行动同习俗法则的统一，成为有意义。虽然如此，尼采提出一个自己的阐释来对抗它，以此把康德的定义倒转过来，或者使它反对这个定义自身。他含蓄地指责这个定义，带着（事先）规定的意图行动，而这种意图不再或者至少不仅仅通过习俗证明自己的理由，由此从根本上讲，不能证明自己（仅仅）是符合习俗的。 [↑](#footnote-ref-240)
241. 普洛克斯路斯忒斯之床：巨人普洛克斯路斯忒斯（Prokruste）把落到他手中的矮个子放到一张大床上，把他们的的腿抻长；把高个子放到一张小床上，通过砍掉他们的脚，把他们截短。普洛克斯路斯忒斯后来被忒修斯(Theseus)征服。“普洛克斯路斯忒斯之床”成了描写一种强制情状的谚语，或者描写一种模式：某事物被人强行塞进一个模式。 [↑](#footnote-ref-241)
242. 一切事物的蟹行：蟹行(Krebsgang)这个术语出自音乐研究，描述逆行地读一个曲调或者复调的方式，并在乐曲结构上对此进行运用。蟹行在文学方面的范例，可以在那些被逆行地阅读时，也能产生一个意义（比如Leben,生命,;Nebel, 雾气）的句子或单词中找到。尼采在此使用这个术语，向不是关注进步、而更是关注后退的党派展开论战。 [↑](#footnote-ref-242)
243. 伟大的男人[……]：尼采在他身后、即1908年发表的自传体论著《看哪这人》中表达过类似的思想。而这些表述指的是他自己。他这么写道：“那些较高尚的人，其起源可以回溯到无限远的过去，他们身上必定是最长久地得到搜集，储存和累积。”（《我为什么这样智慧》，3） [↑](#footnote-ref-243)
244. 环境的理论：环境理论断言，每个人和每个社会的发展由环境及其条件所决定，而不是由遗传的素质或者人类意志的自由。在19世纪，环境理论主要由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和法国历史学家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93）代表。孔德怀有这样的想法，即一种生灵的需求和他的环境条件能和谐地互相适应。而对泰纳来讲，环境的对人类生活的决定性功能占据主导地位。 [↑](#footnote-ref-244)
245. 巴克尔（Henry Buckle,1821-62）：英国文化史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尝试为历史发展建立自然科学的精确的法则。作为他的代表作，是未完成的遗著《英国文化史》，两卷（1857-61）；里特尔（J.H.Ritter）德译，1900年第二版。 [↑](#footnote-ref-245)
246. 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这里大概指的是他的《死屋手记》（1860-62）。他曾由于叛逆罪被判死刑，临刑前受赦免，改判在西伯利亚服受四年监禁。他在监禁营里报导这次监禁和生活状况。1887年2月13日，在给彼得·加斯特的一封信中，尼采这样描述这个俄国作家：“您知道陀斯妥耶夫斯基吗？除了司汤达，还从未有人给我带来如此多的愉快和惊喜：一个‘我所理解的’心理学家。” [↑](#footnote-ref-246)
247. 斯丹达尔（Stendhals, 真名Henri Beyle,1783-1842）：法国作家。斯丹达尔的作品包括自我描述，散文，游记和小说。同以后的尼采一样，斯丹达尔也在其小说和论著中谈论“较高级的人”（homme supérieur），把拿破仑看作这方面的原型和典范（1876年出版《拿破仑传》），同样也在被他描写为非道德主义的“男子汉”的某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物身上，看到这样的原型和典范（《意大利编年史》，1825-39）。尼采把斯丹达尔批判的、悲观主义的自我意识和世界意识，评价为与他精神近似的标志。 [↑](#footnote-ref-247)
248. 卡提利那（Lucius Sergius Catilina,前108-62）：公元前63年，由于其颠覆计划被发现（被西塞罗），卡提利那被迫离开罗马。他的追随者被控犯有叛逆罪，根据一次元老院决议被处死。卡提利那自己在62年初同他的军队一起被打败并且阵亡。俾斯麦于1862年9月30日，在背乡离井的颠覆者的意义中，提到“卡提利那的实存”。尼采在卡提利那的失败的努力中，即通过颠覆现存制度取得罗马帝国领导地位的努力，看到一种同凯撒那成功的努力的类似，以及凯撒那成为国家一号人物的成功努力的先例。 [↑](#footnote-ref-248)
249. 这里视野开阔：参见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11989行：“这里视野开阔，/精神高昂。” [↑](#footnote-ref-249)
250. 伟大的心灵[……]内在震颤：il est indigne des grands coeurs de répandre le trouble, qu’ils ressentent。 [↑](#footnote-ref-250)
251.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43）：古罗马演说家和政治家。前56和51年间产生了他重要的教育论著《论演说术》，《论国家》，《论法律》。在这些著作中，他尝试让理想的尺度去适应现实。他的书信也写得非常出色，被视为优美的拉丁文的典范。 [↑](#footnote-ref-251)
252. “退回自然”（Rückkehr zur Natur）：尼采在评价这个在用词和思想上都被归于卢梭的表达时（影射“返

     回自然！”的口号），更把它视为人类历史中的倒退而不是进步。 [↑](#footnote-ref-252)
253. 革命：尼采指的是1789年的法国革命；他把卢梭视为法国革命精神之父中的一个。 [↑](#footnote-ref-253)
254. 平等的学说：尼采这里指的是法国革命的一个要求。这场革命呼唤自由，平等，博爱。 [↑](#footnote-ref-254)
255. 毒药[……]公正[……]变得平等：参见尼采在他的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毒蜘蛛》一节中类似的思想。 [↑](#footnote-ref-255)
256. 不久[……]那本最具独立性的书：预告计划的主要著作，应该以《权利意志》的书名出版。 [↑](#footnote-ref-256)
257. 警句诗（Epigramm）：在希腊人那里，最初是艺术品、献祭物和墓碑上，一种以压韵对句（由两行诗组成的段落）形式写成的标题。自公元前6世纪，警句诗作为独立的文学类型，发展成对感情、情绪的容易记住的表达形式，显示对人物、事情的尊重。 [↑](#footnote-ref-257)
258. 萨鲁斯特( Gaius Salllustius Crispus，前86-35)：罗马作家和历史学家，不太重视历史的细节，而更注重批评占统治地位的罗马显贵的衰败现象，以古罗马“男子气概”（virtus）的理想形象反对罗马显贵。 [↑](#footnote-ref-258)
259. 科森（Wilhelm Corssen,1820-75）：语文学家，1846-66在舒尔普福塔当教授。尼采从1858到1864年高中毕业，在那里学习和生活。科森的主要著作是：《论拉丁语的发音，元音系统和重音》二卷（1858-59），《拉丁语词法批评论集》（1863）。 [↑](#footnote-ref-259)
260. “比青铜更加不朽”（aere perenius）：参见贺拉斯的“我树立了一座丰碑，比青铜更加不朽”(Exegi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s)（《诗集》III,30,1） [↑](#footnote-ref-260)
261.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sccus,前65-8）：罗马诗人。属于他最著名的作品有《诗艺》，《诗集》和《颂诗》。凭借后两者贺拉斯成了拉丁语诗歌的创始人。诗歌对他来说是一种严格的艺术形式，其中的言语，其表述必须简洁和准确。 [↑](#footnote-ref-261)
262. 彻底的怀疑论者：绝对的怀疑论者完全否定认知的任何可能性；这样，借助感官的感知作为源自实践之经验的基础受到质疑。不过，对于这个无知的知，被怀疑论者教条主义地和不容置疑地，当作原理设定为前提。与此相反，相对的怀疑论者仅否定某些领域中认知的可能性（比如在伦理学或者神学中）。尼采在这个意义中称自己为“彻底的怀疑论者”，以同柏拉图相对，那么这意味着，对于迄至那时被认为是肯定和被相信是无疑的事，柏拉图仅作了相对化，而他自己作了审核和清除。 [↑](#footnote-ref-262)
263. 迈尼普斯讽刺（satura Menippos）：根据其发明者迈尼普斯(Menippos von Gadara, 前3世纪)得名。它以散文和诗的一种混合体，揭露人类的弱点和愚蠢。 [↑](#footnote-ref-263)
264. 柏拉图的对话：对话以交谈的形式表现哲学的思维进程，柏拉图被视为其真正的、文学上的创造者。他在自己的对话中为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竖立了一座丰碑，并且让他展现出论证的对话艺术。这种艺术的实质是，通过演讲和异议，逐渐地阐明谈话对象的实质。 [↑](#footnote-ref-264)
265. 丰特内勒（Bernh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法国哲理性作家。尤其是他那继承了希腊讽刺作家卢奇安（Lukian,120-180）传统的、充满智慧和文采飞扬的《已故者对话录》（1683）,也许引起尼采的注意。 [↑](#footnote-ref-265)
266. 先于基督教存在（präexistent-christlich）：尼采在这里一方面暗指基督教之前柏拉图学说的存在（时间上）（前427-347），在此他把柏拉图哲学几乎视为基督教的精神预示；另一方面他强调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所共有的要素，即在世界的物质创造之前，在上帝的思想中，“世界”作为理念存在。同时尼采对世界那“此岸”和“彼岸”或者“上面”和“下面”的这种“对分”展开论战。 [↑](#footnote-ref-266)
267. 在埃及人那里：除了去下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旅行，柏拉图是否真的去过埃及并在那里学习，没有得到证明。而关于这样一次逗留的消息具有传奇特征。在柏拉图的著作里和他的信件中，都没有关于去埃及人那里的旅行的证据。所以更加可能的是，所有柏拉图编入他某些神话中的“埃及”，并非建立在个人经历基础上，而源自他人的旅行记，又被他编入自己的论著。 [↑](#footnote-ref-267)
268. 踏上[……]桥：这个比喻性的表达在此一方面意味着，柏拉图哲学可以被视为基督教学说的前提，因为柏拉图已经开创了一条道路，而基督教延续了它和/或者把它完成。另一方面尼采也许指的是瓦格纳面对基督教信仰之“十字架”的“鞠躬”或者“跪拜”。尤其在瓦格纳的《帕西法尔——三幕舞台节日祭祀剧》（1882）中，尼采看到了这个十字架的艺术表达。 [↑](#footnote-ref-268)
269. 修昔底德（Thukydides,前460-404）：希腊历史学家。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描写了贵族的斯巴达和民主的雅典之间为争夺在希腊的统治权的战争（前431-404）。在这公元前411年中断的描述的中心，是雅典人伯里克利(Perikles)和对其政策之合法性证明的尝试。 [↑](#footnote-ref-269)
270. 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作家。他的代表作，即尼采在这里提到的《君主论》，1513年完成，1532年出版。此书涉及的是建立和维持统治的问题，根据马基雅弗利的看法，这基本建立在“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上。尤其是马基雅弗利这个本质上新的思想，即权力是政治的一种构成因素，受到尼采的欢迎。 [↑](#footnote-ref-270)
271. 智者派文化[……]苏格拉底学派：智者（智慧教授者）公元前5世纪起在希腊作为高级教育科目的老师出现。在延续性学校的机构化之前，他们一方面被视为古代启蒙和教育运动的载体，另一方面这些智者——尤其是苏格拉底（前470-399）和他的学生——被批评为肆无忌惮的雄辩家，他们感兴趣的不怎么是对真理的哲学探究，而是物质的赢利和个人的好处，而他们那辨证的演说艺术仅被用于自我吹嘘，喋喋不休的咬文嚼字和假哲学的吹毛求疵。 [↑](#footnote-ref-271)
272. 在希腊人身上[……]自身带有的心理学家：尼采暗指温克尔曼（Winckelmann）。他在其《希腊绘画雕塑沉思录》（1755）中，把“既在姿态又在表达中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79）定义为希腊艺术的特征。“美丽的心灵”这个概念虽然也出现在温克尔曼笔下，但先由康德，席勒，尤其是歌德作为问题提了出来。歌德在他的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1795）中，第六卷，《一颗美丽的心灵的自白》，描述了对虔信派的一次皈依。 [↑](#footnote-ref-272)
273. 城邦（Polis）：指称古希腊人居住区内最普遍的国家形式。城邦有其城市的中心，边上形成周围地区和（以后）殖民地，可以被称为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体。城邦在公元前6到4世纪，特别在雅典，达到其繁盛期。城邦作为国家形式的观念，主要通过柏拉图及其学生亚里斯多德的国家学说，一直影响到近代。 [↑](#footnote-ref-273)
274. 我是第一人：在他的第一本书《来自音乐精神的悲剧的诞生》（1872）。 [↑](#footnote-ref-274)
275. 希腊文化：与尼采对雅各布·布克哈特此书出版的“预告”相反，后者于1889年11月29日给他的出版人泽曼（Ernst Arthur Seemann）写信，表示对这个出版物以及对尼采的保留态度：“说我要发表一部希腊文化史书，这个错误的说法源自不幸的教授、博士尼采先生，而他目前住在一个疯人院里。他把我经常讲授的一门有关那个内容的课当成了一本书。” [↑](#footnote-ref-275)
276. 洛贝克（Christian August Lobeck,1781-1860）：古典语文学家，自1814年起在柯尼斯堡任教授；他的主要著作《阿革劳法姆斯》（Aglaophamus）（两卷，[1829]）是关于秘密宗教仪式之古代史实的探讨。尼采下面摘引了它。 [↑](#footnote-ref-276)
277. 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68）：被视为近代考古学和比较艺术史（《古代艺术史》，1764）的创始人。在德累斯顿（Dresden）和阿尔琴托（Archinto）任罗马教皇使节的提议，促使温克尔曼于1754年归依天主教；1763年他被任命为罗马及其整个周边地区全部古代文物的总管。 [↑](#footnote-ref-277)
278. 纵欲狂欢（Orgiasmus）：极度兴奋的狂放不羁作为手段，以通过高昂的情绪状态，同神的世界接触。 [↑](#footnote-ref-278)
279. 狄俄尼索斯的神秘仪式：在狄俄尼索斯崇拜的仪式性庆典中，人们会追求一种共同的祭拜体验。在祭拜活动中，人们庆祝人类生命与神权的联系，以及男性同女性肉体的结合。此时迷醉的仪式和神秘仪式参与者的狂热活动，同叔本华对“否定生命意志”的要求，尤其是与其最高和最极端的形式、即禁欲，形成显著的对比。因为，恰恰在狄俄尼索斯的神秘仪式里，“生命意志”以强烈和粗放的形式得到表达，一方面在“性的象征”即男性的“阴茎”上，另一方面在作为女性之生殖力和怀孕象征的“产妇的呻吟和阵痛”中；参与者就这样庆祝和祭拜作为生与死之象征的形成与消亡的过程。 [↑](#footnote-ref-279)